

時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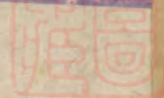
中國

經濟

輪廓



著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4254B



戰時中國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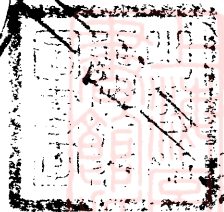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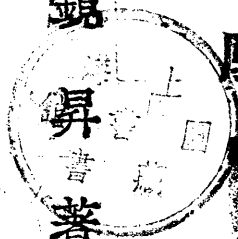
的輪廓



• 1944 •

鏡

昇書著





目次

緒論 怎樣研究戰時中國經濟

第一章 戰時中國經濟的特點

- 一 並非在孤立的狀態中
- 二 在運動着在前進着
- 三 不平衡的發展
- 四 從敵我對立發展出來的矛盾性

第二章 戰時中國經濟底動態

- 一 從「七七」到武漢撤退
- 二 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
- 三 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
- 四 太平洋戰爭以後



第三章

戰時中國經濟的島嶼

一 烽火下的綿繭河山……………五三

二 鐵蹄下的殖民地經濟……………五四

(一)「滿洲國」……………五五

(二)關內淪陷區……………五六

(三)沉淪了的孤島……………五七

三 自由中國的經濟……………七二

(一)大後方——西南與西北……………七二

(二)淪陷區中飄蕩着國旗的地方……………七九

第四章

敵我經濟戰的策略

一 敘述的範圍……………八三

二 敵寇經濟攻勢的演變……………八四

(一)「以戰養戰」……………八四

(二)從奪取外匯到掠奪物資……………八五

(三)從入口走私到出口走私……………八九



(四) 從「中日合作」到「自給主義」.....九三

(五) 「勤儉增產」與「三光政策」.....九七

(六) 越來越毒的經濟攻勢.....一〇〇

三 我戰時經濟政策.....一〇一

(一) 根據與任務.....一〇一

(二) 對敵經濟作戰的策略.....一〇三

(三) 管制政策.....一〇五

(四) 通貨稅制與專賣.....一一一

第五章 各種經濟力量的變動

一 變動的因素是什麼.....一一五

二 列強在華經濟力量.....一二七

(一) 戰前的陣容.....一二七

(二) 敵排斥英美在華權益.....一二〇

(三)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一二三

(四) 英美在大後方.....一二四

三 土地所有權.....一二七

(一) 土地所有權的變動.....一二七

(一) 地價的三個趨向.....一三〇

(三) 租佃關係的素描.....一三一

四 商業資本.....一三四

(一) 中國商業資本的特點.....一三六

(二) 戰時的商業資本.....一三八

(三) 商業資本與游資.....一四一

五 銀行與錢莊.....一四四

(一) 戰前的中國金融.....一四七

(二) 戰時的金融變態.....一四九

(三) 還有那些特點？.....一五一

(四) 游資在作祟.....一五二

六 民族產業.....一五三

(一) 一些成就.....一五七

(二) 幾個特點.....一六〇

(三) 橫在目前的困難.....一六三

結 論 展 望.....一六三

緒論 怎樣研究戰時中國經濟

抗戰是烈火，是洪流。偉大的中華民族，正在這烈火裡，洪流裡，受着艱辛而光輝的鍛鍊。幾年來，在烈火裡鍛鍊的同胞們，都在茹辛含苦地爲抗戰之最後勝利，爲民族之澈底解放而奮鬥着。在這個奮鬥的過程中，他們深深地體驗了戰時生活，因爲戰爭在經濟上所發生的影響，一點一滴，都會落到他們的頭上。

在實際生活中，同胞們是深深地體驗了戰時經濟的影響的，但要把握戰時中國經濟的全貌，而單單依據局部的片面的感覺，顯然就不夠了。打個比方吧，家家戶戶每天開門所欲解決的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糖，件件都是漲價的。同胞們固可從這七件事的漲價上，去體驗戰時生活，但是，戰時經濟絕不是這七件物品所能代表得完，表現得完的。物價問題固然是戰時經濟問題的癥結，但戰時經濟所涉及的領域，比物價問題，特別是同胞們每天開門所措理的七件事，遼闊得多，複雜得多。所以，僅從個別問題來把握戰時中國經濟，顯然是不夠的。

從全面去了解戰時中國經濟，誠爲研究這個問題的任務，但，要詳細他秋毫無遺地去把握戰時中國經濟的全貌，却亦不必。因爲問題雖然複雜，它的方面雖然很多，如果把握其要點，則提綱挈領，我們仍是能够在素描的形式之下，看出它的輪廓。因此，作者打算從下列幾個方面去握住這個問題。

一 第一是使讀者對於戰時中國經濟，把握各種現象的基本特徵。對於事物的特性的認識，是在

分析了具體問題以後，才有可能。所謂不知道個別事物，就不能明瞭全體的姿態，就是這個意思，但是，爲了敘述方便起見，在開始時來一個概括的基本的把握，亦未始不可以。當然在提到戰時中國經濟的特質時，必須以事實爲根據。因爲科學的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究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不先完成這種工作，則對於現實的運動，必不能有適當的敘述。』研究戰時中國經濟的第一個課題，就是如此。在這個課題之下，作者是把戰時中國經濟作爲一個總體去把握的。這亦與其他事物一樣，『當我們考察自然或人類的歷史以及我們本身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就有種種關聯和相互作用之無限錯綜的姿態出現在我們前面，這中間，沒有一樣是不變的，一切的東西，都作爲運動、變化、生成、消滅着的東西出現。』戰時中國經濟亦具有這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之無限錯綜的姿態，亦是作爲運動變化的東西而出現着。我們的任務，就是如何去把握它的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之姿態，如何去把握它的運動變化的特點。

第二、爲了把握戰時中國經濟之全貌，必須從抗戰的進程中，觀察它的變化。這種變化固然依據它的本身原因，但，國內外戰局的影響，其作用是更大的。如七七事變到武漢撤退這個時期，敵進我退的戰局，形成了東南民族工業重罹浩劫，金融極度緊張的現象，而歐戰的爆發，則影響了我國的對外貿易，金融市場與國際運輸，特別自從法國崩潰日寇在安南登陸以後，因爲汽越鐵路之被切斷，國際運輸之影響，更見嚴重；至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香港上海的淪陷與滇緬公路的堵塞，使後方在出入口上，達到了困難的狀況。於是，物資問題驟形嚴重，物價之上漲亦就超越以前任何一個時期了。因爲這種原因，所以，我們在研究戰時中國經濟的過程中，就把國內外戰局的變化，作爲劃分時期的標誌。這種劃分法，或許不大合於科學，但在把握全體的輪廓上

，未始沒有小小的幫助。在這裡，還要聲明的是：這一課題的任務，只在於了解各個時期的動態與其主要的特點，裡面的個別問題，自然難免有點朦朧；每個時期發展的規律更談不到了。因此，我們不能以戰時中國經濟史去看待它。

第三、要把握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單從過程的進展上去研究是不夠的，還須從各個地區的情況去把握。從地區去研究的好處，是在於使我們能夠更具體的瞭解戰時中國的狀況——什麼地方是被摧毀，什麼地方比抗戰以前衰落；什麼地方的生產建設，正在千辛萬苦中長大起來。這樣一幅輪廓畫，很是能幫助讀者了解現狀的。但在這裡，我們的任務，並不在於這個課題當作經濟地理去處理。從地區去了解戰時中國經濟，當然不能與地理不發生關係，但，彼此的着眼點是各不相同的。研究中國經濟地理的主要任務是着重於各地的物產、工業的分佈與交通情形；而我們這個課題的主要任務，則在於研究各地區經濟狀況的不平衡性；在於把握各個地區的社會經濟性質，在戰爭的影響之下，有沒有發生變化；有沒有一些新的特點？很明白，這些地區彼此間的不平衡，並不是固定的。到了把敵人打出國土，抗戰取得最後勝利，這種不平衡的狀況，當可因我們的建設工作之努力而逐漸歸於消滅了。

第四、必須研究以我相見於兵戎之外的經濟戰爭。這就要討論到敵我的經濟政策了。經濟政策是適應於某種經濟形態，推動着某種經濟形態之發展的。戰時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支持戰爭，保證戰爭的物質供給。不但如此，我們還要認清戰爭的性質與戰爭雙方的立場。很明白，敵人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而我國則為爭取獨立自由平等的民族。敵人對華的戰爭是戰略的非正義的，而我國的抗戰則是正義的；敵人的政策是在於使中國成為它的殖民地，爲了達

到這個目的，它的一切陰毒的計策便逐步表演出來了；而我國的戰時經濟政策，亦針對着它的攻勢和爲着支持抗戰而努力着。只有研究了敵我雙方經濟戰的策略，然後才能更進一步去認清抗戰以來各個時期經濟動態之何以具有某些特點，何以某些現象推移爲另一種現象，然後才能更進一步去認清各個地區何以呈現不平衡的狀況，何以某些地區的經濟呈現落後而另一地區又是長足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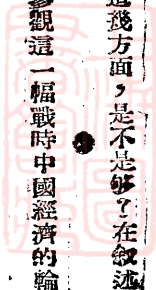
第五、抗戰以來的中國經濟，不斷地、劇烈地在變動着。這種變化，不僅呈現在各個時期的推移，不但呈現在各個地區的不平衡性，而且呈現在各種經濟力量之變化上。在這一課題之下，我們應檢討這些問題——列強在華投資的陣容，有了什麼消長；中國的土地所有權、銀行、商業、高利貸與產業資本，有了什麼變化。只有把握這些範疇的變化，然後才能了解戰時中國經濟的全面的輪廓。因爲對於這些經濟現象的分析，可以使我們認識中國社會經濟的特質，而研究它們在抗戰以來的變化，則可以看見戰時中國經濟的本身。從時間的進展上，我們只看見走馬燈式的過程；從地區的比較上，我們只得到走馬看花的概念，這些都是片面的見解。究竟戰時中國經濟的本身是怎樣，還有待於我們之研究。最後這個課題，就是在回答這一問題的。

此外，作者本擬闡出專章討論戰時經濟問題，但考慮之後，認爲戰時中國經濟問題，在實際上分散地在各章出現的，特別是在談到戰時經濟的進展時，在分析各個經濟範疇時，一些重要的經濟問題，就包括在裡面了，例如糧食問題與土地所有權有關；游資問題與銀行商業及高利貸有關；物價問題與游資及物資問題有關，而物資問題則與產業及財政經濟政策有關的。單獨闡一專章，將不免重複，因此，只好略去，讓讀者在第二章及第五章中，把握這些問題的實質。

吧。

這就是認識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所必須把握的幾方面。僅提出這幾方面，是不是够？在叙述或分析這些方面時，是不是充分？那就要等待國內賢達的指教了！

閒話休題，言歸正傳。就讓作者陪着讀者，跟着這個路線，去參觀這一幅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畫吧！



此
頁
空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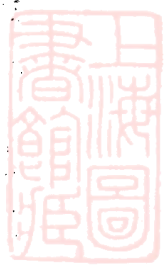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戰時中國經濟的特點

並非在孤立的狀態中

中國抗戰並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中進行；中國的戰時經濟亦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中存在。幾年來鐵一般的事實，秋毫無露地證明：中國的抗戰是多助的。中國的戰時經濟是與抗戰的政局政局，是與國際的政治經濟大勢，緊緊地互相依倚着。

持着形而上學的觀點的人們，現在再亦不能否認戰時中國經濟與其他因素的聯系了。但他們的所謂聯系的看法，却以事物的偶然的堆積所構成的空間並存的關係為滿足。這種看法，雖則比那些一口咬定：中國抗戰孤立無依，中國戰時經濟亦孤立無依的說法，較勝一籌，但這種外表的形式上的看法，還是不能把握事物的聯系性的。因為事物和事物之間，除了這些外表上的聯系之外，還有內在的必然的，實質上的聯系。而內在的必然的實質上的聯系，才是事物真正的聯系。因此，在表面上只看見事物偶然的堆積，是談不到把握事物的聯系性的。

事物的實質上的必然聯系，就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要用聯系的觀點去研究事物，就必須具體地把握事物方面的聯系；就必須找出這事物所由產生的以及其他與它有關的一切重要條件，就必須依據這些條件來研究這事物的具體發生和發展的情形，這些條件怎樣為事物所依賴，怎樣制約着它的發生和發展。



因此，我們首先必須把握與戰時中國經濟有聯系的各方面的條件。這些條件，有內部與外部之別；而在內部條件之中，有些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有些則僅具有重要影響，現在我們應着手研究的，是戰時中國經濟的決定條件。

● 那些是戰時中國經濟的決定條件呢？第一是抗戰到底的國策；第二是自力更生的原則。從「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向我國作無底止的侵略。東北三省之後，繼之以熱河，繼之以「一二八」在淞滬之進攻，繼之以冀東偽自治政府之成立，繼之以北方五省特殊化之陰謀。而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毒計，則是逐步地在展開着。這可從戰前幾年日本強盜在華的金融、工礦業的活動，以至收購農產品的事實上，得到清清楚楚的證明。這種局勢如果繼續下去，中國無疑地要從半殖民地陷入殖民地的深淵中。抗日最高國策之決定，「七七」以後全國抗戰的烽火之展開，把日本強盜侵吞中國的毒計，打得粉碎了；把中國殖民地化的危機，與以擋住了。在抗戰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縱然不免受到損失，然而，這是將來獨立自由的代價；這是將來大踏步發展國民經濟開發中國富源的代價。就是因為有這個美麗的遠景，所以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不願意當亡國奴的男女，都欣然為抗戰到底的國策，而提供出他們最後的一滴血。在這個抗戰到底的國策之下，就展開了幾年來中國的戰時經濟；反過來說，沒有抗戰到底的國策，是沒有中國的戰時經濟的。

只有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中華民族才能獲得解放，中國的國民經濟亦才有發展的前途。但，用什麼原則去支持抗戰呢？很明白，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中，包括了人力物力財力。在這裡，人力是最主要的。因為人力是戰爭決定的因素，是生產決定的因素。中國武器不

9

如人，但武器是可以人的努力去增強的，同樣，中國的戰時經濟雖然困難，但這些困難亦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去克服的。神聖的抗戰是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日本帝國主義逼迫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起來爲生存與發展而奮鬥。除了漢奸賣國賊以外，無論那一階層，都受到日寇侵略的痛苦。這一點，在客觀上使民族利益與國內各級民衆的利益統一起來。事情明白得復，如果日寇一日不驅出國土，則中國的資產階層便不能順利進行其企業的經營，則他們的廠礦財產便時時有被摧殘劫奪的危險，而中國的工人階層亦就一日有成爲敵寇的牛馬奴隸的危險。這一點使中國具有很大的潛勢力。而要把這種可能的潛勢力變爲實際的自力，其關鍵是在於發動民衆，組織羣衆，發揮羣衆的抗戰熱忱與能力。其次，中國的物力財力，亦並不薄弱。日本強盜雖則把東南沿海的大商埠大城市佔去了，雖則把中國八九十年所經營的大部份廠礦，暫時佔去了，然而我們在西南西北大後方，具有足爲準備反攻的地盤和資源。這幾年來，川、滇、黔、湘各省現代產業之勃興；西北某些地區在貧弱的條件之下發展農業發展工業的成績，以及散佈在每個小城市和農村中的手工業之改善與恢復，就是明證。這些成就，當然距客觀的需要，還是很遠，但這一點却證明中國的戰時經濟，是能够自力更生的。

爲了使問題弄得更清楚，我們必須指出：地理、人口、物資等條件，對於戰時經濟，具有重要的影響。它們誠然是內部條件，但並不是最後決定的條件。因爲地域之遼闊，物產之豐富，人口之衆多，如果不加以利用與動員，則這些因素，仍不能發揮其積極的作用。故自力更生的原則之中心，不在於只知道我們有若干自力，而在於使這些「自力」能發生實際的效能，否則，自力更生是一句沒有血肉的空話，縱然有自力，却難以更生了。因此，我們不得不重複的指出：這個

原則的主要內容，是在於發動我們的人力物力財力以支持抗戰。戰時中國經濟的開展，又是以比爲決定條件的。

此外，對於戰時中國經濟有重要影響的，尙有其他的內部條件。第一是戰局之變化。例如在武漢退出以前之十六個月中，因爲特定的歷史條件與主客觀能力的優劣，使我方不得不採用戰略防禦，在消耗敵人力量的原則之下，以空間換取時間。隨着領土之暫時喪失，和敵人的摧殘，建築在沿江沿海的經濟支點上的民族工業，便不免於蒙受損失了；在華北江南一帶的農村，便不免於遭受打擊了。其次是政治上的設施。政治的進步，是直接影響經濟的。稅制之整理，產業之保護，一定使工商業發展得快，反之，經濟便呈現停滯的現象了。再其次是文化的條件。工農的生產積極性，主要是依靠他們的生活之相當改善；但同時，亦有待於他們的自覺性之提高，而要提高他們的自覺性，文化教育是不能忽視的。

從外部條件來說，中國是多助的。世界上法西斯侵略國家，一天比一天更明顯地表現其同惡相濟的陣容。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世界的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線，最後地劃分了。三十一年元旦廿六國反侵略宣言之簽訂，華盛頓、莫斯科與重慶會議之舉行，反法西斯侵略陣線中、美、英、蘇同盟國家，在組織上形成起來了。與中國同站在一邊的，有美、英、蘇聯，有荷蘭，有印度及其他正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弱小民族。我們的盟友，不但在道義上，給與我們以支持，而且在物質上，亦給與我們以援助。這些友邦的援助，不但在金融上作貸款，而且在物資上作接濟。很明顯，這對於我國的戰時經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抗戰勝利的根據，顯然是自力更生，但外援之爭取，絕不能放棄。善於取得外援與利用外援，可以減輕抗戰中的許多困難，其次，國際政局與

之變化亦非偶然。中國戰時經濟。例如歐洲大戰之初，各國對於遠東採取姑息政策時，曾給與中國以不少援助，公國崩潰之後，其當政府拱手把安南讓與日本，因而切斷滇越鐵路，國際交通，使敵寇能繼續擴大後方以威脅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緬甸危急，滇緬公路將失去作用，因而形成大東方戰事變遷的局面。這一切，就是中國戰時經濟之對國際局勢之影響的明證。

事物的各種聯系條件是固定不變，而是互相轉化的。不重要的條件在發展的一定情形之下，可以轉變為重要的條件，相反的也是一樣。在戰前，我們可以看出國際局勢對於我國戰時經濟只有影響而沒有決定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中國，却有重要的作用。如滇緬公路的被切斷，對民族產業之發展，有極大的障礙，因為英美的重要器材之輸入與否，具有決定的意義。其他不重要條件在一定情形之下轉變為重要條件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又如內務條件與外務條件，亦難於固定劃分。英美對於中國，是發生外部條件的作用的，但以國際反侵略的兵士軍械來說，則英美與中國就成爲戰前各部份的聯系了。

這就是戰時中國經濟聯系之淺釋。只有把握這些對於戰時中國經濟有決定意義及重要影響的條件，才能了解中國戰時經濟發展的具體情形，才能知道中國戰時經濟是依倚什麼的，是條件變化的。

二 在運動着，在前進着

在運動間一切的事物，無一不在運動，在變化，在發展。戰時中國經濟亦復如此。

在前節，我們已看到戰時中國經濟的聯系性了。戰時中國經濟是與敵我的戰況，國際政治經濟之變化了敵我的經濟政策等等，緊密地聯系着。這些因素之變化與推移，必定使戰時中國經濟受到影響，起了反應，必定使戰時中國經濟不斷地在運動，不斷地在發展。在這裡，我們要問一問：戰時中國經濟之運動與變化，既是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表現，那末，這種運動的原因，豈不就是從事物之外部來的嗎？不，問題是不能這樣去把握的。戰時中國經濟與抗戰的大局，與國際政治經濟情況，與戰時經濟政策等等既是一體，即他們間的相互作用，就不應理解為外部的機械推動作用，而應該理解作統一的各部份的內部的相互作用了；就以戰時中國經濟的本身來說，它之接受影響，是以它的質和量為基礎的。如果中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則在戰時的物價問題與物資問題所表現出來的形態或許不同於今日；民族產業所受的打擊或許沒有今日這樣的嚴重。這更說明戰時中國經濟之運動性，是由於它的本身而不來自外部。

戰時中國經濟之運動與變化是多種多樣的，所以它們的形態亦是多種多樣的。戰時工業的情況與商業的動向完全不同，農村經濟的姿態，因地域之不同而呈現差異，各種物品的價格之上漲，在各個時期亦各有其特點，但各種形態雖有區別，却又不是毫無關係。例如物價問題與物資問題是有區別的。物價問題是指商品價格之「貴賤」而言，物資問題是指商品的供給之「有無」而言。但是，它們彼此之間，却是有密切關係的。物價問題的成因之一是供給不夠，供給不夠的原因由於戰時生產之遭受破壞與消耗之增加，更由於囤積居奇之與波作浪。供給不夠就使價格暴漲，這種情形再發展下去，就發生物資「有無」的問題了。故物資問題是物價問題的發展；物資問題包含物價問題的因素，比物價問題的內容更加複雜。這就是哲學上所謂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的

一轉化爲物資問題就是轉化。其次在游資的活動之下，外匯投機與囤積居奇又是兩個相互轉化的形態。再如銀行之直接經營商業，使銀行資本轉化爲商業資本；農貸之流入土劣豪紳手中，使銀行的農村放款，變成高利貸資本等等，都是很生動的事實。這些事實，無一不是在證明經濟的現象形態是在相互轉化的。

戰時中國經濟固然是在不斷地運動中，但並不因此就說任何相對的靜止都不存在。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百年來，中國的人民就在這種社會經濟之下掙扎着。「九一八」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的侵略，中國的經濟逐漸從半殖民地降到殖民地的苦海中。民族產業在重重的困難中艱難生存，農村經濟則在封建的剝削關係之下急速地破產。這種情形，在抗戰尚未取得最後的勝利以前，基本上仍是保持不變。這就是相對靜止的表現。不過，這種靜止畢竟是相對的。抗戰以來中國的生產關係，在某些地區已經逐漸起了變化了。某些地方，二五減租與一分減息之執行，是生產關係之逐漸改善，雇農與學徒的地位之逐漸改良，就是農村中生產關係逐漸改變的表現。生產關係在大後方，在戰區，在前線的工業合作運動，雖則沒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這種使小生產者能進行集體生產的合作經濟，的確是值得注意的。抗戰以前固然有合作運動，但以前只偏重於農村的信用合作，消費合作。工業的生產合作乃是抗戰以後之事。這種運動如果不遭受打擊而發展下去，將來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在某些地區，工業合作已做到由社員管理自己生產，已做到合作社的財產屬於全體社員。這是工業生產上一個新方式。其次有些廠主願意請工人參加生產管理，並在利潤中，明白地劃分資方勞方及公積金之比例。使工

人在工資以外多得一點報酬，使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能更加發揮其自動性。這是工業方面的另一個新方式。農業方面，在某些地區，人民以公家的生產工具，為公家進行生產，而直接從公家領得其生活資料。這種方式是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家資本的狀態截然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家資本，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最終是屬於少數人手裡的，在這種機關中工作的工人是不能參加生產管理的。工人與廠家之關係仍是剩餘價值的剝削關係，但在中國今日某些地區的公營經濟，却非如此。這些公營經濟的財產所有權是屬於人民而非屬於少數人手裡。在這種機關中工作的工人是能够參加生產管理的；工人的勞動過程並不是與價值增殖過程統一的。這種生產關係現在是在萌芽時期，還沒有普遍起來。這種情形，明顯地在證明哲學上所說的：世界全體是在不斷地運動中，不斷地有某些東西在發生發展着；不斷地有其舊的東西在腐朽和沒落着。

爲了更進一步把戰時中國經濟作爲一個過程來把握，我們必須分別研究：什麼是中國經濟應發展的東西，什麼是沒落和腐朽的東西，同時還必須找出發展的東西是依存於什麼條件；沒落的東西又是依存於什麼條件。

第一、戰時中國經濟中新生的發展的東西，我們已在前面指出，但應發展的東西，還不止此。國家資本是有發展的前途的；「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是有發展的可能性的；我們要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就必須對現代產業設法增進。在目前雖然有許多困難條件，但只要要在器材上、在資金上、在運輸上、在原料上、在租稅上、在技術與人力上，能盡量予以扶助，則某種程度的發展是很可能的。此外，在某些地區，取消了封建剝削後的中農貧農，經濟地位大爲增進，富農經濟之發展，亦是很有前途的。

第二、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指揮刀下的殖民地經濟，還夥強盜在中國中部和北方所樹立的銀行、商行、工業、礦業以至交通機關等，雖則有炙手可熱之勢，但牠們是不能順利發展下去的，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中華民族所堅持的抗戰到底的國策，註定了日本強盜的這些吸血機關的運命，它們紛紛散，到了我們把敵人逐出國土以後，這些經濟據點，便會重歸故主——中華民族——了。敵後抗戰軍民之活動與發展，則着着縮小了日寇的活動範圍，打擊了日寇經濟機關的經營。其次，農村中古老的地主經濟，亦是不能保持不變的。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我們的革命對象，是日本強盜，是漢奸賣國賊，但爲了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必須動員民衆；而爲了動員民衆，就必須相當改善民衆生活。在這裡，主佃的關係是必須改良的。這種改良，就要使原來那種生產關係起了變化。何況一些擁有大量田地的漢奸，有不少已受到應受的處罰，淪陷區中，中小地主的財產，已在敵人的鐵蹄下化爲灰燼了呢？現在縱然有不少吃地租的人物，在大韓民國積糧食的活動，比較戰前，向佃農向平民攫取更大的利得，但，這些人與那些囤積日用品的傢伙一般，前途並不光明。

戰時中國經濟就是新興的與沒落的因素交錯並存的場面，但並不是說，戰時中國經濟只有一直向上而無後退的局面。不，不是的。後退的情形是存在的。例如手工業與機器工業比較起來，手工業顯然是落後的。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爲了提高生產以補救機器工業之不足，我們必須提倡手工業。其次，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後方物資更加困難，人民所使用的物品亦就更粗劣了。這與戰前我們在上海的享受比起來，顯然是後退的。但實質上，這種後退，正是我們向前躍進的前提。因爲手工業是目前增加物資的方法之一，而節約與實用土貨則爲渡過難關準備反攻的

不可或缺的途徑。

由此可見：戰時經濟各方面的運動並不是一致的。這種不一致的步調，表現在有些東西在發展而有些東西在沒落；表現在有些方面在前進而有些東西在後退；表現在某些東西表面上落後而實質上前進，但無論如何總的方向是前進的，發展的。所以，我們切不可因為國民經濟有某些部份的後退而忘却了它的總的前進方向，亦不可因為日本強盜與漢奸資本的一時的發展而忘却其總的沒落的趨勢。

二 不平衡的發展

在前一節，當我們研究中國戰時經濟的運動性時，已經看出中國戰時經濟各方面在運動的過程中，極不一致。有的是在發展了；有的却停滯不前。有的在目前在表面上炙手可熱，但實質上却一步步沒落下去；有的在目前在表面上雖則表現退步與損失，但實質上却不斷地在發展。這個特性，是值得我們再加研究的。如果跟着這個方向再研究下去，便可以看出戰時經濟的發展底不平衡性。

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在抗戰以前，早就存在了。這種不平衡性是表現在：金融與商業之發達遠遠地超過了民族產業；外國資本在工業中之活動高大地壓倒了民族資本。在生產部門中，民族資本只能在紡織、麵粉、火柴等輕工業方面，稍稍有點作爲；而鍊冶業與機械業，則微弱得無法形容。在地區的分配上，亦是極不平衡的。上海在工廠數量方面，在資金額方面，在對外貿易方面，都佔全國總數之大半；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雖亦擁有一些工廠與銀行，但比起上海

是望塵莫及的。至於西南西北腹地各省，其貧弱之程度，更是用不着說的了。戰前中國經濟的
狀況，是明顯地爲我們所認識的。

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與日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不是一樣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行程，爲不平衡，爲跳躍式。舊的先進國往往被新進國家市場所排擠出去。這種程序之所以發生，是由於壟斷資本之出現；是由於某幾個帝國主義集團能够飛快發展技術，減低商品成本而奪取另一部份帝國主義集團底市場。這種情形，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固然會迅速反應出來。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的對比之不斷變化。在對華投資數目之消長上，在對華出入口貿易之增減上，隨時隨地，皆可看出這一點。但這只是一面而已。依上面所述，中國經濟不平衡性的內容，是包含得很多的，是很豐富的。構成這種發展不平衡性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的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資本主義列強——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握住了中國財政經濟的命脈，撤毀了保衛民族產業的藩籬，而中世紀的力量亦在發揮其反作用。這一切就形成了民族產業之衰落，商業按機之瘋狂與企業集中於沿海沿江少數大商埠的現象。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在這次抗戰中，起了一些變化。而這些變化又使中國經濟底不平衡性表現得更加深刻了。

戰時中國經濟底不平衡性，表現在下列各點：

第一是地區上不平衡的變化。日本強盜在盧溝橋事變後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把北方各省和華北各省廣大地區，淪爲戰場。在這裡，將近一百年的經營，完全燬滅了。佔全國紗廠百分之七十的紡織業，佔全國麵粉廠百分之五十三的麵粉業和火柴，硫酸等業，都在砲火與劫掠之下消滅了。但另一方面，在西南大後方，民族工業不斷地在千辛萬苦的情況下苦鬥出來。有四百多個

位從東南淪陷區，經過千山萬水，遷到後方來的；有幾百個單位是在後方新建立起來的。大後方過去樸素的原野，現在已披上現代化的外衣了。這是過去那種側重東南的偏在形態之一種否定。但從西北對西南來說，大後方的偏在狀態仍然存在着。陝西甘肅的產業，較諸西南，是差得很多的。以淪陷區來說，在敵人鐵蹄下踐踏的地方，經過敵人的「三光政策」之後，自然是一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但敵後抗日地區，因為當地軍民之努力，所以在農業生產上，在手工業生產上，皆呈現可以驚異的成績。這一些，證明戰時中國經濟在地區上發生了新的不平衡。

第二是部門間不平衡性的變化與加強。在戰前，中國的商業資本之活動，是超過產業資本的；而銀行與錢莊的經營，亦完全表現牠們不斷地在變成高利貸，變成商業資本。銀行的活動，侵蝕了工業，並且扼死了工業。這種情態，在戰時的中國，仍是不變的。看吧，現在的銀行資本，那一個不是從事於囤積居奇呢？囤積居奇使工業的原料供給更為困難，使工業的資金週迴更為枯竭。「工不如商，商不如囤」這一句簡單的話，已盡情地把當前商業金融壓倒工業的病態，描寫得清清楚楚了。這是經濟部門間不平衡性之加強。以工業之內部分來說，民族工業過去所抱殘守缺的是紡織、麵粉、火柴等輕工業；而煤、鐵、機器等重工業，則是薄弱得可憐的。大後方五年來的經濟建設，鋼鐵、機器、電工材料、化學工業各方面，皆有明顯的成績，它們在廠數上，或許沒有輕工業那麼多；但以資本額而論，以設備的規模的論，以雇用的職工人數而論，重工業的比重是超過輕工業的。這種情形，是戰時不可見的。此外，尚有一種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原料的價格高而製成品的價格呈現着對的減低，鐵與酸的生產，遠超過它們的消費。這是各生產部門間不平衡的新形態。

第三是日寇在華的經濟力量，對於英美，呈現了壓倒的優勢。在對華貿易方面，日寇從民國二十七年以後便壓倒美國而居於首位；在航業的噸數方面，日寇自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以後便壓倒英國而佔首位；在工業的投資方面，日寇自從成立「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以後又壓倒英美而居首位。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佔領上海租界與香港以後，英美在東亞的權益更是一掃而空了。日寇企圖實現其獨占東亞的迷夢。列強在華經濟權力的不平衡性，深深地起了變化了。

第四是物價增漲中的不平衡性之變化。在抗戰初期，原料和出口品農作物的價格與工業品的價格，作剪刀形的發展。前者着着下降；後者節節上升。到了民國二十九年入秋以後，物價又在另一方面暴漲起來。這就是糧價之不斷地發展。三十年的六七月間，漲到駭人的程度。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糧價還屬平穩，但入口的金、藥品、布疋、電料等，却瘋狂地在作幾何級數的飛奔。不到四個月的時間，竟漲了數十倍。物價問題是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具體表現。

爲什麼中國戰時經濟呈現這種不平衡性呢？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不能不指出日寇的侵略與我國的抗戰。日本強盜在盧溝橋事變以來的大舉侵略，突變地加強了「九一八」以來它在中國所佔的優勢。因此，過去那種依據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的均勢被打破了。英美在華的權益被日寇打得落花流水，而中國民族資本沿海沿江的據點，更在敵人的砲火之下被摧毀了，淪陷區中廣大的地區被蹂躪了。對日戰爭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國際政局之變化，亦是不可忽視的。在法蘭西崩潰以前，更切實說，在法國人民陣線

未垮台以前，安南是我大後方良好的國際運輸道；但貝當當國之後，越南淪入敵手，滇越鐵路便失去作用了。這是影響大後方的出入口貿易的。香港之陷落與仰光之棄守，亦是給與中國經濟莫大的影響的。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握有游資的人們，看到物資來源之困難，於是更事囤積，更加發揮其游資的作用。不但銀行與商業資本的活動更加壓倒工業，而工業本身亦竟游資化起來了。這不是國際政局的變化，加強了中國戰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麼？

再其次，應該提到游資的活動。游資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在戰前早就存在着。但抗戰以後，因為種種條件（以後將有專題論及），游資在數量上在活動範圍上急遽擴大起來。游資之活動，加強了投機囤積之風，加深了各部門間的不平衡性；增強了物價波動的程度。最後應指出健全的政治，具有促進生產的機能，因為進步的健全的政治可以除去生產的桎梏，可以減輕勞動生產者的負擔，可以提高他們對於生產之熱忱。反之，如果有些人能夠利用其權力權力去從事囤積，如果生產之發展處處要受到障礙，如果經濟行政沒有通盤的計劃而枝枝節節去從事，如果管理這一事業的人物不能廉潔自好，那麼，生產是無法發展的，囤積居奇是無法禁止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自然更加利害了。

中國戰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實踐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在一方面，我們應該把握住一些弱點而加以克服，即是努力消滅一切脫節的畸形現象；而另一方面應當把握住：戰時經濟發展之不平衡性，使敵後抗戰地區在經濟上有突破敵人封鎖之可能；使西南西北大後方，在某種限度內，有爭取自給自足之可能。但這是需要我們主觀的努力的，否則，這種不平衡性將無法發揮其對於抗戰有利的作用了。

四 從敵我對立展開出來的矛盾性

在前面，當我們把中國戰時經濟作爲一個過程來把握的時候，曾經指出在中國戰時經濟中有發展的前進的因素，同時亦有沒落和腐朽的因素。這些因素，並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各自孤立，而是緊緊地交織在一起，互相聯繫着，互相對立着矛盾着。因此，我們必須進而研究中國戰時經濟底矛盾性。

要明白中國戰時經濟的矛盾性，必須先弄清戰時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在那裡。

日本強盜與中國之間的矛盾，就是當前的主要的基本矛盾，故在經濟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在華的殖民地經濟與中國的獨立自由的國民經濟之間的矛盾，就是中國戰時經濟最主要的基本的矛盾。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一步緊過一步地實行了殖民地化與獨占中國的強盜劫奪政策，「農業中國與工業日本」的要求，中國北方各省與中部各省，日寇經濟勢力之迅速擴大，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當作它的獨占的殖民地底明目張胆的表現。這樣一來，把一般資本主義列強與中國的民族矛盾，變爲特別突出特別尖銳化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了。蘆橋事變以來，這一矛盾又更趨更利害的展開出來。日本強盜侵略的砲火，把東南海各城市的一點民族工業，加以焚燬了。把淪陷區中那些劫後殘存的民族工業，用合辦的名義加以吞併了。其在淪陷區農村，廣漠的田野與人民的廬舍，都在敵人的鐵蹄踐踏之下，變成廢墟，其害敵後由我軍民所克服所捍衛的地區，敵人不斷地舉行其所叫掃蕩，進行其搶光燒光殺光的「三光政策」；其在大後方，日本強盜的走私與轟炸，亦部份地給與我國的經濟建設以打擊。這一切，證

明中國的國民經濟是與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殖民地經濟不能並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化中國的政策，不獨使中國的民族產業，沒有發展之可能；不獨使一部份地主與廠家失去其財產，而且亦使國民失去其僅有的生產手段，使工人比以前受到更大的打擊。所以，中華民族如果不爭取抗戰之最後勝利，則任何人都有做亡國奴之危險。

在抗戰中的中國，任何階層的利益是不能離開民族利益而獨存的，但事實上，却有少數民族敗類，在大幹其與民族利益對立的事情，大幹其出賣民族利益，妨害民族利益的事情。大漢奸汪精衛王克敏之流，在淪陷區中爲敵人維持統治的中小漢奸，以及爲敵寇佔領區繁榮經濟的工商金融界敗類，其認賊作父，爲虎作倀的罪惡，是昭然若揭的，除此之外，還有某些人在利用抗戰，大發其國難財。他們利用其特殊條件，利用其自有或調度得來的資金，從事投機囤積，從事居奇操縱，破壞正當的金融市場，破壞正常的商業貿易，破壞民族工業之生產。這種行爲，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完全是在妨害抗戰，破壞抗戰的。破壞民族利益的少數民族敗類與爲民族利益而奮鬥的廣大民眾之間的矛盾，是與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同時並存的，不但同時並存，而且是緊密交織在一起。

戰時經濟現象之動盪，是從這些矛盾展開出來的。親愛的讀者們，讓我們花一點工夫，來看看這些矛盾是怎樣展開出來的吧！

第一是生產趕不上消費，供給趕不上需求。這種現象是每一個國家在戰爭時期所共通的。因爲戰爭的時候，國家的生產力，都集中在與國防有關的企業上，日用品工業之生產則逐步緊縮，而同時，砲火之推毀，使多少生產機關遭受破壞，使多少有生產能力的人民喪失了生命，這樣，

雖然廣大的民衆，因戰爭而窮困，而失去其購買力，但戰爭的消滅遠遠地在生產與供給之前。戰時的中國自然不能例外，但中國之這種現象，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工業本來就不發達；日寇的侵略，破壞了東南沿海一帶的工礦據點，劫掠了海峽區中過去比較大的工礦業，大後方工業之移入興建，雖然有着某種成就，但器材因運輸不暢而感不到；原料因操縱而感覺困難，這都是使生產落後於消費的。此外，在人事上，某些不應存在的現象之存在，又益使生產趕不上消費，供給趕不上需求。如果我們細心研究這個問題，就可以明白這是上面所說的矛盾之展開了。

第二是物價與社會購買力的矛盾。生產趕不上消費是物價上漲的一般原因，但當前物價之暴漲，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這就是國積居奇。從二十九年下半年起，這種風氣，便大大的增長起來。不論舶來品與土貨，只要與國防民生有關，便逃不了國戶的追蹤。這一因素是與通貨問題聯系的，於是物價便扶搖直上了。物價漲得高，則商業利潤囤積利潤亦跟着越高。但，這是一定限度的。物價高得太利害，一般民衆的購買力便作反比例的下降，如是，工商業之繁榮便被否定。從三十年春戰時景氣之消逝，就是明證。而事實上這個邏輯的結論，是以日寇的侵略作為大前提，以民族敗類之發國難財作為小前提的。

第三是生產與貿易之間的矛盾。以正常的情形而言，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是互相依賴的。從流通過程中，廠家可以獲得原料與勞動力，可以出賣其已製成的商品；反過來說，流通過程又以生產為前提，如果生產過程中斷了，則流通過程便要受到極大的影響。總而言之，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是辯證地在統一着。雖然對立，但並不對立到分裂的程度。今天的情形，却是兩者走

到分裂的狀況了。因為遊資之活動，因為囤積居奇之風行，正常的貿易被搗亂了。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時時刻刻在獵取囤積對象，以人爲的方法，使物價飛漲，不但如此，他們爲求得更高的價格，總是不肯放手，這麼一來，工廠所需要的原料器材便更形困難了。在出賣製成品方面，物價高漲固然有利，但中小廠家因爲自己沒有販賣機關，自己沒法把商品直接銷至市場，而必須經過中間人，於是，物價高漲的利益，完全落在中間商人之手了。在資金之挹注下面，銀行資本多從於商國之經營，於是企業要通融資金，亦感覺到加倍困難了。這一切，說明今天這個在質上起了變化的流通過程，與生產過程是不協調的。它已走到與生產過程分裂的程度；它處處妨礙工業生產之發展。

第四是產業資本本身的矛盾。民族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今天游資的活動，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之搗亂，惡化了民衆生活，亦打擊了民族產業。可惜的是：民族資本在這個囤積居奇的濃霧中，亦被同化了。有不少廠家從生產提出一部份資本，組織商號，囤積其所生產的商品；有不少廠家甚至於只掛着工廠的招牌，空着煙囪不出煙，以其資金，進行原料品之囤積。這麼一來，生產便會一天比一天緊縮了。而在進行生產的廠家，沒有從提高工人的生產情緒方面去努力，反而在打小算盤方面着眼。這亦是與發展生產背道而馳的。

此外，某些辦法的目的是爲了調整生產提高生產，而因爲種種關係，却提高了生產的成本，拖延了生產的過程，降低了生產的效率。農貸與工合，已提供了不少痛心的例子了；在現代化的工業方面，亦何嘗不然？這種矛盾的現象，如果不克服，戰時經濟生產是無法提高的。

戰時經濟這些矛盾的現象，並不是偶然的。牠們都是戰爭中的中日民族矛盾與少數民族歧視類

對於國家民族的矛盾所交織出來的產物。我們必須弄清這些矛盾，必須把握我們的根源。在某些場合之下，我們固可利用一些與我們對立的因素。如敵偽漢奸之走私是對我們有害的，但我們還採一些爲我方所需而自己尙不能大量生產或未能自給的商品，讓其入口；投機家之囤積居奇是對國家有害的，但我們如果處理得好，克服其囤積居奇的方面，而獎勵其從邊境運入物資。爲了抗戰的利益，權宜的使用這種辦法未嘗不可以。不過，這都是在一定條件之下的相對的看法和做法，基本上，我們只有與侵犯中國的日本強盜作戰到底，與這些妨害抗戰民族利益的敗類抗爭到底，換言之，只有驅逐日寇出中國，只有消滅漢奸偽組織，只有處決破壞民族利益的敗類，才能克服當前的困難，才能使生產提高起來！

戰時經濟是一個過程。在今天，我們的經濟力量雖然不及敵人，破壞民族利益的敗類，雖然炙手可熱，但無論如何，只要我們堅持抗戰，牠們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因此，我們認識飛快的大步前進的經濟建設，只有在抗戰成功之後。但在抗戰期間，經濟建設亦並非不可能，不過，數量比較有限罷了。這就是從數量到質量底轉變。這就是我們在總的方面把握中國戰時經濟所得到的**一個概括的提示。**

三



第二章 戰時中國經濟底動態

一 從「七七」到武漢撤退

第一章是去認識中國戰時經濟的，以下我們將從抗戰的進程中去觀察中國戰時經濟的變化。為了把握這些變化，讓我們暫且把粗分成幾個時期去研究吧！截至目前止，抗戰以來的中國經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這就是：從「七七」到武漢撤退，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從太平洋戰爭到現在。這些時期，是各有各的特點的，現在先說第一個時期。

中國戰時經濟第一個時期的特點是淪陷區工農業的遭罹浩劫；是國內經濟據點的逐漸轉移。為什麼中國戰時經濟在這個時期裏呈現這些特點呢？很明白，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民族資本所經營的廠礦，大半都是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而在武漢撤退以前的十六個月中，因為特定的歷史條件與主客觀力量之優劣，使我方不得不採用戰略防禦，在消耗敵人力量的原則下，以空間換取時間。故隨着領土之暫時喪失與敵人之摧殘，建築在沿江沿海經濟據點上的民族工業與「華北」江蘇一帶的農村，便不免遭罹浩劫了。而在另一方面，為了繼續抗戰，為發揮大後方發展經濟之可能，一些民族資本之西移與在西南各省之工礦建設，便改變了過去側重沿海的偏在狀況，造成國內經濟重心之轉移了。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淪陷區中工農業所遭受的浩劫吧！

據各方估計，春盧滯橋事變以前，全國屬於民族資本的紡織業，紗錠約三百萬枚，布機約二萬五千台。抗戰爆發之後，因為敵人砲火之摧毀與劫奪，因為擱置在戰區中無法生產，因為出售與第三國商人的原故，華商九十六家紗廠中損失了六十家。紗錠之損失其可以計算得出來的將近一百八十萬枚，布機之損失，其可以計算出來的將近一萬八千台。如果把小規模的染織廠計算在內，則損失紗錠當超過二百萬枚，佔總設備百分之七十；布機損失額所佔的百分比，亦復如此。麵粉業方面，戰前全國有一百一十家，其中以上海及江蘇、山東、河北的出粉能力較強，幾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八十強。抗戰以來，敵人所摧毀的正是這些地方。估計麵粉業的損失，廠數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產粉量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火柴損失百分之五十三；蠶絲業損失百分之五十強；造紙業損失百分之八十四；鹽業損失百分之八十；製碱量損失百分之八十二。其他如開礦與冶煉業，亦受到極大的打擊。據經濟部的調查，「八一三」以後，上海被燬工廠二千三百七十五家，損失資金五萬萬元，上海以外，在部註冊的被燬廠數亦達一千四百六十五家，損失資金二萬四千萬元，合計全國被燬廠數三千八百四十家，損失資金七萬四千萬元。據中央工廠檢查處根據修正工廠法第一條民國廿四年上半年之調查統計，各省市工廠法之工廠數為六千三百四十四家。以此為標準則損失廠當佔全數百分之六十；資金損失之百分數，如果以國民政府主計處統局所編之統計提要為根據，則這一損失額將達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登記工廠資本額（三萬九千零五百四十萬零九百六十五元）之一倍。這還只限於被燬的工廠而言，如果把被劫奪的算在裡面，則民族資本之損失，更是使人驚心動魄的了。

其在鄉村之破壞與敵寇之劫掠蹂躪，耕植就大量的被破壞着，牲畜農具與種子就大量的被摧毀着。根據本局的報告（民國廿八年一月），全國七十六萬萬餘畝中，就有四十餘萬萬畝被破壞着。據估計全國二千三百萬頭耕牛中，就有八百餘萬頭變質損失的。主要農產品的損失量，最少是百分之九，最多的竟達百分之八十。這一幅慘淡的圖畫，是日本強盜在中華民國內的大地上，用火與血畫出來的。但這些簡單的數字實在未能反映出敵寇只能使我們的腦海裡，僅僅有輕描淡寫的印象。史道博士在江寧，勾容，溧水，溧浦及六合等縣的調查，比較詳細點。在這四個半縣內，無辜被殺的農民達四萬人，農家所遭受的損失，房屋四千四百萬元，牲畜六百七十萬者，農具五百二十萬四萬元，贖谷四百二十萬充，農作物損失七十八萬五千元，總計四千一百萬元，平均每家損失二百三十元。如果以史道教授的調查（東南農家每年大款二百八十九元）作標準，則江南農家之損失，就等於其收入四分之三了。這是抗戰初期敵人所給與中國農村的摧毀的一個例子。跟着抗戰之進展，跟着敵後人民之奮勇抵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之飄揚，敵人對於農村之摧殘亦就更加利害。所謂殺光搶光與燒光的「三光政策」就是明證。我們將有機會更詳細的討論這道問題。但以抗戰初期敵人的摧毀而言，農村生產之受到打擊，可說是空前的了。

淪陷區中工業之遭屠浩劫，對於整個國民經濟之影響是很大的。這一浩劫破壞了中國民族資本八九十年來在東臨沿海之經營，毀壞了中國中部和北部各戰區的經濟，創設了後來幾年中國工業農業的生產能力，成為物價問題與物資問題的嚴重因素之一。不過，在另一方面，却包含着一種激勵作用。它肯定了過去那種產業集中在東南的偏在狀況，使西南大後方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漸漸提高起來。現在之讓我們看一看經濟點轉移的輪形吧。

第一、香港在中國經濟地位的地位——一直到它落入敵人之手止——越來越見重要。在國軍西撤之前，過去執中國經濟牛耳的上海，無論在工業上，在貿易上，皆一落千丈。五千二百多家工廠，在「八一三」以後三個月的砲火中，燬壞了二千三百多家。從二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七年一年間，上海的出口額減四萬七千八百餘萬元，入口減少了二萬六千五百餘萬元。反之廣州、汕頭、九龍、北海各港之日入口貿易則大為增長。計出口增加一萬五千五百餘萬元，入口增加八千七百餘萬元。以百分率來說，上海的出口在全國總額中從戰前百分之五十二，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九；廣東各港則從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入口方面，上海從戰前百分之五十九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七。廣東各港則從戰前百分之十，九增長到百分之二十五。華南中國各港貿易之增加是與香港息息相關的。因為南中國各港貿易之增加，使香港代替上海成爲這一時期對外貿易之中心。就是二十八年以後，上海工商業漸漸恢復，但香港在經濟上的地位，不但未嘗降低，反而日益重要起來，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陷入敵手之時爲止。

第二、沿海沿江的產業，雖遭受砲火的摧毀，但一些尙未接近前線的地方，却呈現着特殊的繁榮。以棉織業爲例，上海戰爭爆發後，長江北岸的通崇海區與武漢，成爲主要的生產中心。在武漢退出以前，那兒的紗業陶醉在空前未有的美景中。戰前每一包紗的利潤，最高爲二三十元，布疋每疋獲利一二元的即爲不易得之現象。抗戰爆發後，棉紗每包利潤竟達百元，布疋每件純利達三四元，總計武漢各紗廠每日獲利約在六萬元以上。這種不平衡的現象證明沿海的民族工業雖被摧殘，但後方發展企業的可能性，顯然存在着。

第三、爲了支持抗戰，爲了大後方發展企業的可能性之吸引，沿海一些眷遠見的民族資本家

在千辛萬苦中進行遷移。在遷移的過程中，不容諱言的存在着若干缺點，第一是發動遷移的工作做得太遲，它是在抗戰爆發以後才開始的，因為發動得太遲，所以遷移的廠數並不多。上海五千多家工廠中遷移的只有一百五十二家，連同無錫、南京、鎮江各地遷出的廠，才二百餘家。這無疑是不夠的。第二是遷移的廠家們沒有下決心遷入較安全的後方，都想在武漢任下去。到了在武漢發現徵用土地建設廠地均成問題之時，才計議作第二次遷移，這麼一來，時間與經費都不知浪費了多少。雖然如此，這一部份遷移之工廠，仍是值得我們稱揚的。三十二年元旦遷川工廠聯合會在重慶所舉行的展覽會，就是抗戰初期廠家與職工為遷移工廠而流汗的汗水所培養出來的美麗的花蕾。

這就是從「七七」到武漢撤退期間的經濟概況，在這裡，雖則沒有詳細地分別研究各部門的情形，但把握這二點——淪陷區中工農業浩劫與經濟據點之逐漸轉移，是必要的，因為這二個特點，是後來各個時期戰時經濟發展的條件。

二 從武漢撤退到歐戰爆發

從二十七年十月底（我軍退出武漢）至二十八年八月底（歐戰爆發前夕）這十個月時間內敵寇侵華的軍事策略是「重視敵後」與「相機進攻」。配合着這一軍事策略，敵寇所採取的經濟侵略政策是「以戰養戰」。「以戰養戰」的主要辦法是攫取外匯和祖國淪陷區的資源。在這種情形之下，貨幣戰爭便成爲主要的節目了。

事實上，中日的貨幣戰爭是從二十七年春天就開始的。敵寇在「中國北部」成立的偽軍國聯

合準備銀行，就是這「節目」的序幕。爲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在攫取「中國北部」淪陷區的外匯。針對這一點，我國政府便於是年三月實行外匯統制了。外匯統制實行之後，法幣外匯便產生黑市，而黑市匯價則是步步下跌的。二十七年八月間黑匯竟跌至七·九五二便士。但劇烈的貨幣戰爭是在武漢撤退以後。

，讓我們看看敵寇在這個時期貨幣戰勢之戰術吧。在中國北部，敵寇宣佈自二十八年二月下旬起，貶抑法幣價值在偽滿鈔六成之下，至是年三月十日即禁止法幣的流通；在中國中部，敵僞於同年五月又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發行偽華興鈔。但偽華興鈔是與法幣發生連系的。敵寇此時在中國中部所幹的勾當，雖與它在「北部」所幹者不盡相同，但其集中法幣以套取外匯的陰謀，却是一貫的。

爲什麼敵寇在這個時候有攫取外匯之可能呢？因爲自二十七年八月下旬以後，我國政府的外匯政策是以極大的資力去維持黑匯行市，中央銀行的外匯準備金額對於請求金額之百分比率，此時降至百分之一，每週只在一萬鎊以內，而市場的需求則遠在這個數額之上，故軍趨黑市，黑市的力量一天比一天高漲了。爲了對付黑市外匯，匯豐銀行於二十七年八月底即開始協助穩定上海黑市？我國的國家銀行則建立小規模的平準基金以維持黑市。二十八年三月向英國借款五百萬鎊，與中交兩行共同成立一千萬鎊的匯兌平準基金。這樣，從二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八年五月，黑市外匯便定於八便士四分之一的水準之上。

法幣外匯之這樣穩定，是以犧牲平準準備基金爲代價的。敵寇正正看準了這一點。在二十八年五六月間，據說敵寇曾集中一萬萬元的法幣，向外匯黑市進行衝擊。爲了對付敵寇之攻勢，政

幣即於是年六月七日宣告改變政策：黑市外匯即開始波動，至該月十日英匯跌到六便士半。這個水準又維持了一個短時間。到了是年七月十八日，政府又放棄這個水準，於是跌風又起。十八日由六便士跌至五便士半；二十日跌至四便士半，以後逐漸的連跌較快。八月七日又因種種壓力，匯率突破四便士六分而下瀉，到八月中旬便跌至三便士。八月底匯率回測，但總未能達到四便士。

這一幅外匯波動的圖畫，是包含很豐富的內容的。它呈現了中日的貨幣戰爭，表現着中國政府以放棄維持黑市外匯的辦法，使敵人奪取外幣的力量，打了一個很大折扣。據稱擁有五千萬元資本的偽華興銀行，在這種打擊之下，其所巧取的法幣資本，就突然減值一千二百餘萬元；敵寇在全中國各地之無恥走私，其所得之大量法幣，亦因為幣市縮而貶低其價值了；敵寇在上海的各銀行，多是從黑市取得外匯，以付償其對印度澳洲等處所購買的商品的，但經過法幣匯率驟低以後，力量便大大削弱了。其次，外匯黑市之不再維持，不但有對付日寇之作用，而且對付一些民族敗類從事投機的作片。政府在這個時候所頒佈的三道辦法令——「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進口貨物申請購買外匯規則」。這些辦法在實行上，雖有許多未盡善之處，但我在談到外匯投機的鬼類上，是相當發生一些影響的。因為在一方面既不維持相當高價的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在某一限度之內，又限制外匯之申請。於是外匯的投機便逐漸削弱了。外匯投機這條路既經縮小，滾滾的遊資狂流，便傾其力量去搶購商品。這就是將來物價高漲的「張本」。而同時放棄黑市之維持，減輕了我國財政上的負擔。

外匯之不斷波動，對於各方面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有一些問題就環繞着外匯問題之緊張

而緊張起來。

第一是對外貿易統制的問題。因為政府要統制外匯，就必須控制外匯之來源，而爲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統制出口貿易，從出口商取得外匯。早在二十七年三月間，政府就進行這一工作了。這麼一來，便發生了出口商對於外匯黑市利益之爭論。因為政府所規定的匯率，美匯爲法幣百元值美金二十九元又四分之三，英匯爲每法幣一元值英金十二便士又四分之一；而當時黑市匯價，美匯却在十六元左右，英匯則僅七便士餘，法定匯率僅爲黑市之七折。於是出口商人便起來要求改變外匯之法價，否則，「亦應由國家以獎金或津貼等名目，補償其匯價上之損失」。當時沒有什麼結果，想到二十八年一月，政府乃將應售結外匯的二十四種商品，減少成爲十三種；二十八年七月所頒佈的「出口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又將應售結匯商品，減少至四種——桐油、茶葉、豬鬃、和礦產，而且規定「依照法幣結匯之出口貿易，於實收結清匯額後，得憑結算證件，向結匯銀行取得法價與該行掛牌價之差額」。在這個過程中，因爲某些辦法之未善，致在出口貿易上，受到若干影響；而逃避結匯者，亦時有所聞。

第二是敵人之加緊走私。敵寇在淪陷區中以暴力參取法幣是一種辦法；而以劣貨向淪陷區及後方走私以取得法幣是另一種辦法。二十七年一年，日貨在淪陷區傾銷達二萬萬餘元，爲全部入口額百分之六十。二十八年上半年在上海之傾銷就達八千萬元。對於後方各埠，敵人的走私，約可分爲四路：第一路是從上海經蚌埠北上入西安；第二路是由溫州，經浙贛路，向贛、湘、兩廣進發。浙贛路竟至有「敵貨列車」之雅號；第三路是以宜昌爲集中點，再由該地輸至鄂西、湘西、豫南和川東；第四路是由廣州灣經廉江、陸川而集中於鬱林，由鬱林流入桂、黔、川南。據說

當時每日進入市場的貨，總數在三千担以上，每担平均以一百五十元計，則每天便要以四十五萬元送敵了。敵人是必然用每天這四十五萬元去套取外匯的。

第三是某些好商市會，藉口外匯緊縮而提高物價。外匯緊縮之結果，必然先引起舶來品和以進口貨為原料而製成的貨物的價格之騰貴，接着，那些販賣可以代替進口貨的國產貨物的商賈，亦乘機將價格提高。在上海，外匯緊縮之後，汽油、五金、西藥、皮革等，均告漲價，而與外匯無關的物品如白米，亦跟着漲價了。在重慶亦未嘗不如此。就這樣，由外匯之波動影響到物價之波動了。

這就是環繞着外匯問題而緊張起來的幾個問題。接着，我們必須看一看敵人在產業方面的掠奪。如果前一時期，敵人在淪陷區中是側重於搶掠而破壞，那末，這一時期敵人的策略就改變為「開發」重於搶掠，「建設」重於破壞了。因此，敵人不但組織了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和偽「華興銀行」，作為壟斷中國資源的工具，不但集中法幣套取外匯，向歐美購買設備中國的軍火，而且組織了「華北開發會社」和「華中振興會社」，作為直接壟斷中國資源的總機關。

在「華北開發會社」之下，交通方面，成立了「華北交通會社」，經營「中國北部鐵路及其附帶事業」——如港口公共汽車等。電信方面，成立了「電信電話會社」，經營有線、無線電報及電話。礦業方面，敵人開始組織「興中公司」，接收河北、山東、山西等省之礦，後改爲一業數社主義。二十八年春間，井陘、正豐、中興各礦，已達「七七」以前產量，除開採外，敵在中國北部，一年可竊取煤八百萬噸；銅鐵則以龍煙等礦為中心，統計在這個時期，每日被竊量有三百六十噸至四百噸之間，以一年計算，恐要達到十四萬噸了。電力方面，則將「蒙疆電業開發會社

「天津電業公司」、「冀東電業公司」合併爲「華北電業會社」。

在「華中振興會社」之下，敵人成立一個掠奪網，交通方面，有「上海內河汽船公司」，以上海爲中心，經營蘇州河、黃浦江上游的七條航線，江海交通有「天利汽船公司」和「華中汽船公司」，公路運輸方面，成立了「中央汽車運輸公司」，將滬寧、蘇、杭的火車予以連接，電信方面，成立了「華中電氣通信株式會社」，經營日僑間及「華中」各都市間的有線無線電報電話，與歐美及南洋取得聯絡，以至恢復中國中部和北部的海底連絡。礦產方面，則成立了「中華鐵礦株式會社」，以江、浙、皖三省的二十餘處礦山爲榨取對象。

敵人這種咀吸我國資源的毒計，是很難達到它的願望的，但亦不可過於低視。不管在資金上、在器材上、在技工上，敵僞要遇到很多困難，但根據這幾年的事實，敵人在某一方面之內，的確是盜取了我國不少資源。要有效的阻止敵人的搶劫盜取，只有發展淪陷區的游擊戰爭，以主觀的力量去直接摧毀敵人的一些經濟機關。在這方面，做得最有成績的是深入敵後的英勇部隊與職工的各界同胞。這是值得我們去發揚推動的。

其在後方，則在進行經濟建設的工作，而內遷工廠之籌備復工與新設廠礦之籌備開工，就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事件。據國民政府主計處設計局出版之「統計提要」，截至二十八年年底，內遷工廠共四百一十家，復工者二百七十二家。計湖南省有一百一十九家，復工者一百十八家；四川省二百十九家，復工者一百一十七家；陝西二十六家，復工者十六家；廣西省二十三家，復工者十三家，其他各省二十三家，復工者八家。內遷機器原料噸數共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噸，據趙銘先生之估計，計湖南佔百分之二二、四五；四川佔百分之六三、二〇；陝西佔百分之〇、一九；廣

四佔百分之〇·四九；其他各省佔百分之〇·四五。這些簡單之數字，告訴我們：西南大後方各省是逐漸在披上現代的外衣的，但西北各省，所佔的工業則較少。這仍是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內遷工廠之籌備復工與新建廠礦之籌備開工，仍是在艱苦中奮鬥的。第一件事是資金之困難。許多內遷之工廠，在遷移的時候，已耗去其大量的資金，並且在途中損失不少器材。欲復工，沒有資金是不行的。而且物價逐漸上漲，建廠開工所需資金，日益浩大。這個時期，聞政府曾對私廠放款九百萬元，其中由國庫撥出的佔四百萬元，餘經政府担保，由銀行放款。用途爲：遷移放款八十萬元；建廠放款五百七十萬元，流動資金二百三十五萬元。這項放款，從民族產業之需要看來，還是差得很遠的。第二件事是器材之困難。遷移之廠礦亦運入一些機器原料，但爲了補償損失與擴大規模，現有的器材，仍是不敷應用。因此，除積極在後方設法自產外，其不能自製的器材，仍非仰給於外國不可。但在這時期，更碰到兩個困難：其一是交通運輸之艱苦。這其間，廣州已失陷了，西南大後方只有依靠滇黔鐵路（在法蘭西開辦以前）。其二是法幣外匯之緊縮。政府對於正當需要是可以核實外匯之申請，但事實上仍有不少困難，更廠礦不易以法幣購得外匯而不得不以高價求諸黑市。外匯黑市之不斷波動，更這些從事於生產的廠家加重其負擔。第三件事是發展經濟的阻力，不但未加削弱，反而利用種種方式，在變本加厲着。有一些廠家因爲不能順利地買得地皮進行建廠，有一些廠家因爲原料與產品之來源和銷路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因而不得不縮小生產規模。製鹽與煤礦業就是如此。第四件事是敵機之不斷轟炸，使工廠之建立，遭受很大之損失，有不少工廠正在延遲廠基，就遭到轟炸而延緩其開工的時間。有不少工廠已經開工，亦因轟炸而不得不停止生產並不得不縮小生產規模。紡織業就是一個例子。第五件事是技工之

缺乏。據統計，內遷技工人數祇有一萬餘人，以這個數目來分佈在內遷工廠，每廠祇有二十餘人而已。而且，從擴大生產的立場看來，高級的專門人材亦是不夠的，以鍊鋼來說，國內專家能有幾人？這就使生產擴展受到限制了。

生產事業在這個時期是有若干成就的，但其困難處，我們不能不指出。只有克服這些困難，才能使產業在後方開展起來，才能為抗戰之勝利奠下物質基礎。

三 從歐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

從二十八年九月起，中國的戰時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敵人對我的進攻軍事並不是主要的因素，所以，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沒有了。但是，過去二十幾個月戰爭的影響——廣大領土的暫時淪陷，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毀滅，痛苦的創傷，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了，而同時，因為歐洲大戰的爆發所引起的國際政局的劇烈變化，亦在發生影響。於是，這些特點，乃更鮮明地呈現出來。

歐洲大戰對於中國戰時經濟的影響是不少的。因為歐洲大戰的爆發，許多逃亡在外的資金流回來了；貿易上，入口突見減少，國別的比重突見變動了；運輸上，因為安南之陷入敵手而大感困難了。這些因素，分明是影響了中國的戰時經濟的。除此之外，日本強盜又利用這個時機，迫逼英美讓步，加緊對中國的封鎖與經濟進攻。因此，困難的陰影就更顯著了。

這個時期，戰時經濟的困難的重心，是物價的逐步上漲。各地物價，自「七七」事變之後，便發生了一些變動。變動的形態，每個時期各有其特徵。以第一時期言之，出口農作物的價格與

工業日用品的價格，是作着剪刀形的發展的。前者因為上海的陷落，沿海口岸之被封鎖，出口受到障礙而跌價；後者則因生產機關之破壞和運輸之不便而逐漸提高其價格。武漢撤退以後，農產品的價格，便逐漸提高了。提高的程度雖不及日用工業品之速，但與第一時期比較起來，顯然是不同的。到了這個時候，各種物品都一致漲價。以重慶的各種物價指數為例，二十八年十月份的總指數突破了一十六年上半年平均數的三倍，達到百分之三三·五，以後逐步上漲，至二十九年十二月達到一、二二三·七，三十年十月竟達至二、二八四·八的高峯。在其中，工業生產產品的價格，仍佔重要。計總指數二十八年為二四一·三，二十九年為六三四·八，三十年為一、七八四·六，而工業品全年的平均數，二十八年為四四一·二，二十九年為一、〇二七·三，三十年為二、二二〇·七，但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價格，亦在這個時候急速上漲。二十八年十月份的糧價比突破二十六年上半年平均數的百分之一百，以後亦急速暴昇，至二十九年十二月達到百分之一、二一七·三，三十年十月竟達到百分之一、八五〇·一了。不但重慶如此，其他各地亦莫不如此。昆明的物價，甚且比重慶漲得更利害。至於處在敵偽鐵蹄下的上海，南京與北平等地，物價的扶搖直上，更是不待言的了。

物價暴漲的原因很多：第一是生產機關的大量破壞。後方雖不斷移入工廠，努力開工，但規模大的，一般仍未能在這個時候出品。第二是交通運輸的困難。二十九年五月間宜昌失守之後，浙東線的貨物不能再由金華經茶陵而至宜昌；廣州線的貨物便不能再由衡陽而轉宜昌了。不但上海的貨物不能利用大江的航運，經宜昌而大重慶，而且川黔的貨物，亦不能通過宜昌而至湘鄂了。至於敵寇之在安南登陸，其給予後方的影響更大。滇越鐵路被占之後，海防便失去其為運輸的

樞紐的作用了。不要說該路封鎖後的影響，就以當時的情況而論，留滯越境而後日寇沒收的華商貨物就有十一萬件之多，價值約值二十萬萬元以上。交通越困難，入口的貨物越減少而運費則跟着增加。這都是影響物價的。第三是通貨發行額的相當增加。三十年九月十一日大公報的社論這樣說：「抗戰四年來，政府所發行的法幣，已相當的達到了社會的飽和量，內地物價的高漲，主要的固由於物貨的缺乏，交通運輸之困難，但也有一部份由於通貨發行的日增」。這句說法，大體是不錯的。爲了支持這個神聖的抗戰，相當的增發通貨，是無可非議的。但困難的地方乃在於通貨不能回瀉。發出的通貨，絕大部份成爲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發揮其囤積居奇的作用。第四是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囤積居奇。囤積居奇加強了通貨增發的影響，加強了物價上升的趨勢。最顯著的一點就是糧價的暴漲。如果說工業日用品之漲價是由於物貨不足，那末，糧食的漲價是不能以此作爲理由的，因爲大後方這幾年的收成很好。糧食的收成好而價格亦不昂貴，單以運輸來解釋，因爲米運與上面所述的交通情形沒有多大關係。此點，單以通貨因素來解釋不了，因爲物價飛漲中呈現着不平衡的狀態。所以，囤積居奇的作用，在起點是不可忽視的。生產與運輸越困難，則囤積居奇的惡風亦越趨高漲。囤積居奇結果，則又在促進物價之上漲。這個時期物價之暴漲，是綜合這些原因而成的，但最主要的一點，是在於生產不夠物貨不足。個人側目的囤積與通貨等問題，歸根到底，亦是從此派生出去的。

物價暴漲的影響，是伸入社會經濟的每一個方面的。它影響了財政經濟，它亦影響了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因爲物價高漲，政府的開支必然擴大，擴大的結果，就不免影響到通貨的發行。工業方面，成本跟物價之上漲而提高了，資金薄弱的廠家，就要感覺週轉不靈之苦，於是，生產規

便無法擴大了。農村方面，因為人工與肥料的漲價，地租高壓下的佃農與小自耕農，便無力進行生產。商業方面，物價高漲，會刺澀了貿易的活潑，也更進一步的發展，它又否定了這一作用了。這就是戰時景氣的來臨與消逝的契機。

戰時景氣可從二個方面來看。第一、從地域來說，上海也好，重慶也好，都自二十八年起，一致呈現景氣。上海二十八年各業利潤之優厚，竟打破了歷史的紀錄。那些光怪陸離的投機事業，跳舞廳，電影院，旅館，酒樓，賭場等業，然利市百倍，就是生產事業中的紗廠，亦是使人驚訝的。租界中的「新申」，「新裕」等廠二十八年年底盈餘額，從二百萬元到四百萬元不等，職員的分紅，最多的可得到一百多個月，最少的亦有六七十個月。西安大華紗廠二十九年度職員分紅最高達到二百個月。這證明：從孤島到大後方，各地都能罩着戰時景氣了。第二、從業別來說，這二年，賺錢最多的部門，與其說是生產事業，無寧說是銀行與貿易。將國家銀行除外，重慶全市的商業銀行，二十八年所獲純益額在一萬萬元以上；二十九年度亦復如此。銀行業獲利之所以豐，並不由於放款的利息，而是由於經營商業的利潤。經營買賣的利得，至少是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多的竟達百分之二三千。如果單是放款的利息（二三分之譜），那末，這麼龐大的收入，顯然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大家都想摘取景氣的果實，所以這個時候，銀行商之設立，便如雨後春筍了。行莊之外，以企業公司為名的組成，有不少是以貿易為其主要業務的。如「大華公司」、「西寧公司」、「華海企業公司」、「陝西實業公司」、「大中煤氣實業公司」與「民生實業公司」等，對於貿易，省投下不少的資本。這些事實，不但說明了銀行的商業化，而且說明了生產的貿易化，說明了戰時景氣的本質是什麼。

一般說來，在戰爭期間，這種畸形的景氣，是有存在之可能的。因為：在一方面，砲火之摧毀，使生產機關大量破壞；使生產品的供給大大減低；而另一方面，軍事需要，如糧食、服裝、軍火藥品與交通工具等等，比平時更需要得更多。一方面供給得更少；一方面又需要得更多，戰時物價自然會提高起來。戰時利潤亦就有存在之可能了。這二年的景氣，自然以此為它的條件，但問題並不僅僅如此。這就是說，戰爭的消耗固然是促進物價上漲的一個原因，但它並非物價上漲的唯一原因。這方面，我們在剛才已經提及了。綜合上述那些原因，物價便不斷上漲。物價上漲，利潤跟着擴大，於是資金週轉急速了；技術工人失業的數量減退了。於是，大家都說道：「景氣來臨了」。

但是，這種促動景氣來臨的原因，同時亦是催迫景氣消逝的元素。這個矛盾，並不像某些人所說，要等到戰爭結束，「戰場勞動的遺散引起了勞動的過剩，通貨信用的緊縮，引起了物價的下降，物價跌落形成利潤相對減少」的時候，才開展出來的。正相反，戰時景氣的消逝，恰恰是技工仍然缺乏，通貨尚未緊縮，物價繼續上漲的時候來臨的。因為這種景氣是以抬高物價為其主要內容。在初戰時，物價上漲的刺激可使利潤提高，但更進一步的上漲，就降低了一般人民的購買。特別自二十五年入秋之後，各地糧價騰貴，每人每月的伙食費突破一百元的大關。五日之家，沒有五百元是很難維持其生活的。然而一般人的收入，却遠在這個水準之下。物價漲得快，生活費亦就變得利益；生活費過度的上漲，社會購買力便非低落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市場怎樣能不縮小呢？行市怎能不淡落呢？不但如此，物價之急速提高，不但縮小了市場的銷貨量，而且給予生產者以極大的打擊。資金雄厚的廠家，因為有力可以多囤積原料，獲得囤積原料的利潤。

但中小廠家却因原料漲價而感到困難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調度無方，那就非縮小生產規模不可。商店呢？由於物價上漲，門市的開支便不得不逐日擴大。店員的伙食、地租、油火與什項等，是日日升高的。反之，在另一方面，因為社會購買力的降低，收入却跟着物價之上漲而反比例地作相對的下降。這麼一來，一些商店便不得不退縮自緊縮營業範圍了。

二十九年入秋以後，這種炫耀一時的景氣，便開始褪色。重市鍊鐵業每天出產二十噸鐵之找不到出路和一些小機器廠的停業，便是明證。三十年春，商業貿易較上一一年有顯著的跌落，亦是明證。我們並不是說工商各業從此都不賺錢，而是說一般工商業都走上蕭條的道路。縱然大團團們仍在大量囤積國難財，但他們連把商品作為投機的對象的。

在這種時期，除了物價驟漲時景氣的起伏之外，尚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美凍結中日資金的問題。

上海法幣的黑市匯率，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經政府限制供給之後，即步步下跌。但歐洲大戰爆發之後，上海匯市即呈現轉態，不過，從長期趨勢看來，它是逐漸低落的。在這種，政府成立外匯平糶基金委員會，繼續執行維持外匯黑市的政策。維持黑市的效果是維持法幣在被佔領區的權用與外國正常貿易。除此之外，對於我國是極端不利的。而因為敵偽的搗亂與民族敗類的搗亂活動，我國難免費了鉅大的資金，但黑市外匯仍繼續的低落下去。

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美總統羅斯福宣佈凍結日本資金，同時宣稱接受中國政府之請，亦凍結中國在美資金。除以文書維持夏威夷與菲律賓的經常中日貿易外，又專為凍結中國資金而發出兩個照會，內容大意是：美國及中國任何部份的貿易，應先向指定之十四家銀行——大通、花旗

友邦、美國運通、通濟隆（以上美商），匯豐、有利、老沙遜洋行、新沙遜洋行及銀行、麥加利（以上英商）、安達、荷蘭（以上荷商），莫斯科國民銀行（蘇聯）——申請外匯，並經核准供給主方得進行。核准供給之外匯，必須為善意之進出口，其進出口值又必須與其申請額相等。蘇聯兩國亦同樣宣佈凍結中日資金，但條件上比美國嚴厲些。（一）英國對在華資金，不論為華人或外人所有，悉予凍結，美國則僅指定凍結中國的其他被凍結國之存款，英美資產並不在內。（二）英商銀行對於被凍結的中國外匯存戶，不論其為英鎊現金或債券，一概凍結，美商銀行則允許依票面折合，給付法幣，如進口商為訂購美貨之需要，允許付以紐約匯票，但不保證兌現。

依凍結資金的原意解釋，是把資金通用機能加以停滯之謂，如果洋商銀行能實行這種辦法，則保有外匯的人就不能將外匯在市場上出賣，市場上的外匯貿易就無法做成，外匯黑市就開接可與因凍結而消滅。可惜的是外商銀行並不依原則實施凍結。外匯黑市的活動，依然如故。在凍結奉到之最初半週中，保有外匯者恐被凍結而紛紛拋出，所以市價放鬆，但接着，賣空方面的補進與進口商的掛號，市場反而緊縮。八月十七日上海暗市的美匯縮到四元八七五。八月十八日中國平準基金委員會以咨文送達十四家銀行。要點為：（一）即日起，平準基金委員會對美元現貨，將以五元又三十二分之一的匯率，供給合法需要；（二）結購外匯者應向平準基金委員會香港辦事處申請。因為一部份人無法向平準基金委員會獲得外匯，只有在黑市中購進，故黑市外匯的買賣，依然如故。平準基金委員會乃邀集港中外金融界要人，在港舉行談話，決定合作消滅黑市。自九月八日起，上海各外商銀行停止外匯交易，除正當貿易外，一概不供給外匯。但因消

減黑市外匯的條件，並不以此為滿足，故平準基金委員會所執行的政策仍陷在矛盾之中。很明白，倘減黑市還須有貿易限制與匯票供給外匯。但這個時期的上海，我國是沒法統制其貿易的；而同時，以我國的財力又不能無限制供給外匯，所以，消滅外匯黑市的條件，比以前成熟一點。但這個目的仍沒法實現。正當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祇有到了戰火燒斷了敵寇與英美的經濟關係，燒壞了上海對英美南洋的貿易的時候，這一個割不斷根的肉瘤，才一刀的被割去了。

總括起來說，物價與物價的膨脹，是這個時期的經濟問題的重心。景氣的起伏，不過是物價問題的殘廢的另一種表現形態罷了。至於外匯黑市的存廢問題，則為上一二期這個問題的餘波而已。

太平洋戰爭以後，而歐美各國，又更趨於恐慌，而末，斷斷

太平洋戰爭對於中國戰時經濟的影響，極為重大。在這場最嚴重的條件中，是香港的陷落與國際通商線的被切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作為孤島的上海便沉淪了，接着，香港亦陷入敵手。到了三十四年春，敵寇侵入緬甸，仰光失守，滇緬路的運輸亦告中斷。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大後方國際運輸，除西北以外，航運以維持。但航運數量有限，運費昂貴，敵後方物資的供應，仍感不足。現在，我方所應努力的是中印公路的運輸與西北公路的盡量發展。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我國進出口貿易（運輸路包括在內），以美國居首位，日本、香港次之。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進出口貨物來源變動了。門戶

據太平洋戰爭以前，在東方貿易上本不佔重要地位，從三十一年春季起，因該地有法租界的關係，故成爲主要進口的港口；香港次之，佔總進口額百分之一六·三六，仍不失爲重要來源；澳門居第三位，佔百分之二五·六九，因該地爲葡萄牙屬地未受敵寇封鎖之故。三十二年二月敵寇佔據廣州灣，太平洋戰爭發生以來的進口貿易形勢，至是又要起變化了。至後方出口方面，數值遠不若進口之巨；其輸出國別，亦不若進口國別之多，僅有香港、廣州灣、越南、緬甸四地。三十一年的第一季，出口貨物以輸往緬甸最多，貨物幾全爲礦砂，金屬及金屬製品，緬甸戰事發生以後，這個出口又堵住了，但中印貿易又發展起來。

金融方面，最顯著的一件事，是外匯市場的重要性之降低。太平洋戰爭以前，上海的匯市，是極盡其興波作浪的能事的，但敵人之佔領上海租界與攻略香港，使維持法幣外匯黑市的政策，失去其存在因餘地。我方既不維持外匯的黑市，而英美在港滙的銀行又被敵寇擄去，那末，港滙之持有法幣與外匯者，便不能再事投機了。這麼一來，就把三十一年七月間英美凍結中日資金時所遺留的煩惱，以「不了了之」了。其在後方，昆明的金融市場原有緬幣之交易，但爲數甚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爲商民搶購物資的關係，一度頗爲熱鬧，可是敵軍侵入緬甸之後，昆明的緬幣交易，又轉趨沉寂。

因爲外匯市場之「消滅」，敵寇再不能以法幣套取外匯，所以敵我的貨幣戰爭便改變形式了。在敵人方面，這個時候雖不能以其所劫得的法幣在港滙金融市場中套取外匯，但他們仍可把法幣用之以運進淪陷區甚至大後方的物資。以法幣搬運物資，在敵人以前的經濟戰略上，只佔輔助的地位，但此後成爲敵寇對我經濟攻勢的主要策略了。與這種攻勢配合的是走私的加強。這

一、我們將在敵我經濟戰中詳細敘述，此地不再多說。我方的戰略，則是取消法幣流入淪陷區的禁令，獎勵人民幣法幣至淪陷區採購物資。這是針對敵寇的經濟攻勢而來的。以出口結匯政策而言，此時的目的，並不急求外匯頭寸之取得，而特別重視物資之內運。故凡運口結匯出口物品者，祇須運入等值物後方需要物品，即可將其外匯註銷，運往敵區的亦望其換得物品運回。這種辦法是與太平洋戰爭以前迥然不同的。

金融方面，還有一件值得提出的事。這就是英美對我的大宗借款。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英美與我國成為同盟國。三十年底，我國便以同盟國資格向英美兩盟邦商訂大宗借款。三十一年一月底，美國國會批准對華五萬萬美元貸款案，英政府亦於二月二日通知中國，願貸中國以五千萬鎊以內之借款。三月二十一日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與我國代表宋子文氏在華盛頓簽訂借款協定。根據貸款經過及協定內容而言，此次英美貸款與以前歷次所舉外債是不相同的。第一是政治意義與經濟意義並重。因為借款的目的不但在給與我國以經濟援助，而且亦係對我國的英勇抗戰表示感佩，並激勵我國的抗戰精神；第二是借款數額的龐大，打破英美過去對華借款的紀錄。計自二十九年^起，英國對華借款共十起，總數只超過這一次八百五十萬鎊；美國借款一共七次，總數遠比這一次多三萬零二百二十萬美元。第三是條件優厚，不但無利息及担保之規定，即對償還期限亦無規定，惟言俟戰事結束後再議。而那時所議辦法，須顧及中國的財政金融情形。

一、分析了金融情形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後方的物資問題。物資與物價是息息相關的。據厲德實先生的估計，「物價上漲原因之屬於物資缺乏者，在二十七年約佔百分之八，在二十八年約佔百分之五，在二十九年約佔百分之十三，在三十年約佔百分之三十三。」

則由於運輸困難，國外物資之來源極微。後一個因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更加嚴重。因為海運之淪陷，這二個地方對大後方的轉運作用，大大降低了；因為滇緬公路的被切斷，大量物資的存底，雖然不少，但來源顯然是困難了。這就使大後方的物資問題，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更為嚴重，使關心於戰時經濟的人士，以極大的注意力來討論這個問題了。

二、因為物資來源的困難，物價便不斷跟着上漲。但上漲的物價，不僅限於來自國外的西藥，五金、機器及顏料等等，就是一般國內自己能生產的東西，亦跟着飛漲起來。糧食與燃料便是很顯明的例子。據中國農民銀行調查編製之十三重要城市零售物價指數，以二十九年上半年為基期，三十一年三月份物價之最高者為雅安物價達四十倍，重慶達三十四倍，最低如西寧贛州亦達十七倍與十九倍。此後繼續上漲，無有已時。到十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中提出「加強物價管制方案」，獲得全體的擁護。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通電全國，宣佈自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起，全國各地一律以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各地的價格為標準，實行限價。據

總動員委員會負責人的談話，各省實施的範圍並不盡同，有的是全省各縣一律實行限價的；如湖北、江西、陝西、甘肅等省；有的是從重要都市入手逐漸推行的，如四川、湖南、廣東、廣西、貴州等省；以限價的對象而言，各省亦有不同，有的全體限價的，亦有從生活必需品着手的。施行之後，對於游資之囤積居奇，的確給與不少的限制，但因為種種原因之存在，遂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之發生。如「界外貿易」，「改變衡量」，「偷工減料」與黑市橫行等等，都是這個時期

對商市會「別出心裁」的花樣。為了匡救這些缺點，政府便在實施限政之後，又進行了物資登記

重新議價與限量分售等辦法，以輔助限政的推行。

物資問題的嚴重，不但表現在物價的暴漲上，而且深刻地影響到後方的生產事業。這幾年後方的工業生產，是有顯著的進步的。政府發言人蔣延黻於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招待外國記者時，根據經濟部報告，發展工業增產數字，有云：『如以現在生產量來比較戰前的年產量，後方各省生產的情形如下：棉紗四倍，麥粉二倍半，皮革八倍半，肥皂二倍，火柴二倍半，機製紙十七倍，手製紙二倍半，硫酸三十三倍，原動力機九十四倍，工具機七十倍，水泥二倍半，此外，新興工業的年產量，亦頗可觀，電銅千噸，電線四百七十噸，無線電機發音機三千七百架，電話三千架，電燈泡一百萬只，酒精八百五十萬加侖。至於軍需工業的生產量，現尚不便發表。』(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大公報)。這些簡單的數字，說明戰時中國的工業，是有可喜的成績的，但因爲過去基礎的薄弱與主客觀一些未能克服的弱點，後方工業所需的原料，未能做到全部自給。在三十一年初遷川工廠聯合會在重慶舉辦出品展覽會時，觀察對於電器製造業，特別是無線電收發機與發報機時，大家都爲原料問題而擔心。因爲這些原料都是從美國訂購的。就以成績卓著的機攝業而言，我們的企業家雖能製造出戰前不能製造而且其精密程度不亞於德國 Schillingor 氏的標準的萬能磨床，時能製造出原動機，冶煉機械，軋鋼機械，煉油機械和紡織用的鋼絲機等等，但某些原料機件，還沒法自造。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際運輸線被切斷以後，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重慶機械業巨子周茂伯先生於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星五聚餐會上，很沉痛地說：

「我國尚有一部份特殊原料，仍須仰給於國外，而此種物資，後方存儲的數量極少，設主管當局以及在座諸君不能於最短期間，以突擊的方式，或集中工作，或分散研究，共謀此

種特殊原料之自給，則後方各廠停工之日，將屆臨矣」（西南實業週訊第六卷第一期）。

因為物資困難的影響，提高生產的問題，就被人重視了。因為重視這個問題，所以對於工礦事業的發展，就被人拿來作全面研究了。三十一年六月，陝選川工廠聯合會，中國西南實業協會與重慶市國貨廠商聯合會三團體聯合發表：「工業界之困難與期望」。基本上，這一篇文章，曲曲道出了發展實業所必須採取的途徑。關於稅捐方面：他們以為今日稅捐已不能再為收縮通貨之手段，所得稅及過分利得稅應以個人所得及利得而不以產業組織為課征的對象，目下可先改為對分派利潤課征，將來再進一步，對個人之綜合利得課征，至於前方各省重疊的課稅，不如代之以消費稅。關於資金方面：他們主張建立產業證券市場，在證券市場未發達健全之前，須擴大工資，在稅捐改以個人為課征對象之建議未實行之前，對於因增資或合作之必要而重估資產價值所表現之虛盈，應免予課征所得稅及過分利得稅，或將所得稅捐發還，作為補助費；關於原料方面，他們提議建立一地位較高之機關，負統籌後方缺乏的工業原料之責，由國家獎助可能自造的原料之自給，保障運商利益，使其能由淪陷區輸入必需原料；關於運輸方面，他們主張內地關卡，應盡量移設外線，重區之內，不宜設立關卡，強加支割。政府應嚴禁任意扣留商貨，甚至擅作充公罰款之處分，關卡扣留商貨，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將案移送法院辦理，以期人權物權之獲得法有之保障，軍事機關及地方政府所設檢查機關，須明定其查緝之標的，絕對不許干涉合法貨運。關於督制方面：他們主張機構須求一元化，工作盡量業務化。到了是年十月間，這三個團體和中國戰時生產促進會，又發表：「關於協助政府安定物價之共同意見」，更明瞭地提出：「對於我國之生產及公用事業，應有整個計劃，官辦民營，明白規定。其應歸民營者，應由政府指定事業

範圍，儘量獎助人民經營，以期奠定生產之永遠基礎；「對於必需之物資，除應獎助生產外，尤應多方獎勵購運，其統制檢查及稅收制度中，有足妨礙生產，阻滯運輸，甚至未免發生妨長國積之反作用者，應予修改或廢除之，以期增加物力」。工業界人士之這些主張，都是針對當前的情況而發的。欲謀物資之增加，欲謀物價之穩定，這些困難是必須克服的；這些建議是必須放在考慮與採納之內的。

物價問題之嚴重，除了物資缺乏，生產不足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通貨膨脹，這個因素，我們在上時期，雖已指出，但在這個時期，是有其新的意義與作用的。據威德寅先生的分析，三十年底時物價高漲因素之屬於物資方面者，約佔三分；屬於通貨方面的約佔七分（見三十一年五月七日大公報），西南聯大伍啓元教授等，以為影響物價的主要原因有三：即通貨膨脹，物資缺乏與投機活動，而這三因素中，通貨膨脹是最根本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通貨膨脹包括法幣膨脹，信用膨脹，通貨流通速率增加三項，這三項中又以法幣膨脹為主要」。物價與法幣數量是互為因果的。最初是財政虧缺，使法幣發行額增加，法幣數量增加使物價上漲；後來是物價上漲，使財政支出增加。財政虧缺加大，因而進一步使法幣發行額加大」（見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大公報上「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太平洋戰爭的影響，物資的缺乏，使物價更加上漲，而物價更上漲的結果，又促進通貨的增發，這樣循環增進，問題就越加嚴重了。

針對着這一形勢，大家便在提高生產之外，致力於研究如何減少法幣發行額的問題。實業界中，有人主張利用英美借款在後方發行美金庫券以吸收法幣者。政府亦做了以美匯期票吸收法幣的工作，成績雖不錯，但影響還未顯著，這是數量尚未大增之故。較為根本的辦法，是裁併沈沈

減少開支，是執行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的原則，實行那種不妨害產業組織而以個人財產及所得爲課證對象的重點主義。這正是舉國上下致力研究力求實現的工作。

④ 抗戰已經六週年，勝利已經在望。但是，黎明前的那時間，是最黑暗最冰冷的時間。我們看清了勝利之來臨，但必須認清困難之情況。只有認清困難，克服困難，勝利的曙光，才會射照我們，迎接我們！

第三章 戰時中國經濟的鳥瞰

一 烽火下的錦繡河山

研究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可以從時間的發展上去着眼，亦可從地區不平衡狀況去着眼。前者一個方法，可以把一七七〇以後的日子，劃成幾個時期，這是我們在前一章所敘述的。這一種從過程從運動從發展的研究法，可以使人對於幾年來戰時經濟動態，有一個概括的史的觀念。但，注重在過程的發展的研究法，只能使人得到一個走馬燈式的敘述，只能使人知道某一時期的經濟現象如何，某一時期的經濟問題是以什麼佔重要，至於全國各地呈現什麼狀態，中國的錦繡河山，在日寇鐵騎的蹂躪之下，變成了什麼樣子，那就非前章那種研究法所能回答的了。縱然在敘述的時候，對於某些問題亦嘗略提到一點，但，這分明是不够的。因此，在從過程的研究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戰時中國經濟，在地區上，是什麼一個姿態。

● 如果回溯到一九一八一瀋陽北大營的砲火，那麼，中國的領土，暫時可以分成二個區域。在一方面，是敵寇鐵蹄下的淪陷區的殖民地經濟；另一方面，是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自由的中國的國民經濟。前一個範疇，包括了東北四省、和中國北部、中部、南部各淪陷區和陸沉了的孤島；後一個範疇，則包含了西南西北大後方與敵後抗戰的地區。這二個地區是對立的，是截然不同的。前一個區域，從戰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境况，暫時淪入完全殖民地化的火坑



之中，後一個區域，雖仍保留戰前那種社會性質，但，脫去那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桎梏，力量正在開展着。這二個地區的對立，代表了黑暗與光明的鬥爭。要把戰時中國經濟作一個鳥瞰，從這二個地域的對照上去着眼，是必要的。

從這二個地區的對照着眼，不但可以使我們更明晰地了解中國與日寇間的民族矛盾，不但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侵略的日本強盜是獨立自由的中國的死對頭；而且可以使我们更明白地，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可以知道那些抹殺各地經濟特性的人，是瞎子摸魚了。

二 鐵蹄下的殖民地經濟

淪陷區的經濟，當然與自由中國的經濟有別，但，淪陷區的本身，亦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如東北四省，其殖民地化的程度就深一點；有的地方，如中國中部和南部，其殖民地化的程度，就沒有東北那末利害。其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有二：

第一是歷史條件。在戰前日資越有勢力，和日寇侵入較早的地方，殖民地化的程度當然深一點。東北四省在「一九一八」以前，「滿鐵」在實際上已經成爲掌握黑水白山的經濟命脈的主宰了；日票已經成爲東北四省最有力的通貨了。再加以十一年的搜刮剝削，東北的人民自然過着更慘痛的奴隸生活。反之戰前日寇在中國中部和南部的經濟力量，遠不如英美，淪陷的時間又比較晚些，所以殖民地化的程度自然會差一點了。

第二是地理的條件。這個條件是不能與前一個條件分開的。敵寇在東北的勢力之所以雄厚，其原因之一，是東北與朝鮮毗連。所以，日寇老早就把它作爲基石肉，作爲自己的勢力範圍了。

一部近百年史，不是清國把這地佔了嗎？因為地理上接近了，所以它的勢力就更易侵入些。反之中國南部是接近香港的，戰前外資的力量，在這兒佔優勢的不是日本而是英國，所以，輸入雖然佔了香港，而廣東的著名區的殖民地化的程度仍沒有東北與中國北部那末深。

因為淪陷區殖民地化的程度不同，所以，我們必須把東北、中國北部、中國中部和中國南部及孤島分開來研究。

東北、中國北部和東南的華北、河山之淪陷，是暫時的。殖民地化程度越深的地方，那兒的同胞，就要遭受着更痛苦的生活，中國的產業與農村，就會遭受着更深刻的破壞，但是這種痛苦並不是永久的，一樹倒猴歡一，到了我們把敵人逐出國土以後，從鴨綠江邊到長白山頭，從黃浦江畔到屹立海外的五指山，就會飄揚着中國的國旗，這些地方的經濟據點，就會重歸故主，就會在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的血汗的壟殖之下，開出美麗的花來！

好，讓我們打開眼睛，看看這個破碎的河山，看看敵寇是怎樣在各地搜刮，看看淪陷區各地的同胞是過着怎樣一種生活吧！

現實——淪陷區的現實，是醜陋的，辛酸的，可是，為了真理，為了更加堅強抗戰的決心，我們是不得不忍住眼淚，來看看這一個醜陋的辛酸的人間地獄吧！

滿洲國

東北淪陷已經是十二年丁。十二年來，敵寇在這塊土地上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掠奪。雄壯的龍水白山，竟成為淪陷區中殖民地化最深的地方！

水在農村裡，有幾種發生事實上已成為封建領主。極大部份的土地，都已直接握在日寇手中。直接掌握東北四省的土地的是「滿洲拓殖會社」。該會社是由「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改組而成的。○三井、三菱與住友等財閥，皆是它的主要股東。該社計劃自一九三七年起分四期向東北移民一百萬人，五百萬畝。每期五萬戶，第一期十萬戶；第二期二十萬戶；第三期三十萬戶，第四期四十萬戶。移民的對象為「三江省」地帶，小興安嶺兩麓、齊齊哈爾北部的松花江上流、黑河環環、濱綏綏、（京圖綏）及拉濱綏、大鄭綏、洮索綏及通河一帶，訂一千萬町（合一千六百萬畝或一萬六千萬畝）。這個面積佔東北可耕地面積三分之一以上。從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敵曾進行過兩次移民，差不多強佔民田十八萬畝。「滿拓」成立之後，就有了那個二十年計劃。這個計劃雖未完全成，但它對於東北農村的打擊仍是很大的。移民的份子多是退伍軍人，他們是長於殺掠的。他們到了一目的地之後，便武力的強佔農民的房屋與土地。除了移民之外，敵寇還用「法律上」的強佔，浪人小節節和熊谷實所組織的「昭和農業會社」就是例證。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的農民武裝起來反抗；有的則含着眼淚離開了他們親愛的土地。

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除了參加義勇軍之外，有些只好寄居在「拓殖會社」做傭工，或者到城市去賣勞動力。那些尚未離開土地的，則在捐稅高利貸和地產統制之下，流出他們的稀薄的血液。別的捐稅如「地稅」，就是敵人移民的經費亦是由爲滿「支出」的。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的「開拓」經費三千五百七十餘萬元，那不是從東北同胞的身上榨下來的嗎？吮吸農民的血液以滋養其從農民搶奪得來的土地，這是在再毒辣亦沒有的了。高利貸方面，敵人組織了金融合作社。這種組織是遍於各縣的。這種貸款的利率，實際至少高達二三十分。因爲它是以其押「地照

「賤買青苗和地主富農的轉借爲內容的。糧食管制方面，其辦法是「限令私人登記存米，與發給生活必需之食糧外，其餘概以官價收買」。『官價收買』乃是公開掠取的別名，而「生活必需」之限定，亦是由敵寇喜捨的。故所謂「糧食管制」，不外是「合法」劫取農民勞動的果實吧了。除此之外，東北的農民經常在相寇徵發之下，無或間提供勞動力。實質上，這就是徭役。現在東北六萬多公里的公路，完全是東北農民的血肉所築成的。日本強盜之使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其殘酷的程度，是無以復加了。

這一切，不是證明日本強盜事實上已成爲東北的封建領主麼？不是證明東北的農民已經淪爲他的農奴麼？

工礦方面，敵佔滿洲以來，境內已設多數股份公司，掠奪民營各種經濟事業。此等公司的最後股本，是來自偽滿政府（實即關東軍司令部），南滿鐵路（敵寇的半官事業）與日本政府，尙有部份股本是來自歐國各財團。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未引起關東軍軍閥之嚴格軍事統制的限度內，對「滿」投資的增加，極爲顯著。就是「七七」事變之後半年，關東軍進行嚴格的軍事統制以後，這種趨勢並未有所削弱，不過，重心從「滿鐵」移轉給「滿洲重工業會社」吧了。

「滿洲重工業會社」成立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這個會社是暴發戶鮎川義介的機關。鮎川是與關東軍接近的。滿鐵與關東軍激烈沖突的結果，關東軍便以全力支持鮎川。附屬於「滿鐵」的工廠，都轉移給這個會社了。就是「滿鐵」以外的重大產業，以及各主要煤礦（撫順除外）等，和一些新創辦的事業，如飛機汽車之製造廠等，亦交鮎川經營。計該會社所經營的

部門有鋼鐵、輕金屬、煤礦及飛機汽車的製造，昭和十三年分設滿洲礦山，滿洲飛機製造及東邊道開發會社等子會社，到昭和十五年，實收資本共達七萬萬餘日圓，子公司達十個，對於其他會社的投資亦屬不少，如本溪湖之煤鐵公司就是一例。事實上，鮎川的「滿洲重工業會社」已成為統治東北的主要力量了。

除了鮎川義介之外，日本國內的財閥自「七七」事變後在東北的投資亦很積極。太倉財閥擴大「本溪湖煤鐵公司」、「日清製油廠」、「鴨綠江製紙廠」、「共榮麵業公司」的資本，增設「本溪湖特種鋼公司」、「本溪湖洋灰廠」，並投資於「滿洲林業公司」與「奉天兵工廠」。三井財閥則擴大「三委油房」、「滿日亞麻紡織廠」、「東洋棉花公司」與「王子製紙廠」的資本，組織「滿洲煙草公司」、「滿洲小野田洋灰廠」、「日滿製粉廠」、「日滿木漿公司」、「滿洲豚毛工業公司」與「熱河礦山公司」等。至於直接間接的投資則有「日滿鋼材工業公司」、「奉天製作所」、「滿洲合成燃料公司」、「滿洲汽車公司」、「滿洲拓殖公司」、「鮮滿拓殖公司」及「奉天兵工廠」等。三菱財閥則擴大昌光玻璃廠的規模並創設「滿洲機器會社」、「滿洲光學工業會社」、「滿洲電工工業會社」及「康德吉租會社」，直接間接的投資，則有「滿洲鹽業公司」、「國產橡皮工業廠」、「滿洲拓殖公司」、「滿洲汽船公司」及「滿洲火災海上保險公司」等。住友財閥則創立「滿洲住友金屬工業所」、「滿洲通稱機公司」，投資方面主要有「滿洲航空公司」與「滿洲拓殖公司」。淺野財閥則創立「大同洋灰廠」、「滿洲淺野石板公司」、「滿洲石棉公司」、「瑛春砂金公司」等。安田財閥則設立「滿洲興業公司」、「滿洲製麻公司」及「康德不動產公司」。盡管關東軍與財閥之間，有一點不協調，但軍閥畢竟是笨蛋才具

的利益。○十一年來敵寇開是步步加緊侵入東北啊！

敵寇對開這種星羅棋佈經濟據點，已遍滿於東北四省了。過去華人經營的鐵礦，是完全被敵人擄去的。以煤礦爲例，北鞍有幣幣的約有九個，即「海關」、「本溪湖」、「奶子山」、「裕東」、「八道溝」、「安山」、「空溝」、「北票」及「瘦州灣」諸礦。這九礦的資本，不

是商股，便是省資。○一九三一年以後，完全歸敵人所有了。這些事實，說明敵寇殖民地化中國的政策，是不許中國的民族資本生存的。

日本強盜的政策，不但把東北變成一個兵馬營，而且把東北的資源，悉數供給他的軍事上的需要。因此，拚命在擴充開採，拚命在改造舊廠創設新廠，例如鞍山製鐵廠全部改造之後，已

僅次於八幡產鐵廠，佔日本全國的第二位；大連的硝酸廠，其製造能力，僅次於朝鮮的硝酸廠，

亦佔全國全國第二位；奉天兵工廠的製造能力，並不次於敵國國內的四大兵工廠（即「倉、大阪、名古屋與東京」）。此外，在撫順建立製鋸廠，在營口設立製鑄廠，在開山屯、海林、敦化、規鞍

山分設造紙木漿廠四所，供給製造軍需的原料。東北現在這些軍事工業固然不能大量供給日軍的

侵略需要，斷定在實施其所謂「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中固然遇到許多困難，但從其殖民地化東北

這一點說來，是未可忽視的。從重工業到輕工業，從軍火到紡織，無一業不是握在敵寇自己的手

裡。在關內的淪陷區，敵寇尚用一些花樣來欺騙，尚用什麼日本出資百分之五十五，中國出資百

分之四十五，或日本出資百分之四十九，中國出資百分之五十一的糖衣來引誘，然而在東北，敵

寇是不用這些假騙或引誘的。它們直接了當的幹瘦瘦了。

在金融上，亦完全是配合這一政策的。爲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幣，是不斷地在膨脹。這種通貨

膨脹，亦完全是配合這一政策的。爲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幣，是不斷地在膨脹。這種通貨

膨脹，亦完全是配合這一政策的。爲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幣，是不斷地在膨脹。這種通貨

膨脹，亦完全是配合這一政策的。爲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幣，是不斷地在膨脹。這種通貨

膨脹，亦完全是配合這一政策的。爲滿洲中央銀行的紙幣，是不斷地在膨脹。這種通貨

膨脹政策，是掠取人民財富最毒辣的手段。密佈在每一縣份的金融合作社，則是它的觸角。經過這些合作社，敵寇便把它所膨脹的紙幣，送入農村，加強高利貸商業資本對於東北農村的支配力。○截至一九四〇年這些合作社的貸款就達到一萬萬數千萬元，這一筆放款應該獲得多少利息？在龐大的數字之下，不知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不知隱藏了多少妻離子散失去田地的事實！

○偽滿的財政，完全依據敵寇的需要。所謂預算，完全由敵寇所派的總務廳主計處主任一手包辦。預算的性質，是可想而知的。一九四一年的預算，據東京朝日新聞所載，係依照所謂「最高重點主義」與「節用主義」二標準編成。其目的是：（一）「充實日「滿」共同防衛上之緊要設施，如軍備，士兵教育，軍人生活之扶助與救濟」；（二）「擴充生產力，如石炭石油之開發與糧食之增產等」；（三）「國民經濟統制之確立與強化」；（四）「增加地方行政效率」；（五）「物資及勞力統制之強化」等等。戳穿來說，滿清財政支出的目的，是在加強敵寇在東北的統治與剝削而已。

這就是十二年來東北殖民地化的一個素描。在敵寇漢奸的剝削之下，東北農村的生產不斷地在減退着；城市的工廠，雖在什麼「開發計劃」之下，從事擴張，但實際是不能照計劃進行生產的。因為牠們的這種開發，只是在咀吸東北人民的血肉而已。像這樣，東北四千萬同胞的憤恨與敵愾，是比例着生活之痛苦而加強的，這一事實否定了敵寇漢奸的一切經營。十二年來，血和淚的交流，證明了這一點。十二年了，四千萬受苦受難的同胞，時時刻刻在希望國軍之直抵白山黑水！這一幅淒厲悲壯的畫面，擺在我們面前，喚我們，督促我們打到鴨綠江邊去呀！

(二) 關內淪陷區

關內淪陷區是指「中國北部」中部與南部那些在敵人鐵蹄下的地區而言。由於歷史條件與地理環境之不同，這些地區的狀況亦是不一致的。例如中國北部淪陷區中敵寇的經濟勢力，比較其在中部南部者為強。因為抗戰以前，敵人侵略華北的經濟據點，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了；而在地理上，這塊地方又是與東北和朝鮮相近的。這些條件，便利於敵寇在「七七」侵華以後的掠奪，但，這絕不能說，中國北部，中部以至南部各淪陷區的經濟性質有什麼基本上的差異。在本質上，牠們是一樣的；牠們同樣從半殖民地淪為日本強盜的殖民地。

關內淪陷區殖民地化最主要的一點，是日本強盜在經濟上佔着絕對優勢。這種優勢表現在：(一) 敵寇以掠奪的方式，迅速使土地集中在它的手裡。敵寇所到之處，不論在中國北部也好，中部，南部也好，農民的土地多被竊佔。兵營，食房，碉堡，飛機場，封鎖線以及新建築的鐵路和公路，都是從民間奪取地基的。而為了加強淪陷區的統治和減輕國內及朝鮮等地的糧食等等，敵人便積極實行移民。於七七事變前，在華敵僑人數，只有八萬六千餘人，七七事變後，便大事增加，截至一九四一年秋，就增加到六十七萬餘人。其中以中國北部為最多，中部次之，南部又次之。這些移民所耕種的田園，所居住的房屋，都是從農民手裡奪去的。這種現象，在山東一省，來得最利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台灣與朝鮮的移民，移入山東的已達十五萬。同時，日寇又計劃把偽滿全部敵僑移往中國北部而把朝鮮敵僑移往偽滿，且已有大批敵僑進關了。其在中國中部淪陷區移民的悲劇亦不斷在上演。江南淪陷之後，敵人便在真茹、大儀、吳縣、崑山、

隨行與諸華等處，武弁盤佔民田，分給給日僱移民。除了移民之外，敵寇又以暴力幫助財團在淪陷區的會社，進行土地的掠取。例如「中日實業公司」經過偽政權之手，沒收了過去由段琪瑞等出資經營的軍精茶堤兩個大農場（共五萬六千萬畝），並計劃佔領冀東，津浦路沿線滄州一帶，山東黃河下游一帶及山西河南等處民田，合計二百萬餘畝，即三千四百餘萬華畝。北平的偽中央農事試驗場，曾在德縣與唐山強佔了不少民田；「錦滬紡織株式會社」以六百萬元的資金，利用永定河的水漲，強佔青苑一帶民田，開闢一個大規模的農場；「冀東殖殖公司」所組織的「東洋民生農場」，其所霸佔的民田亦達幾萬畝。一九四〇年日偽合辦的墾殖公司成立後，又圍定冀省沿海新田一萬頃，冀東沿海地區皆萬頃。在這些被強佔的地區上，農民與地主是兩被驅逐的，敵人所執行的是一近代的殖民地的開發方法。能够留在這些土地上面耕作的農民，實質上亦是敵寇的墾殖會社的農奴而已。在有些地方，敵人為保護一部分地主充當糧食工具起見，開辦一些空頭支票。例如在晉西淪陷區敵人規定：「地主與佃戶每年租票仍照二十五年以前辦法清理，不得藉端減少或扣除，或遷地不耕等語。」晉西農民佔領地亦維持舊的主佃關係，租銀對半分，四六分，和三條腿（佃戶得三分之一地，地主得三分之二）等。在其他一些淪陷區，敵人亦常採用這種辦法。總而言之，敵人在淪陷區中所造成的土地關係是以土地集中在它的手裏為內容的，它的經濟方法是「前資本主義的開發方法」與「近代的殖民地開發方法」兼施並用的，它的根本目的在於使淪陷區成為牠的附庸，不但供給它以糧食，羊毛和棉花，而且供給它以巨量的勞動力。在這種情形之下，淪陷區的農村是急速地向着殖民地的方向發展了。

(二) 敵寇對於淪陷區的民族工業，劫掠不遺餘力，它的一個獨占的「國策會社」，完全是

以劫掠為前提的。在這裡，我們無妨給它算一筆賬——「上海」「日華」「東洋」「和豐」與「鐘淵」幾個紡紗株式會社，瓜分了淪陷區中六十多個舊紡績廠；「日清」「日本」「日東」等九個製粉會社，已瓜分了淪陷區中五十多家華商麵粉廠；「三井」與「盤城」「小野田」「淺野」幾個水泥會社，已瓜分了淪陷區中的華商水泥廠；「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已瓜分了淪陷區中的鐵道建築工程，吞下了一鴻昌，「合興」「老公茂」與「大中華」四個造船廠，「日清」「三井」則搶奪了招商局大半的船隻。這真是漢倭團圓的例子而已。

在搶劫與摧殘的情況下，敵寇便建立起在淪陷區中壟斷獨占的局面來。

敵寇在淪陷區中的經濟壟斷，是以「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為主體。「華北開發會社」成立於一九三八年十月，最初，僅有附屬公司五個單位，嗣又增設「龍城鐵礦」「華北鹽業」「華北藥土礦業」等公司。一九三九年又合併興中公司及其附屬會社，規模愈大。該公司資本五萬萬四千九百萬元，實收資本一萬萬五千六百四十七萬五千元。該公司的附屬公司共十七單位，涉及鐵、煤、鹽、棉、電力與交通各方面。這就是說，華北的煤、鐵、鹽、電力與交通是毫無不在敵人手裡的。其在中國中部，敵寇以「華中振興公司」為總樞，這些地區一切經濟事業的大本營。一九三八年仍為整頓時期，一九三九年便開始正式活動了。實收資本，則三十年達一萬萬五千餘萬元，其附屬的公司共廿三個單位，伸入到煤、鐵、鹽、蠶絲、水產、水電、煤氣與交通各方面。在中國中部，敵寇因器材與資金的关系，沒法像在中國北部一般，進行「普通開發」，而不得不進一步採用「重組開發」的計劃，但實際上，長江流域淪陷區的經濟命脈，是完全執在敵人手裡的。就是那些規模較小未被敵人奪去的工廠，在敵偽的統制政策之下，原料與市場皆大

受限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他們向海外添購機器購買原料，也不能如願以償，日本對於內地原料，沒有一樣不實行分配制度的。分配的比率不是大量輸日，就是供給在華日廠，他們所能分配得到的只是殘餘而已」（中國工業第七期）。

不管敵寇營業的情形如何，不管敵寇咀吸物資的「成就」之好壞，淪陷區工礦業的命脈之握在它的手裡，是一件明顯的事情。敵寇在淪陷區工礦業所佔的絕對優勢，不是這些地區殖民地化的另一證明麼？

（三）貿易方面，敵寇成立「組合」，利用此項組合以統制物資，並規定糖類、皮毛、人造絲織品、紙張、肥料、染料等八部門，須以軍用票購買。他各設立「華中火柴販賣協會」，以統制「華中」火柴之產銷；組織「華中物資販賣委員會」，以統制出入口貿易；指定三井、岩井、大倉統制中國中部的豬鬃，三井與三菱壟斷這些地區的煤油貿易。其在冀南，一切工商業須加入敵寇所組織的各種組合，始許其繼續經營。截至三十年止，敵寇在中國北部的所謂輸入配給組合，可以查得出來的已達五十五個單位，其所管轄的組合家數五十二個單位，就包括了二千二百六十五家（有三個單位的組合員數不明）。它們分佈在河北山東各地，而以天津青島為中心。它們所統制的物品從鋼板、機械、農具、肥料、水泥、布疋以至食品，應有盡有的包括在內。這樣，敵寇的商品，敵寇的商店，便隨着敵國的太陽旗，不斷地侵入淪陷區的每一個小城市和小市鎮了。徐盈先生在他的一篇小說裡，很逼真的描寫淪陷區小城市的景色。

「幾年來，這條大街上充分受了日本化的洗禮。只要是比較整齊一點的房門外，都有一「料理」的幌子，有一家更在那塊奇特東洋風的招牌下面寫着「京津風味」的小注，顯然是

爲得做中國人的買賣。這以外，便是大大小小的洋行，從大街一直蔓延到僻街上，不論門面，只用一塊沒有油漆的木牌釘在門口，便算是一家特別的洋行，純粹中國人經營的店舖極多，少也黏染上些東洋藝術，有格子的古式窗戶台上，大張着「老篤眼藥」的招貼，那畫上是一位綺麗的女郎流着眼淚，旁邊畫着一大瓶眼藥水。還有那一羣胖娃娃的福助牌膠鞋的宣傳畫，被代替了台布，罩滿了攤子。這些輕快的畫面配合着中國的凝重，有種沉默的空氣在飄蕩，使人的呼吸中透露出一種被征服的窒息。

這是一幅什麼圖畫呀！敵國的浪人和市儈，在獸軍的指揮刀保護之下，周周密密地在淪陷區的每一個市鎮開起洋行來了。連「純粹中國人經營的店舖」亦染上了些東洋藝術。這是一個什麼景況，讀者們，試想想吧！

(四) 金融方面，敵寇在淪陷區裡，大大小小，已設立了二十幾家銀行。比較重要的有四家。這便是偽蒙疆銀行（二十六年成立），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廿七年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廿八年成立），和偽中央儲備銀行（三十年成立）。這四家都是享有發行權的，不過偽華興銀行自行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之後，便放棄此權。此外，在張家口除偽蒙疆銀行之外，尚有偽察南實業銀行；在歸綏設有偽蒙古聯盟實業銀行；在大同設有偽晉北實業銀行；在天津，敵人將舊時河北省銀行改爲偽河北省農民銀行，在通州有偽冀東銀行；在蘇州有偽江蘇地方銀行，偽蘇民銀行與偽江南產業銀行；在蚌埠設有偽商業銀行與偽「友民」銀行；在開封有偽河南實業銀行，在濟南有偽蘇興銀行；在廈門有偽勸業銀行及華南信託公司；在漢口設有偽中江銀行等。這二十餘家銀行就是敵寇的二十餘架咀嚼淪陷區同胞的血液的機器；這些機器是與敵寇二個什麼國策公司轄

印的二十餘億半全副配合的。那幾個能發偽鈔的就以紙幣騙取同胞們的財物人力；那些沒有發行權的別盡了為敵寇作會計的作用，把注敵寇工商機關的金融。

敵寇這畢竟是把淪陷區當作獨佔物的，因此，林立的金融機關仍不是它的嫡子，它的主要的「流通工具」乃是軍票與軍用票，特別是中與南部與中國北部軍用票的力量大。它們是壓倒漢奸的偽鈔的。這些軍票與軍用票，完全是沒有準備的廢紙。用廢紙來剝削中國人民的血汗財物，是敵寇所以國產機關籌款之一着，同時又是敵寇殖民化淪陷區的一個重要內容。因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之之謂的貿易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投資，才可能圓滿附發。日本強盜現在在淪陷區中所幹的勾當，是談不到什麼「文明經商」的，它所幹的，且是公開的掠奪，公開的搶劫，公開的用廢紙來騙取財物。所謂把淪陷區的貨幣成為它的附庸，只是一種點綴而已。數百年前，美洲與非洲的礦物的剝削時再度在神州「上演」了。

這就是中國北部、中部與南部各淪陷區的經濟特點。在這兒，過去年殖民地的色彩完全消褪了。在過去，列強在華的投資雖有噴噴地主之勢，但中國民族產業仍可在某種限度之內苟延殘喘；農村經濟雖然已破產廣大的農民雖日益窮困，但土地仍是屬於中國的，農產經營的方向，主要仍為本國的需要為前提；貨幣金融方面雖然在實質上受到列強的宰制與支配，但在某種限度之內東亞各省的幣制仍是以中國為「本位」的；在產業金融各方面，中國的民族資本雖然未能坐上主人的那把交椅，但列強無論那一國還未能佔着絕對優勢。可是，這種情況完全變了。在敵寇鐵蹄下的淪陷區中，敵寇已成為農村中的大領主，已成為產業的獨占者，已成為金融貨幣方面的

唯一老板了。不但中國淪陷中的民族資本沒法生存，就是英美列強，亦在敵寇的槍彈驅逐之下，失掉了一切權益了。漢奸汪精衛獨霸南京政府的什麼「收回法權」，「對美宣戰」，完全是敵寇所導演的傀儡戲。

現在敵寇未退出中國以前，淪陷區的經濟是完全殖民地化的了，它是日本強盜的獨占物。然而這種獨占，畢竟是建築在淪陷區的房基上，它的基礎是不穩固的。因為它以吞食中國人的財產為前提，所以深深地孕育了中日民族間的新矛盾。這個矛盾乃是二戰火山。敵寇越好就是在火山口跳舞。愛國志士的活動，聯繫隊伍的發展，處處給與敵寇好以致淪陷區只要國軍進行反攻，則淪陷區的敵偽的經濟機構，便會像被以陽斯照到的冰山，歸於溶化。至於敵偽之排弄英美，只在加增其國際上之孤立，促進我方的國際多助。這一切，決不是在否定當前地利的什麼計劃裏。這不是證明我們的反攻有着堅實有利的客觀條件麼？這不是證明在我方打擊之下敵寇將必歸於失敗麼？

（三）沉淪了的孤島

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屹立着黃浦江頭的孤島，亦曾一度沉淪了。這是在淪陷中國中部淪陷區時，本來可以把它上海包圍在內。現在所以把它單獨提出來，是這裏原因有什麼呢？

首先，在戰前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無論在金融上，在產業上，在貿易上，都是執着一牛耳的。以金融來說，一計上海一市之銀行總行達六十家，佔全國銀行總數百分之三十八；分支

行達一百三十八處，佔全國分支行總數百分之十一」（見廿四年度「全國銀行年鑑」）。這兒所彙集的資金，差不多佔全國一半以上。以工廠來說，合於工廠法的工廠（外商工廠並不在內）在民國二十三年滬市就有九百六十餘家，幾佔全國廠數百分之六十八；各廠實繳資本，達一萬萬零五百餘萬元，亦佔全國合於工廠法各廠實繳資本總數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以貿易來說，從上海運出的出口貨就佔全國輸出品的一半數。這樣一個經濟中心，在它成爲孤島而與後方隔離的時候，當然會給與整個戰時經濟以極大的影響。

第二、上海不僅是中國經濟的中心，而且是列強投資的焦點，是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典型。在租界之內，中國的主權是不存在的。中國人民在租界內，如安南台灣的人民一樣，是受着異族統治的。巡捕房統馭了一切。在這兒，中國的民族資本，雖然有一點根基，但仍是佔着下風的。以中外在滬的工業投資爲例，外資所佔成分，較華資約大出一倍。民國十七年上海工業投資總額爲一九三·六兆元，其中，外資達一九〇兆元，佔總額百分之六五，華資一〇三·六兆元，僅佔百分之三五（見「上海之工業」一書）。這個數字雖嫌稍舊，中國民族資本後來雖有增加，但大體上，形勢仍是差不多。這種喧賓奪主的形勢，在日寇侵入全市沉淪之後，又有新的變化了。

第三、因爲上海是一個列強投資的焦點，所以，它亦是列強矛盾的焦點。在這里，英國與日本冠是比肩地在競爭着。以外人在滬總投資而論，英國的資本，大約佔了三分之二，公共租界就是英資的大本營。在中國全國佔發電容量及發電度數第一位、資本達一百一十三兆元的上海電力公司，就是英國的資本；其他，如紡織、運輸與化學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力量。日本強盜在滬的資本，則偏重在紡織，商業與航運各部門。以紡織來說，日寇在滬的廠數是壓倒英國的，紡織數與

織布機並且凌辱了英資和華資。虹口這個區域，就是日寇滅垢納污的所在。自上海成爲孤島之後，日寇在公共租界的權力雖然日益擴大，但英國在滬的基礎，仍未動搖，它仍握有決定意義的力量。在這兒，英日在滬的鬥爭是一天比一天劇烈的。在中國其他各地（淪陷區），如天津、漢口、唐山等處，雖然亦在演着這種對抗，但總未及上海的明顯。

第四、從國軍西撤，至太平洋大戰爆發日寇佔領租界的四年間，上海雖然成爲孤島，但它畢竟與天津、廣州、漢口、青島各地不同。中國人民仍可在孤島上喘息；中國的國家銀行仍在孤島上進行其業務，中國的法幣仍可在孤島上通行無阻。在這個時期中，上海畢竟是與其他淪陷的城市不同的。因此，爲了顯示它的特點，我們必須把它單獨提出來。

因爲這四個原因，所以我們特開專章來看看這個墜沉了的孤島。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重心，是中國產業工人的集中點，同時亦是一個罪惡的、黑暗的都市。在淪陷、投機、搶救、毒品、綁票等繼續不絕地在叢生着。在這兒，光明與黑暗在決鬥着。在它淪爲孤島的期間，投機的熱狂，更在發展了。這種投機熱潮，是集中在上海的游資活動的結果。二十六年度上海各銀行存款共約十六萬五千元；二十九年底便達二十九萬萬元；到三十年度，上海的游資據說有五六十萬萬元，只其銀行一家，存款便在二萬萬元以上。資金的組成亦已變質。以前是定期存款佔六成，活期存款佔四成。現在活存佔八成以上，定存只佔二成尚不足一（三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本公報）。資本患着充血症，於是，上海便在投機的濃霧中跳舞了。除了原有的外匯、怡和、本地外股、美國股票、棉紗和公債的投機之外，二十九年底更增加了美金票、紙金（短期貨幣亦所以極豐美種掛牌行市爲結價），草股和新棉紗四個投機市場。國貨方面，織

麵粉起時，對象還是顏料、縫針與西藥而已。自從三十年二三月後，就無貨不囤了。五金、汽油、米糧、麵粉、煤炭、紙張、紗布、肥皂與火柴，那賊了搜羅的對象。據三十年七月的統計，各堆棧的囤貨計：麵粉三十二萬包（每包二十四斤重），米十八萬噸（每噸二千五百元），煤四十萬噸（每噸四百元），單單這三種貨物就囤積了十萬萬元以上。如這私人囤積（不在雜棧以內）的物商品估計在一起，真不虛言了。上海真是一個大賭場，那些銀行、錢莊、洋行和公司都去設賭抽頭的對象。加那斯的大賭場，大家都在發瘋，都在賭場中狂歡。可憐的二十九年的美國股市的風波，也有一部分投到這家賭財源，而且這的進租界又給與

憑着羅障的上海以打擊。上海的股票熱潮，對整個戰時經濟的影響是極大的。提提了物價，隱蔽物資的內運，搜機吸住了資金，阻止資金的內流（當然不是單指貨幣而言），而外國技機則捲去了政府從英美借來的外國軍費基金。這個死灰色的都會，到了沉淪的前夜，還在發揮其消耗的作用啊！

現在讓我們談談日寇侵入租界以後的局面吧！

與日寇侵入租界的第一個結果，是使一些對孤島仍抱着桃色的夢的民族資本，完全幻滅了。一八三三以後三藩多月的炮火，和敵人在租界內散放對於租界北部的劫掠，擊毀大大小小的工廠，也就損失了三千五百七十餘家。這種慘痛，這種教訓，仍沒有喚醒了那些廠家的迷夢。據公共租界工部局工業課的統計，一九三七年年底，上海租界工人僅有二萬七千人（戰前上海產業工人在三十萬以上），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租界西區之工廠做工，一九三八年年底增至二十三萬七千人，開工的廠數，此時已達四千七百〇九家之多。至一九三九年，生產量竟超過二十五年度的紀錄。

●離佩商酌資裁制沒有使他們覺到錢的資金內移的呼號，沒有使他們動心。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所謂寇施行風暴的摧殘，滬市工業遂一落千丈了。以滬市工業中心的滬甯區而言，太平洋戰爭以前，該區開工的工廠與工場總計約一千二百四十九家，而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一下午就關閉了五百〇九家，而遺存的六百餘家工廠，僅有一部份開工者。爲什麼衰落得這麼快？一方面是因爲敵人的炮擊，一方面則由於敵人的封鎖使原料來源的斷絕。現在仍在那兒開工的工廠，分明是爲了寇施行的這些工廠的損失。據最近統計，華僑國家的損失那是難以形容的了。

六、對寇施行的總之調查。據英美在華東經濟據點的報告。從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那天起，英美在滬的僑民中全部撤爲中立地帶的存留。英美的銀行產業亦在敵大管理之下進行清理了。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前起運到五天清運英美的而此的銀幣之受委清理者爲正益等六個行行的代表。對五金銀行代表陳精理運到砂礦等運到運通、美豐、匯業銀公司及華北籌款家；三井銀行代表神戶清運運到利仁三慶銀行代表柳和清運花邊；住友銀行代表河戶清運大通、台灣銀行代表岡本清運荷蘭國按建支那莊家西商辦銀行代表大草清運有利。清理完畢後，在敵總管理更復蓋各行的保管箱亦在敵寇限制之下開啟提取。產業方面，敵寇於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將滬市七十五家同盟國之企業自備於自備監視之下營業；是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租院又宣佈同盟國其餘的區百餘家商行中，除少數被敵寇接管之外，營業之在遠趨或被管轄的重要商行，計英商方面，有馬勒洋行的馬勒洋行、來明公司、蘇利洋行、通用電器公司、義利洋行、美利公司、格和洋行、太古洋行及上海香港地產、蘇聯、都城等飯店；美商方面有匯芳公司、中國汽車及青島輪船公司、米爾德、振發、蒙影公司。所謂管理，不外是霸佔的別名。英美在滬的金融產業商行，完全落

天日總手中了。

孤島的陸沉是以上海之暫時殖民地化爲內容的。在這兒，除了倭漢奸之外，中國的民族資本再也不能尚延殘喘了；在這兒，英美與日寇對立的局面暫時消逝了。日本強盜已經獨占了上海。這千瀾占，不容許中國民族資本的存在，亦不容許英美列強資本的存在。

三 自由中國的經濟

自由中國的經濟，包括了西南西北大後方與敵後抗戰的地區。自由中國的經濟，是更敵寇鐵蹄下的淪陷區對立的。西南西北大後方與敵後某些地區的共同點，是這些地方，都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都是打退日寇收復失地的據點，這些地方的人民，都爲抗戰建國而努力。但它們彼此之間，仍有差異存在。這就是西南西北大後方是一個遼瀛的領域，而敵後抗戰的地區則處在敵人的包圍之中，這就是前者的現代化的工業是遠非後者所可及的。至於人民的物質生活上，大後方是比敵後某些飄揚着抗戰的國旗的地區較富裕綽綽，但經濟界中的冒險行動，敵後那些飄揚着抗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地區似較後方平靜一點。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大後方各省的狀況吧！

（一）大後方——西南與西北

西南係指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及湘西各省區而言，西北係指陝西、甘肅和寧夏察省而會。西南與西北雖同爲大後方，但它們的經濟狀況，並不完全一致，所以，在敘述的時候，我對不

自西南各省的社會經濟，在抗戰以前，是頗為冷落的。它們的冷落，表現在現代產業的缺乏，雖現在手工業佔着絕對優勢。國民政府工廠檢查處於民國廿四年根據修正工廠法第一條，對各省由進行調查統計，計合於工廠法之工廠為六千三百四十四家，在這裡，廣東、廣西、四川、貴州四省並未算，而有數字的湖南，只有三十九家，雲南只有十六家，共五十五家，佔總數百分之〇·八三。這個時候，四川、貴州並不能說連一家工廠也沒有。以四川言之，據四川省政府所出版之「四川省概況」，二十五至二十六年間，資本在一萬以上的工廠，全省只有四十八家，其中超過一萬元的共有二十二家。但以設備而言，多係舊法的手工业生产。嚴格說來，他們只能說是手工業工場而已。如馳名國內的一內江之糖、富順之鹽、成都之錦、夾江之紙、隆昌的夏布，那一項不是手工業生產呢？貴州的情形，比四川更為落後。因此，我們可以說：戰前西南的新式工業，真是一寥片晨星了。

整個中國的產業是落後的，西南各省自然不能例外，但相對言之，西南各省是比東南落後的，因為東海沿海還有幾個工業據點。在貧弱的中國裡，偏在的狀況，不平衡發展的狀況，是分明存在着。抗戰的洪流把這種偏在的情況衝破了。

衝破這種偏在的重要契機是沿海工廠的內遷。內遷的工作，是從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就開始。經過了綿長的旅途，經歷了無數的艱辛，直到二十九年，百分之七十的內遷工廠，終於在後方開始工作了。內遷廠數一共六百餘家，其分佈情形，四川最多，佔二百五十家，湖南次之，佔二百二十餘家。遷入川湘二省的廠數，竟佔全數一半以上了。其他，滇、黔、桂、陝、贛、

新等省約一百家。這些內遷的廠礦，設備與技術都起比內地優良的。他們之內遷，當然能使內地的熱鬧起來了。從業別來說，屬於重工業的企業，共三百四十餘家，在這裡，鋼鐵工業之家，機械工業二百三十餘家，電工器材四十餘家，礦業八家，化學工業六十餘家。這些基本工業之遷入，對於西南的經濟建設，其意義是很大的。

對於廠礦的內遷，我們還是覺得不夠的。吳承洛先生說得很中肯。「我們所最感到痛心的，就是廣東與山西省的工業，以及山東的重要廠礦，及南京無錫的民營工業，未能依照計劃，或安定迅速拆遷的實施，不然，現在內遷的廠礦，又可增加二百個單位，而化學工業、紡織工業、機械工業、煤礦工業及麵粉工業，在後方的全貌，又必因之改變其面目。」

除了民營工業的內遷以外，國家資本所經營的產業，對於發展西輔經濟，亦提供極大的成績。資源委員會直轄的廠礦，截至三十一一年，已達七十多個單位，其中工業包括大規模的機械廠、電力器材廠、動力油料廠、動力酒精廠、化工材料廠、低溫油廠、鋼鐵廠、銅鋅等提煉廠、鑛包括煤、鐵、銅、鉛、鋅、錫、鈾、汞及石油等。動力方面包括水力發電廠與火力發電廠。在這七十多個基本工業中，有六十多個是分佈於川、湘、滇各省的。這麼一來，西南各省便握有相當的工業基礎了。

這幾年，不但沿海的廠礦移入來，不但國家資本在重見投資，而國內地原有的工廠亦不斷在擴大着；新的工廠亦不斷地在建立着。如果把新設的、遷建的、連同原有的廠礦一道計算起來，後方較大的廠礦，現在已達到一千多家了。這一千多家廠礦的極大部分，是分佈在重慶、成都、自貢、湘西和昆明等地的。在過去，這些地方的樸素的原野，只是唱着牧歌，只聞着機杼之聲，

現在已經疏疏落落地點綴着煙点，已經若隱若現地可以聽見馬達的節奏了。西南後方這種狀況，在某一程度上，分明是克服歷史上產業偏枯的狀態的。

在金融方面，抗戰以前，西南各省的銀行是很少的。貴州在昔本身沒有省銀行，外省銀行亦僅二三家。抗戰之後，四行與其他商業銀行，挾其雄厚的資本，深入內地遷移總行或創設分行。在這個期間，新設或由錢莊擴大的銀行，亦屬不少。而各地縣銀行之普設，尤為值得注意之事。以四川一省而言，縣銀行就達六十五家（三十一年），為全國之冠。金融事業之發達，如果在正常狀態之下，那是大有功於工礦與農產的。可惜的是闖入後方的金融業，在實質上只發揮商業資本的侵蝕作用。所以金融事業的畸形發展，只是意味着產業資本的困迫而已。

交通方面，在種種困難的局面之下，擴充了內河一些航線——如沅江線、嘉陵江線及金沙江線等；完成了一些公路——川黔、川陝、川湘、川滇、川康等公路，都已開車，現在梗塞的滇緬公路亦是在抗戰以後動期二十萬民工造成的。現在的交通建設顯然是落在客觀需要之後，但較諸戰前，分明是進步了。

西南的經濟建設，的確是有些成就。它的可喜之處，不僅在於增加工礦的生產單位，而且在於提供一些寶貴的技績。據周茂柏先生的報告（三十一年夏），戰前國內不能自製的萬能磨床、冶煉機械、軋鋼機械、煉糖機械、酒精煉製機械、紡織機械中之鋼絲機及船用高壓水管鍋爐等，現在皆能在後方自行設計製造了。這一成績，是工程師、廠家與職工努力的結晶。實在是值得驕傲的。可是，我們却不能忘記大後方產業的弱點。以煤產來說，綜合川康、滇黔、湘贛與陝甘豫鄂等區域中二十四個煤礦，每年的最高產量為一百餘萬噸。這個產量，不及開採煤礦局一年產量之

半數；比焦作之中福公司的年產只多一倍。這些數字，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西南大後方的經濟建設雖有相當的進展，但進展仍是有限的。我們不應認識年來奮鬥的成績，尤須應認識這種奮鬥之不夠。客觀的需要，還有待於我們之加倍努力呀！

從經濟性質來說，抗戰以前統御着西南各省的舊綽號產關係，依然在這些地區的每個角落存在着。以大後方廣漠的農村來說，地主與佃農間的關係仍舊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地租之高，不但吃去了平均利潤的部份，而且吃去了相當於佃農工資的部份。據中農月刊第二卷第八期所載：「萬縣一帶的租谷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區多爲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爲普遍」。萬縣這種地租率，雖不是西南各省所共同的。有不少地方仍舊是主佃對分制者。就是以主佃對分作例，農民亦何嘗能沾那一部份相當於平均利潤的農產物？除其地租之外，還有什麼搾租？還有什麼送禮？這是對於佃農的剝削。對於中農貧農呢？嚴重的剝削和重利盤剝的高利貸——廣充的利息高到七八分；川北一帶流行着「大行一」——亦使地租變爲地租。這種生產關係不是保持着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麼？以日用品的產量的比重來說，據農林部的估計三十年以來後方全部棉紗生產量，全川達四萬餘包，其中機紗約佔其百分之六十。棉織的生產中，機製成務所佔的比額雖低，總量共一千二百八十萬疋左右。動力織機所產之僅佔百分之三，染織廠所產佔百分之四。估計產倒多數的百分之九十三，差不多都是零星作坊織戶所產。這些作坊或者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工業經營，但家庭小工業或獨立經營的作坊，爲數亦是不少的。這不是說，大後方的日用品，有極大部份是前資本主義的作坊或家庭工業所生產的麼？這就是說，在抗戰以前，在西南大後方的經濟建設中，

上，顯然是資本主義式的了。但這些人們如馬細云、張研工業與工作條件，那他一定可以發見這裡仍有不少的前資本主義的成份。人們如馬細云、張研基礎工業的薄弱與重要器材配件原料之仰給外國，那他一定可以發見大後方的現代產業，仍是充滿着依賴性的。這種依賴性，這種前資本主義的落後性，在在證明大後方的社會經濟性質，是沒有什麼變動的。高叔康先生在論「四川經濟的現狀與將來」時，謂東南工廠遷到四川來，影響四川經濟發達不小，但並沒有把四川原有的經濟特徵完全解消（見新經濟第七卷第十一期）。如果從上面的意義上說來，這種見解是可以同意的。

西北的情形，如果與西南對照起來，那就顯得更加冷落。以工業言之，陝西是西北較興旺的地方。據吳承洛先生的「中國戰時工業概觀」一文，「陝西原有省立機器局及大華紗廠與麵粉公司、咸陽酒精廠、集成三酸廠等。戰後內遷工廠來陝日多，陝西××一帶，成爲新工業區，大小工廠，不下百餘家，每日可產機紗五千包，機粉四十萬袋，機器七十噸，皮革五千張（見「中國工業」第六期）。省府與蘭州聯合辦一興有煤礦公司，又設立陝西營業公司以資本二千萬元，分貿易生產二大門，生產方面，擬設藍水泥玻璃、打包、磚瓦、陶器、造紙等工廠。至於甘肅，工業建設甚早。甘肅製造局及呢絨局是左宗棠設立的。抗戰以來，除恢復了織呢廠與製造廠之外，又備設酒精廠、水泥廠、玻璃廠、小理紡織機廠等。最後盛產的是玉門的油礦。這是抗戰以來經建的一個可喜的成績。其他如寧夏、青海等地，現代工業還是極其原始的狀態。如果把現代工業與手工業對比，則手工業在西北所佔的優勢，比着西南，更覺得更利害了。

說到農村情形，更是驚條之至。一般說來，西北農村的荒蕪的程度，斷非南方人所能想像得

到的。人爲的罪惡，使這兒一帶的老百姓，都失去了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對峙的河西就是一個例子。據大公報記者高集先生的考察，「從武威到張掖這條五百里長的交通大道上，除了永昌、山丹、水泉驛三個城市，幾乎只有破壁斷垣及長城殘留的廢牆陪伴着旅人了」。荒涼還不算，最特色的是那兒人民的貧窮，「河西大部份老百姓，問起他們的家產來，答覆都是「三塊石頭一頂鍋」。除了吃飯的家具以外，別無異物，沒有褲子穿和沒有被子蓋，都不是稀奇的事。他們夜裡取暖的辦法，是在炕上堆滿了細砂。將細砂燒熱了，自己再鑽進熱砂裡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公報）。這真不知是人間何世？如果不是人禍與人禍所造成的天災之交相煎迫，河西的人民何至弄到這個田地？

西北經濟的落後性，一般說來，較諸西南是來得更甚的。但亦有不可一例論者。西北高原的情形，就是如此。在那兒，特別是那些曾經更新過農村關係的地方，呈現出一種與其他地區不同的趨勢。在其他地方，農村經濟發展的傾向是地主的土地與財力，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而中農大部份降爲貧農，貧農則大部份降爲雇農。反之，這個地方却不如此。因爲各種沉重的負擔的取消，農民的生产力與生產情緒提高了。農村富戶遂逐漸增多。許多以前的貧農僱農，現在轉變爲中農或富農。農村經濟的主要成份不是地主富農，而是中農。八九年以前，在這個荒原上，手工業是落後得可憐的，是稀少到近於「沒有的」狀況的。到現在，不但有相當數量的生產合作社——特別是紡織合作（有三十處，布機一六七台），而且有小型的機器廠、化學廠，與一些手工業工場。在這裡，計公營工廠二十一個單位，家庭副業擴充至土機一萬二千台，手紡織車六萬八千架。在這裡，公營工業與私人工業一齊發展，而私人工業的一部份，則是屬於合作性質的；

在這裡，生產者的條件是日益改善的，他們已脫離困憊之境況而步入衣食豐足的領域了。正因為這樣，他們知道爲什麼而生產；他們把生產看成爲本身的事業。在沙漠似的荒原上，竟創製出青翠的綠洲來。

友邦人士稱大後方爲自由的中國，這是與那一片在敵人鐵蹄踐踏的淪陷區對立的。把大後方與淪陷區對照起來，這二個地方分明是不同的。淪陷區暫時已淪爲日本強盜的殖民地了；而大後方呢，却是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在這兒，雖然保持着戰前那種社會經濟的性質，但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正在努力把牠推前一步，努力爲抗戰建國而生產，努力爲迎接光明而流着血汗！

(二) 淪陷區中飄揚國旗的地方

淪陷區並不是完全由敵寇漢奸統治的，在那兒，還有一些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地方，這些地方，泰半是受過敵寇的踐踏，是經過深入敵後的部隊與當地人民一番苦鬥之後建立的。所以，它們與淪陷區完全不同；如果與大後方比較起來，亦有一些特異之處。最顯明的地方，是它們所處的環境。

什麼是他們所處的環境呢？

第一、敵後飄揚着國旗的地方，是處在敵僞包圍之中的；它們與大後方失去經常的聯系；周圍的交通線都被敵人所佔據。不但如此，我方爲了對付敵人的「掃蕩」，對於平原地區，不斷地進行大規模的破路工作；而敵人爲了對付我方，亦拚命的進行其分割政策。分割的辦法是築公路

以便利它的軍運；公路之外，又加上一些什麼鐵路溝等等。這麼一來，那些佔有平原地勢的抗聯地區就被分割得零零碎碎了。

第二、這些地區多位於省與省之間，而這些省份，過去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各方面，都是極不平衡的，因之，在這些颯揚着抗日旗幟的地區的內部亦就呈現着不平衡的狀況了。

第四、這些地區與敵人統治下的地域，形成一種犬牙交錯的形勢。這種犬牙交錯的形勢，使敵人的經濟戰更爲劇烈。

第五、這些地區通常是處在戰爭的狀態中的。敵寇視這些地方爲心腹之患，故摧毀不遺餘力，所謂「治安強化」，最近已進行了五次。這種形勢，使這些地方不能像大後方一般，和平地進行比較固定的工作。

這些特點，對於敵後飄揚着國旗的地方的經濟，影響極爲重大。因爲這些地方四周的交通線被敵佔據，而平原地區又常進行破路工作，所以交通運輸比大後方更感困難；因爲這些地方內部各區域的發展極不平衡，所以，初期各地的通貨不一致，金融商業感到極端的障礙；因爲這些地方與淪陷區犬牙交錯，所以敵我對於貿易戰、貨幣戰、封鎖和反封鎖的戰爭，比大後方更爲劇烈；因爲這些地方都是經過敵寇的摧殘的，所以當地的富裕者，多攜財他往，羣集天津或上海的租界（太平洋戰爭以前），而留在本地的股戶，則感於社會秩序未安定，避免多難捐款並且爲着敵人常來擾亂，押品不易保管等原因，不願意再事放款，另一方面，這些地區的人民存在被佔領都市中的放款無法換回或匯入，因而形成金融萎縮的現象；因爲這些地方常處在戰爭的狀態中，原有的工業多被破壞，重新建立的工業亦不容易，所以形成生產不足的现象。

在抗戰以前，這些地方多是生產比較落後的。淪陷區中的大城市，具有現代工業的經濟特點，都在敵人手中。敵寇佔據大城市以攻我；而我則常有農村以抗敵。經過當地人民的合作與努力，雖有些小城市，雖有小量的工業生產，但從全體來觀察，農業是顯然佔着優勢的。

以生產規模來說，這些地方的農業，還是分散的生產；工業方面，亦是分散的生產。農業生產的分散，是由於中國的經營，還是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戰前如此，戰時在敵後更難有集體耕種之可能。工業生產的分散，是由於各該地區的工人，在方式上，仍以作坊或家庭為單位，而為了適應於戰爭的狀態，不得不避免過大的設備，工業生產亦集中在一點。所以，戰時的工業，和一般新式的工業，多分散開來，疏散到各地方去。生產的方式既採取分散而集中，那末，它們的規模自然趨於細小。

從經濟性質來說，這些地方亦是具有若干特點的。在這兒，日本強盜的特權，一筆勾消了，而其他友邦，則在這些地方亦沒有什麼經濟權益。不等的交換與不等的經濟關係，已普遍地沒剩存。但敵寇的毀滅作用，還不可忽視的。其在農村，減租減息，先後實行。某些官僚國家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的土地，都被沒收了。封建經濟的力量，逐漸降低了。跟着這種轉移，土地集中的趨勢，在事實上懸崖峭壁的，但在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權的分散，正在開始。但這一現象，還未顯著地呈現出來。

因為舊的經濟關係也受到限制，所以，無論農業亦好，無論工業也好，獨立生產者在各地都有順利發展的傾向。獨立生產者的發展，表現為半自足的小商品生產佔優勢。農業大部份是自然給自足的，但土布，造紙等業，大部的出產是爲了出賣。一些大的織布機亦在工廠中出現了。自

然經濟正在發展成爲商品經濟。

要使獨立小生產者走入集體經濟的園地，合作社是一條橋樑。但各地都是小農生產的地區。農民是過慣了個體經濟的生活的，而且悠久住在鄉村中的農民，性情非常保守，當他們尚未看到合作社的利益之前，合作事業的發展是很有限的。經過了春耕、墾荒、和造林等集體勞動的經驗之後，經過了合作社的利益的暗示之後，人民漸漸認識合作社的重要了。在工業方面，許多手工業的工業合作建立起來了，但因爲資金與器材的關係，工業合作還未能盡量的發展。綜合農業與工業來說，合作經濟還沒有起着主導的作用。

除了生產合作社之外，還有公營經濟。公營經濟包括金融、軍事工業與輕工業。不過，因爲客觀一些條件之限制，這種經濟的發展還感到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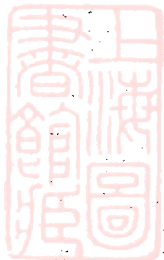
因爲這些地方過去的經濟基礎非常薄弱，且又經過敵寇多次的洗劫，自從二十九年以來，敵寇在敵後各地施行其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之後，這些地方的工農生產就更受到打擊了。但是敵人的打擊是不會使這些地方的人民却步的，他們在困難中不斷從事於提高生產，改良生產技術，與進行生產競賽，不久的將來，是可以獲得應有的成果的。

第四章 敵我經濟戰的策略

敘述的範圍

本章是以討論敵我雙方的經濟政策為任務的。在緒論中，我們已指出：敵我雙方的戰時經濟政策，都以支持戰爭，供給戰爭的物質需要為首要的任務。但是，由於戰爭的性質之不同，由於雙方的立場之差異——敵人是侵略的而我國的抗戰則是自衛的正義的，所以，雙方的經濟政策的原則，亦呈現着顯著的不同。敵寇的侵略戰爭完全是為了敵國的獨占資本與封建地主的利益，因此，它不但盡情的剝削我國淪陷區的人力與物資，不但拚命咀吸南洋一帶佔領地的人力與物資，而且在敵國國內，亦施行着一種榨取廣大人民的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敵國統治階級用盡一切方法，把戰爭的負擔沉重地壓在敵國人民的身上。他們不但負擔了一部份戰費，而且被送至異國的戰場上，充當炮灰。就是中小資本家，亦在所謂統制政策之下，失去其活動的可能性了。因此，敵寇的戰時經濟政策，是充滿着矛盾的，是充滿着掠奪性的。反之，我國的抗戰，是為着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故戰時經濟政策的根據，乃為支持抗戰抵抗侵略，照顧各階層的利益和對於中小生產採取因勢利導的態度。這種根據，與敵國的經濟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敵我經濟政策的範圍既如上述，那末，在敘述敵寇的經濟政策時，必須分析敵寇在國內採用什麼策略，在國外佔領區採用什麼策略，才能弄清敵寇這幾年經濟政策的全貌，但本書所欲研究



的是戰時的中國經濟，故其有顯的課題，乃是敵寇在淪陷區中所施行的經濟政策，乃是其意也。

對於我方所採用之經濟政策。至於其餘的問題，讓專門研究敵國經濟的學者去努力吧！

小敵我的經濟戰爭，是深刻地在戰時的中國經濟上，獲得反映的。淪陷區的殖民地之深化，

後方經濟建設之情況，都可從敵寇的經濟攻勢和我方的經濟政策，求得一些解答的。所謂經濟政

策是依據經濟現象而文推測經濟現象，其意義就是在此。

敵寇經濟攻勢的演變

敵寇經濟攻勢的演變，其特點在於「以戰養戰」。

日本強盜對於我國的侵略，滿以為可以速戰速決，但是，我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把這一個迷夢粉碎了。面對這個冷酷的現實，杉山（當時是陸相）不得不於一九三八年二月間，發表「準備長期戰爭」的文告，近衛不得不於同年五月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發表「準備長期戰爭」及「物質精神總動員」的訓詞。為其支持這個長期侵略戰爭，它們便提出所謂「以戰養戰」的政策。用他們的術語來解釋，這就是「開發重於封鎖」。

敵寇「以戰養戰」政策之明顯施行，是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以後之事。但，在此以前，它對於

某一地區，某一部門的做法，並不是完全沒有這種意味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之成立偽「蒙疆銀行」與發行偽「蒙疆鈔票」，就是例證。

「以戰養戰」政策之實質，就是「以戰養戰」。

的經濟戰術，却時時在變動着。因為地區之不同，條件之不同，敵寇的經濟攻勢便不斷在更

動了。作爲在這種所叙述的，就是在看敵人「以戰養戰」的政策下，所採用的戰術是如何在演變着。

(二) 從奪取外匯到掠奪物資

中日間的貨幣戰，是抗戰以來最惹人注目的一幕經濟戰爭。有人以爲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這個貨幣戰已告一段落，這是不合事實的。中日的貨幣戰並未終束，不過改變形態罷了；如果從實質上說，這一戰爭，不特未嘗結束反而以更劇烈的姿態在進行着。

敵人的金融攻勢，是甚微經濟侵略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要在暴力的搶劫以外，進行深度的剝削，進行物資的吸取，那末，通貨這箇工具，是必須使用的。怎樣使用這箇工具呢？問題可就複雜了。在淪陷區裡，在它的傀儡政權力量所及的地方，敵人當然可以用指揮刀和鎗桿作爲「保證」而發行偽鈔或軍用票，但問題並未因此就解決的。早在抗戰以前，法幣就在我們的國土建立起它的信用。雖然備受敵人的壓迫，但法幣的信用仍堅定；而同時，由於中央政府與敵後抗日地區之支持，由於英美友邦之資助，敵寇對於淪陷區的法幣，更加感覺困難了。因此，在金融攻勢上，敵寇不停千方百計在推行偽鈔和軍用票，而且千方百計在排斥法幣破壞法幣。所以，我們可以說：敵我貨幣戰的中心，就是上海和淪陷區的法幣問題，就是上海和淪陷區中法幣與偽鈔軍用票爭生死的問題。

敵偽破壞法幣的戰術，是因時因地而異的。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它們便成立爲「蒙疆銀行」，發行偽「蒙疆鈔」；二十七年又在北平成立爲「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聯銀鈔」。爲了

推行偽鈔和軍用票，敵僞便瘋狂地排斥法幣了。它們宣佈自偽聯銀票發行三個月後之二十七年六月份起禁止南方地名的法幣與雜票在華北流通；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以後，中國北方各省地名法幣亦一律換取偽鈔，逾期即禁止使用。這些辦法，是沒有發生什麼效果的。於是敵僞便採取直接破壞法幣的辦法。這就是強制法幣貶價，於二十七年八月公佈法幣貶價百分之十，二十八年二月又續貶百分之三十，連前共貶價百分之四十，同時又禁止法幣之流通。在開封，敵人發現人民持一元法幣者，即行沒收，六十元以下者，處以徒刑並罰款；六十元以上者處死刑。此外，散佈謠言和偽造法幣等卑鄙手段，亦層出不窮。這是二十八年五月以前，敵人在中國北部的做法。它們打算這樣就可以把法幣打出中國北部，就可以替偽聯銀券安定江山，然而事實的邏輯，却包含着許多矛盾。這些矛盾，給與敵寇的辦法以無情的打擊。因為敵寇將偽聯銀券聯系於日圓，規定偽幣與日圓維持同等價格。在那個時候，國外及上海公開市場中，日圓高於法幣，而法幣高於偽幣百分之二十五。這樣，上海投機商人把日圓換成法幣，帶至北方換更多的偽幣，再以偽幣換成日圓。投機結果，使日圓有國內外兩種匯價。在上海的日圓縮短而在敵國國內匯價放長些。所以，外國商人只在上海購貨，日貨只好假道上海輸出，使日本輸出商得到較少的外匯。這個矛盾打擊了敵人，亦教訓了敵人。於是它們又擴大戰爭侵略的規模，並且改變其一些作法。

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敵僞在上海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這就是敵人把貨幣戰擴大到中國中部和南部的起點。在這個時候，敵寇的做法改變了，它們規定偽華興券與法幣聯系，並可以無限制購買外匯。爲什麼如此呢？第一是在中國北部貨幣戰的教訓。敵人用日圓直接聯系偽幣（除了換成日圓之外，偽幣不能換取其他任何外匯）的結果，不但未能穩定偽幣，反而把日圓拖下水。

，反而低了日元的匯價；使用武力壓制法幣的結果，不但未能使法幣如期退出中國北部反而使偽幣和軍用票更加跌價了。第二是法幣在中國中部和上海的基礎之鞏固。這一事實告訴敵人：在中國北部用武力禁止法幣是不容易達到目的的，那末，在法幣的基礎十分穩固的上海與中國中部，又焉能輕率從事呢？第三是奪取我外匯基金的毒計。爲要補救其缺乏的物資，特別是軍火原料，敵人非有巨量的外匯不可。在貨幣戰爭中，它學乖了。它看清我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是在供給黑市外匯。利用這個機會，對於敵人是利於的。於是，不惜犧牲日元的信用，於五月十九日貶低日元對法幣的比價，從中國北部運輸大量法幣往上海，在公開市場上，套取我外匯基金。爲了套取外匯，敵寇對於中國中部的法幣，便暫時採取一種與它在中國北部不同的態度了。這就是說，它從禁止法幣轉變到利用法幣。這個時期相當長，從二十八年五月偽華興商業銀行成立的時候起，至三十年七月英美凍結中日資金的時候止，差不多有二年幾個月的時光。

「敵人對於「華中」法幣的看法，向來即分文武兩派。武人主張積極破壞，但對於破壞後的善後，又乏妥善而有把握的對策；文派由所謂中國通和在「華中」的工商界構成，他們的主張是暗中利用。利用論派的着眼點，除了外匯市場之外，還注意到他們在淪陷區中費盡心思所建立成功的物資控制系統的圓滑運用」（新經濟第七卷第八期一四八頁）。三十年七月美國凍結中日資金，雖刺激了破壞派的抬頭，但利用論派仍未變其立場。他們以爲外匯市場雖然沒有，而各地流通的主要通貨仍法幣。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整個局勢完全變了。破壞論派的軍人，已完全壓倒了利用論派。急烈的全面的向法幣進逼，便節節展開了。

三十年三月七日正金銀行宣佈廢止軍用票與法幣的比價，並規定以偽「中備券」爲結價標準

，就是說選到法幣採取全面攻勢的開始。三月二十五日爲「中央儲備銀行」復強壓法幣對僞中儲券的比價爲一百對七七，此後繼續壓低，到五月下旬，兩者比價竟達三二對一了。六月一日僞方規定一切債權契約均以二對一之比價清算；六月八日交還佈收回法幣的僞命和所謂「妨害」新法幣行傳的治罪條例。六月二十日除廢預備禁止使用法幣的僞命；又於是日起，先從南京上海兩地開始禁止法幣之使用。敵僞對於法幣的全面進攻，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敵僞雖猛烈對法幣作全面進攻，但在事實上並未完全否定過去對於法幣之利用。所差異的是利用的方法不同而已。過去它維持法幣對軍用票及金鈔的比價，其作用乃在經過這種關係，向金融市場攫取法幣的外匯；最近之空前排斥法幣之舉，其作用不但在於使僞鈔貶值，而且在於集中大量法幣，以爭奪敵區及法佔區內物資。它的具體的辦法大概是：（一）以所得法幣，發給附屬於各個部隊的物資統制機關，搶購各地貨物，特別是食料；（二）發給日人各種吸收物資的組合，加強其吸收活動，大量收購木材及皮貨，羊毛和鴉片等。藉此可見：敵寇之排斥法幣與搶奪物資，是互爲表裏了。在這裡，還必須注意敵人之防禦我方之貨幣反攻，企圖阻止法幣之自內地向東流。要達到這個目的，敵寇是一定加緊其對於大後方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封鎖的。某專家說得好：敵入如果「不是這樣，它利用所調得的法幣，向內地兌現成實物的事，亦就不容易辦得好。因爲自缺口送出去時，可以高喊口釋流回來。這就成爲不損軍功取利的公平交易了」。這種情形，使我們更明白的看到：當前貨幣戰的內容，是一個物資爭奪戰。

不會利用法幣也好，排斥法幣也好，這些都是敵人以戰事戰的具體戰術之一面。因爲利用法幣的重點乃在套取外匯，而禁止法幣的內容則在於掠取淪陷區物資。這正着，完全是從後方其

就地取糧。支那侵略戰爭的作用。

（三）從入口走私到出口走私

在貿易與物資上，敵對對我進攻的策劃，是封鎖。走私並重商，但封鎖的規模，一天比一天在擴大着，而在與封鎖配合之下，敵對對走私的策劃，走私所發生的作用，都是變而不居的。

敵對對我走私，是在廣州海關被破壞之後，才系統地進行着。但我們却不能說前此敵人沒有走私一項的當。一八一三年，鴉片爆發後，敵人便宣佈封鎖北海至英國北部沿海，又再過幾天，又宣佈封鎖中國本部海岸。這僅僅對沿海而已。對於北部的根據地，以後方與敵後游擊戰在遭傳時候，敵人還沒有嚴格的辦法。為了以沿海而歸，通過香港江鎮等港口，中國中部和南部的商品，都從粵漢鐵路經廣州商港內地，敵人的封鎖，在實質上，還不能沒有極大的影響的。但是，局勢的發展，迫使敵人注視這個問題。以中國北部來說，自一九四二年，不斷地在發展了。這些海軍，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大都要揮着密切的關係。游擊區域的棉布小麥等農產，都運入租界，經外灘之手運出，從而輸入麵粉、棉製品與武器等等。這對於敵偽，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因此，敵人便不斷設法，從而斷天津租界與游擊區的關係了。廣州武漢淪陷之後，敵寇對我的封鎖，在某種程度上，又大為增強。它不單地在沿海發射雷艇，由切斷運送各種物資。英美法荷各國的商輪，皆不能倖免。

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敵海軍發言人公然宣佈：「第三國在中國沿海之航行，一律封鎖。」敵人為得實如此呢？因為當與法國還與船費，以漢越鐵路對敵，敵寇的作用。西南後方的物品，前從這條國線運至河內轉香港，前海外和上海的製成品，又可經香港轉河內，從這條動脈運入。

內地。敵人在這個時候，雖未能「解決」河內與香港，在國際貿易上，對我發生的有利作用，但封鎖東南沿海尚未淪陷的港口，並切斷上海的工業品從其他港口運入內地，却顯然是敵人當時的要着。

僅僅看敵人對沿海的封鎖還不够，我們必須進而注視敵人在淪陷區中對於後方的封鎖，分析敵僞在這一方面所採用的辦法。

敵寇在淪陷區中的貿易政策，是與封鎖後方緊密地聯系着。中國中部淪陷區中的陸路，曾經有一個時候被日軍封鎖；開放之後，在水陸要道，設立敵方海陸軍檢查站，對於貨運，進行控制。○二十八年三月間，敵軍司令部規定有關軍事物品二十一種——鋼、鐵、銅、黃銅、鉛、鋅、鎳、錳、螢石、雲母、鋁、機械、煤、麻、棉花、羊毛、皮革、皮貨、漆、空瓶——除敵軍司令部及其所指定者外，任何人皆不准經營；而這些限制品，除其所指定之若干日商（即三井三菱等六大日籍公司所組織之「中支物資輸出聯合會」）外，一般日商亦不准自由競爭買賣。興亞院成立之多，又加強限制上海對內地之物資流通。除武器、彈藥、火藥及其原料外，對於自由中國（租界亦在內）禁止搬出的物品，已擴大至四十餘種。如汽車及其零件、橡皮底鞋、電筒電池、無線電用蓄電池、電報機器材以至水泥紙類，皆在禁止之列。很明顯，敵人這一毒計的目的，是在保持它自身的供應，並且削弱我方支持抗戰的物資，企圖藉此以增長大後方及淪陷區中飄揚着抗戰國旗的地區的經濟困難。

說了敵寇對我的封鎖之後，必須分析它的無恥而毒辣的走私。敵寇的封鎖與走私雙管齊下的政策，乍看起來，似乎有點矛盾。既然在海面上，在交界上進行封鎖；既然處處以削弱我方的物

資供給爲前提，爲什麼同時仍把大量仇貨運入內地呢？爲什麼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亦利用香港爲吐納口呢？其實，這二者並不矛盾。封鎖的主要目的是在禁止軍用品和一些發展經濟的生產工具之內運，而走私的貨物，則只限於一些與軍事無關與發展生產無關的東西。從此，可以看出敵人的走私與封鎖，不但不矛盾，而且具有特殊的作用。作用是什麼呢？第一是以仇貨吸取大量法幣，復用法幣在上海香港金融市場上套取我外匯基金；第二是以仇貨換取我戰地輸出品，如茶、絲、豬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以增強其外匯；第三是藉此以傾銷敵國國內一部份未能銷納的貨物，並與我國農產品作不等價之交換；第四是向淪陷區敵後抗戰地域及大後方搶掠它所缺乏的某些物資。如鴉片、棉花及糧食等，都是敵人所珍貴者。第五是利用奸商兼做間諜，以冒牌或無商標的商品，交給奸商運銷內地，而以報告我軍情爲條件；最後一點是排斥列強對華貿易，着着實實其獨占中國市場野心。在這裡，第一二點最佔重要。而這二點，完全是與這個時候敵寇對我的金融攻勢，配合一般的。

敵人走私的路線，甚爲遙遠。北自綏遠、包頭、以向寧夏、隴西，沿黃河沿岸，由風陵渡等處以入陝豫；長江中游則由老河口、鍾祥以向鄂北及沙市，並入川巴；一面由洞庭，鄱陽水道以達湘贛內地；沿海則由寧波、溫州、廈門、潮汕、海陸豐與江西各地進入內地；而廣州灣更是一個重點，從這裡，經廉江、陸川而集中於鬱林，再由鬱林流至廣西各處與筑渝等市。像蜘蛛網一般的走私路線，真是使人吃驚的！從這些漏洞，每年有幾萬萬元的法幣，有幾千萬担的物品（如鴉片、糧食、蠶絲與棉花等），源源流出去；又有幾千萬担仇貨，從這些間隙，不斷流進來！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局勢來了一個巨變。敵寇在太平洋方面，比以前更爲孤立了。它樹立

了更多的敵人，失去了一些重要物資的供給，而戰爭呢？却是綿延地拖長下去。這就使已經深陷泥淖的敵國更感到巨大的威脅。物資問題是擺在敵人面前的冷酷的現實。其次，由於香港之陷落與上海的沉淪，特別是仰光失守以後，滇緬公路的被切斷，敵人對我的封鎖，就握着更有利的條件。我們曉得：自法國崩潰，越南淪入敵手以後，滇緬公路就成爲西南大後方的唯一國際交通線。仰光失守之後，敵人雖不能完全切斷我國對盟邦的交通運輸，但，對我國沿海的全面封鎖，却是可以做到的。再其次，爲了扶植偽鈔在淪陷區中的地位，爲了對付大量存在淪陷區而又不能套取外匯的法幣，敵人的貨幣戰略，便從套取外匯轉成掠取了。據根這些條件與配合它的貨幣戰的政策，在封鎖與走私方面，它就採用一些的做法了。

當上海尙成爲孤島的時候，敵寇雖用盡一切辦法進行封鎖，但租界的存在，仍給它以若干的困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敵寇佔領了租界，牠們在上海便任所欲爲了。封鎖顯然比以前是更爲有力的。三十一年四月，上海敵寇海陸軍當局規定：兵器彈藥等物，除特許者外，禁止一切移動；各種機器，療治用具與汽車汽油以至棉紗、紙張等物，欲運出上海（往長江下游，日本、內蒙、東北及中國中部和華南淪陷區），須有特別許可證；個人可以帶出上海的物品，只有：棉布三碼，棉紗一英兩，人造絲品三碼，香烟一百支，火柴五小盒，食糧或食糖一日本斤，蠟燭六枝，肥皂六塊。敵人這樣的統制限制，完全是在對付物資之內流的。

敵人不但加強並擴大其對我的封鎖，而且在走私方面，亦變更其目標與作用。在太平洋戰爭以前，走私是貨幣戰爭的一種輔助手段；走私是爲貨幣戰爭服務的；太平洋戰爭以後，貨幣戰爭的目標從套取外匯移到掠奪物資，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竟成爲走私的一種手段了。因此，以前走

私的目的在獲取法幣（搬運土產當然是它的一種任務，但並非主要），以其所得的法幣散入內地。從法幣流動的方向來說，敵人過去走私的目的是在使法幣東流；而現在却改變成爲法幣西流了。以商品的流通傾向來說，敵人過去走私的主要目的是在使某些它不重要的商品向內地流入的，而現在却改變爲運入的少而運出的多。搬運土產，成爲這個時期主要的任務了。

敵人走私的內容，分明是起了變化的。爲了適合這個內容，它的辦法亦就與以前不同了。這就是敵人對於走私的方法，比以前更爲嚴密。在過去，陰陽交界線上走私商人，要能出入淪陷區，必須進行賄賂，才能登記，才能取得「通行保護」，這是說，敵人在利用走私；到最近，敵人已改變這種辦法了。牠已有計劃的主動的組織走私商人，不但登記時不用賄賂，而且一經登記便可取得敵偽的貸金（這些資金就是敵人認取得來的法幣）。這不是明明告訴我們：敵人已從利用走私轉化爲組織走私了嗎？敵人這樣的做法，眼見得：在緊迫封鎖之外，敵寇的搬運土產的走私，會越來越兇。這亦是它的以戰養戰的更進一步的做法。我們應當針對着這一毒計，打擊牠，粉碎它。

（四）從「中日合作」到「自給主義」

在工礦業上，敵寇的一貫政策是拚命的吸取我國資源，但做法上却常常玩着新花樣。在「七事變」之後，差不多有一年的光陰，敵人只是盡情的從事劫掠。牠們的暴行，比汪達人之洗劫羅馬，還來得更爲徹底。但自一九三八年夏季以後，敵人的態度稍稍改變了。爲了執行其以戰養戰的政策，敵入便致力於「開發」資源的方針之下，花樣仍是不斷在改變着。讓我們來看看敵人

在這一方面幹的是什麼勾當吧！

在執行「以戰養戰」政策以前，敵寇對於淪陷區的民族工業，是洗劫，是掠奪，是掠奪的方式，在北方各省大都稱為「軍管理」；在中部各省則稱為委任經營。但「二者的性質略有不同。「軍管理」的主權操諸軍隊，雖因軍隊不善經營工廠，於佔領後，仍委托日方「會社」代為經營，但被委任的會社，只握有經營權而已；而「委任經營工廠」，則無論主權經營權，均直接操諸日本會社之手。雖受與亞院各地連絡部法令的約束，但和軍隊沒有什麼關係，顯較前者更容易支配些」（中國工業第七期一六頁）。「軍管理」的工廠包括礦業及一般工業，除礦業以後歸併「北支開發會社」外，一般工業的總數，截至二十八年底共達九十七廠。其分佈地域計：山西四十七廠，河南河北各十四廠，山東十八廠，安徽二廠，江蘇綏遠各一廠。至於「委任經營」的工廠，其所包括的範圍更廣，其所佔有的廠更多。計麵粉十八廠，樹膠造紙各九廠，繅絲二十廠，紡織四十廠，造船十一廠，機器與金屬製造九廠，水泥三廠，染織六廠。如果把其他各項計算在內，這種工廠當達一百六十家了。

這種露骨的盡情洗劫，把這個海盜國家的品質，完全暴露出來了。強盜們是得意忘形的，然而事實的邏輯，否定了他們這種忘形的得意。因為洗劫和掠奪，使生產和商運都陷於停頓。淪陷區民衆的反抗情緒，着着提高了；而日寇呢？亦感覺到「殺雞取蛋」的悲哀。即就「軍管理」和「委任經營」的廠礦而論，由於敵人之摧毀，機器的破壞，廠屋的殘敗，工人的離散和敵寇資本的缺乏，亦有「計雖良得」，而「力不從心」之憾。跟着中國抗戰的展開，跟着「以戰養戰」政策之提出，敵寇對於工廠的掠奪，主要改採所謂「中日合作」的方式了。

所謂「中日合作」比較以前的盡情洗劫獨自經營的方式，是更為毒辣，更為高明的。暴力的劫掠是殺雞取蛋的方法，只能增強淪陷區人民對日寇的仇恨；而所謂中日合作則是養雞生蛋待肥而殺的辦法。這種辦法可以引誘一些缺乏抗戰信心的資本家去投資，可以利用中國的資本人力去咀吸中國的資源，以供其侵略中國。這是敵寇以戰養戰最基本的一點。在這裡，我們應該看看敵寇所謂「中日合作」是怎樣做法的？

首先是兩個所謂國策會社——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之設立（一九三八）。這二個國策會社並不直接經營事業，僅創辦各種分公司，保管分公司的股票，對分公司投資或通融資金，藉收調整統一之效。計華北開發會社屬下有十八個分公司，華中振興會社有十三個分公司。它們成立以後，中國北部和中部淪陷區中的煤鐵、鹽產、水電、航運及水產等實業，都在敵人的掌握之中了。如果從這些會社的構成內容來看，除了華北礬土會社及華北炭礦販賣會社以外，皆掠奪了我國原有的事業作基礎。單以華中振興會社而論，所謂「現物出資」——即我國被掠奪各業的資材折合現金充當資本的意思——約佔各分公司實收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六十六。敵人所認的「現金資本」部份是軍用票偽鈔或公司債而已。這一事實，完全顯露了敵人利用中國資材來咀吸中國物資的狼狽面目。「興亞院」成立之後，這二個所謂國策公司又重新定為中日合作。華中振興會社所屬企業，規定中國出資百分之五十一，日本出資百分之四十九；華北開發會社所屬各企業，規定中國出資百分之四十五，日本出資百分之五十五；全國交通機關的資本，均以中國佔百分之五十一，日本佔百分之四十九為基礎。不管百分之五十一也好，不管百分之四十九也好，這些喪失民族天良的漢奸資本只在幫助敵寇的侵略，只能拾得一些日寇的剩飯殘羹而已。因為經

營權全部擄在日人手中，絕大部份的利益，自然是歸諸敵人。

在這個時候，敵人不但決定把兩個所謂國策會社改爲中日合作，吸收中國的漢奸資本，而且做了一些更具欺騙性的勾當。這就是敵寇對於淪陷區工業的所謂「新政」。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敵派遣軍總司令西尾會公開聲稱：「將以若干財產交還其合法的原主」。於是：所謂「軍管理」「委任經營」工廠一律移讓歸還的口號，便在中國北部和中部的淪陷城市高叫起來了。這種歸還，表面上，是將國營省營等公企業，退給偽政府；而私人企業則歸還「正當權利者」。但實際上，完全是一個騙局。因爲這個「新政」只限於「軍管理」下的工廠，但軍管理下的工廠，數量不怎麼多；且有一部份已併入「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就是在這範圍內的工廠，亦並非直接交還原主，而是交給傀儡政權的。須由傀儡政權與原主談判，由原主償還敵寇原有的修繕費用後，才能收回。至於那些規模較大生產力較強的工廠，由兩個國策會社經營或日本私人企業所不願意放棄的，則全不在退還之列。亞勒士（John Athers）說得好：「西尾的「新政」，實在僅適用於佔領區一些無關重要的華人工業罷了。五月十八日日軍「交還」與北平偽組織的，亦無非是上述一類工廠而已。日人如此做法，實在是解脫一種束縛，而決不是放棄一部資產」。

從「軍管理」與「委任經營」改爲「中日合作」，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而實際上，敵寇咀吸淪陷區的物資，是更爲毒辣的。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敵開議通過「國土計劃設定要綱」，提出什麼「適地適產主義」出來。在表面上看，爲着充分發揮生產效能，「適地適產」原無可非議，但敵寇的適地適產主義不過是使淪陷區經濟更成爲日寇的附庸經濟的一種手段。「國土計劃

設定要綱」的序言下說，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日」「滿」「華」三者之間，實行適當分業，以實現相互依存，共存共榮之關係」。因此「在工業分野上，日本着重於兵器工業機械工業和精密工業的發展，偽滿是着重於電氣工業、礦業、一部份機械工業和輕工業的培植；在中國北部則着重於製鹽和礦業的開發，「中國中部」則容忍某限度內輕工業之存在。在農業上，……內蒙需擴充放牧地帶，以企羊毛之增產，在中國北部則先圖日本不完資源之棉花增植。而「中國中部」須以避免與日本農產和競爭之農作物為宜。……因而在農作物增產工作中，其先後次序應為：（一）廣義的軍需作物或一般稱為特需作物者（如羊毛棉花）；（二）有防止輸入意義者；（三）一般之民需作物」。很明白，這「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具體化。如果這一如意算盤能打成功，淪陷區的經濟不是完全成爲日本的附庸嗎？

到了三十年四月，敵人又提出「自給主義」了。所謂「自給主義」是日人在華事業，須由中國榨取資本，而不得依賴日本。於是，許多公司都企圖各種方法吸收土著資本。甚至如華中鐵道公司，亦不願逆財政困難，強索二百萬元以去。這就是敵寇「以戰養戰」的更毒辣的做法。以前它要剝削掠奪，還需要投下一點本錢，到現在，竟企圖不用一點本錢，完全用中國的資本，去汲取中國物質了。同時，這亦是「中日合作」的詭計的必然的發展。敵人對於我國物資的咀吸，從不許漢奸資本參加，到利用一部份漢奸資本；又由利用一部份漢奸資本到全部利用漢奸資本。這不是它的必然的趨勢嗎？

（五）「勤儉增產」與「三光政策」

對於被佔領區的農村，敵寇一向是盡情的大刮地皮。在北方各省，農民所負擔的租稅，竟達一百二十種之鉅，新築某個鄉村全村有二百二十戶，而每天平均對敵繳款之額，竟達二百九十七元六角。至於公路、路溝、碉堡和飛機場的「建設」，又使農民失去其生產手段，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逃亡了，農產減少了。嚴重的糧荒，迫使敵猶岡特夫將不得不承認「華北糧食增產爲當前急務」。於是「勤儉增產」的口號便提出來了。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一九四一年）竟將「糧食增產」規定爲主要任務，而投向農村的所謂「貸款」，據說總數是偽鈔一千九百八十萬元。很明白，敵人這種辦法，是包含着養雞取蛋俟肥而殺的用意；與它在工礦業中的「開發資源」，其作用與做法是並無二致的。如果要區別兩者間的差異，那只有下面一點。這就是農村中的所謂「勤儉增產」乃在使中國淪陷區替日本提供更多的農產品，企圖從此去實現其「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迷夢而已。

爲了支持其侵略戰爭，敵人不但咀吸淪陷區的物資，不但劫奪淪陷區的糧食農產，而且直接迫使淪陷區的同胞淪爲牛馬奴隸。北方各省極多壯丁，皆被日寇驅策，一部份捕解東北充當苦力；一部份則關在「當地」各礦山工礦中做苦工。這就是日寇「勤儉增產」的一面。據我們所知，從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北方五省淪陷區的壯丁，已有四百萬被日寇驅至關外去「勤儉增產」了。敵寇不但用種種辦法去強使淪陷區的同胞「勤儉增產」，而且用種種辦法去攫取人民「勤儉增產」的成果。什麼「配給制度」，什麼「獻金運動」，什麼數不盡說不完的苛捐什稅，應有盡有的壓在老百姓的肩上。而同時敵寇仍不忘使用其微妙的攻勢。這就是在大小據點中設立合作社；在據點附近各村普遍發展其社員。敵人在淪陷區中所設立的這些合作社，是採取物資的一個重要

環節。它一面排斥人民的商業，爲日資的獨佔打開地盤；一面則在於以不等價的交換，騙取老百姓的糧食和軍火原料。爲了排斥人民的商業，敵寇禁止商人販運布疋、火柴、紙張、煤油等物品；爲了吸取人民的農產品，敵寇以種種辦法引誘老百姓把糧食原料到合作社換貨。這是敵寇在淪陷區中管制生產與運銷的一個重要工具。這個工具之使用，是在敵寇開始「治安強化」之後。從這一點，亦就可以看出敵寇「以戰養戰」的毒計，是何等深入了！

對於反日運動尙未強化的地區，爲了希望有更多的蛋吃，敵人的掠奪方式是以欺騙爲要着。但對於游擊區，對於敵後颯揚着抗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的地方，可就不同了。在這些地方，誘騙性質的方法是沒有效用的，因此，它們的攻勢就完全全表露其獍豸面目了。

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前，敵寇對於我颯揚着抗戰國旗的地方的攻勢，尙帶着一些經濟性的動作，如貨幣戰爭與物資爭奪戰等是。雖然敵人未嘗放鬆其暴力的摧毀，但這種強盜式的燒殺掠奪，還是沒有系統沒有計劃的。到了二十九年以後，它們看見我根據地之不斷發展與擴大，看見我敵後抗日地區給與他們的威脅之日益增加，於是攻勢便變本加厲了。除了橫縱切碎一些根據地而外，又進行了嚴密的封鎖。這還不算，最殘酷的是它的無人性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三光政策」。

所謂「三光」就是燒光、殺光與搶光的縮語。「三光政策」的目的，就是在把抗日地區的羣固區變爲無人區；把鞏固區的附近亦變爲「治安區」。敵寇出極大的兵力侵入根據地的中心後，見人就殺，見屋就燒。鷄犬不留，木石俱毀。如果遇見一點剩下的財物或埋後遺物，那就因各種方法，搬走或拉到所謂「治安區」去。的確，敵人是做到這樣的。在五台，有一個東西寬五

十餘里，南北長百餘里的地區，經過敵寇之洗劫後，全部四十三個村，三千五百二十戶，一萬五千七百餘人的廣大地區，現在所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礫和荒蕪叢生的野草而已。這種史無前例的暴行，是大後方的人民所臆想不到的。但事實上，敵人却正是這樣在幹着。不但在中國北部的敵後是這樣幹着，而且在中部的戰區亦是這樣在幹着呀！三十一年夏天的浙贛鐵路一帶，就遭受敵人的這樣暴行。

「三光政策」亦是敵人「以戰養戰」的一種做法。燒光殺光的目的是企圖滅弱我的抗戰力量；而搶光的目的則在於以我的人力物力去補充它的所不足。在這裡，軍事侵略是伴着濃厚的經濟意味的。

(六) 越來越毒的經濟攻勢

這就是五年來敵寇對我經濟攻勢的演變。從這些演變，我們可以看出敵寇這一攻勢的目的是在掠取我國的物資。作為掠取的對象的有三方面；第一是我大後方的物產；第二是淪陷區中的工廠資源與農民的農產品；第三，在太平洋戰爭以前，英美的某些物資，亦被日寇作為補充的對象了。但這是必須經過交易的方式才能獲得的。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在一九四〇年七月美國凍結中日資金以前，日寇大肆其集中法幣套取外匯的勾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局勢變化了，因之，惹人注目的貨幣便變成爲物資爭奪戰。而隨着物資爭奪之激烈，走私的內容亦就與前大有區別了。過去仇貨是源源入口的；此後則千方百計吸取物資，企圖使大後方的物產向東傾流。過去敵人設法集中法幣；此後則從事於使法幣回流並散入內地，企圖藉此以增強大後方物資的緊張。

過去敵人對於敵後抗日地區的摧毀與破壞，是有意識的，是今日其發展成爲不計其數的「光政策」了。過去敵人對於淪陷區的工廠與農產，是採用殺雞取蛋的辦法的；如今則擺佈一些什麼「中日合作」，什麼「勤儉增產」的花樣了。總而言之，敵寇的經濟攻勢，是越來越巧妙，越來越毒辣的。

自從蘇聯在斯大林格勒擊潰納粹和英美在北非進兵以後，軸心國家的失敗，更爲明顯了。面對這個局勢，日寇的整個戰略方針，更可以看出是：保持主力，待機而動。爲了配合這個戰略方針，日寇在經濟上的「以戰養戰」的策路，一定是更爲加緊的。它將加緊其對於南洋被佔領區的掠奪；它亦將加緊其對於「中國中部和北部」淪陷區的人力與物資的劫取。因此，我們必須以極大的努力注意敵寇對我經濟的攻勢的効果，必須弄清敵寇這種攻勢的戰略與戰術，握住它的要害，給予它以無情的打擊。至於我們已採取什麼策略和應採取什麼策略，當在下一節論之。

三 我國戰時經濟政策

(一) 根據與任務

日本強盜不但對我施行一種殘暴的軍事政治的進攻，而且配之以野蠻的毒辣的經濟侵略。爲了打退日寇，爲了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我國的戰時經濟政策，必須把握抗日民族戰爭的性質，必須看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這就是說，決定戰時經濟政策的時候，必須把握住它的根

我國戰時經濟政策的根據有三：第一是抗日的。日本強盜使用一切狠毒的辦法，欲夷中國爲其殖民地，欲使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變爲它的牛馬奴隸。神聖的抗日民族戰爭，就是在粉碎日本強盜的這種侵略的。服役於抗日戰爭的經濟政策，當然以此作爲它的第一個根據。其次是全民族的。因爲在這次抗日戰爭中，除了那些認賊作父甘心當漢奸的敗類以外，除了那些自私自利發國難財者以外，各級民衆，都是一致擁護抗戰的。雖則程度上有些不同，但基本上說，極大部份的人民都在爲民族的解放大業而流着血，流着汗！因此，戰時經濟政策，必須照顧到各級民衆的利益。最後一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是一個中小生產佔優勢的國家。小規模的商晶生產，佔着極大的比重。農村的生產與手工業作坊固然如此；就是新式工業亦何嘗不然？因此，在處理戰時經濟的時候，必須採取因勢利導的態度。

依據這三個根據，戰時經濟政策的任務是很明白的。第一、針對着敵人的殖民化中國的毒計，我們必須使用一切方法去粉碎它的「以戰養戰」的計劃，必須實行經濟的反封鎖以對付它的封鎖。第二、民族解放戰爭的根據是自力更生（外援當然要爭取），要自力更生，就必須動員和增加全民族的一切力量，保護生產，發展生產。第三、爲了發展生產，必須看清中國的國情，必須採取一些適合於中國國情的辦法，使無數的中小生產，使新式的民族資本都能發揮其積極作用。盲目抄襲工業高度化的國家的方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第四、爲了全民族的解放，大家必然要忍受一時的局部的犧牲，但在不妨礙戰爭全局的原則下，應盡量減輕一般民衆的負擔，加重發國難財者的負擔，使人力物力財力的動員，能够順利地進行。第五、抗戰建國是聯系的，戰時經濟政策，必須作長期打算，培養經濟財政的泉源，使戰時經濟成爲戰後發展的基礎。

爲敘述的方便起見，作者擬從對敵經濟作戰，經濟管制與財政政策三方面，去把握戰時中國經濟政策的全貌。

(一) 對敵經濟作戰的策略

對敵經濟作戰的重點有二：其一是貨幣戰；其一是物資戰。

我方貨幣戰的策略，是跟着敵人的進攻而逐漸形成的。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政府所實施的外匯審核辦法和同年四月間的出口結匯辦法，都是針對敵人以法幣兌換外匯的陰謀而來的。請核制的本身，還有一些漏洞。據當時英文金融商業雜誌所載，日商銀行亦公開分配到我中央銀行核准的外匯；同時，法幣法定匯率表面上雖維繫不墮，但核准的數額，遠不敷進口貿易的需要，於是匯市暗盤發生了，匯率步步下跌了。而敵人在這個時候，又極力在貶抑中國北方各省法幣的價值到爲「聯鈔」六成之下，並在中國中部，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政府在這個時期所採取的對策是設法穩定公開匯市。計在二十八年三月間英國借款五百萬鎊，成立外匯平衡基金一千萬鎊（其中五百萬鎊是由中交兩行所出的）。三十年四月復與英美兩國先後成立中美中英平準基金協定。（加上我國提出的二千萬美金與上次中英平準基金餘款，共約美金一億元），更設立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支持公開匯率。這一政策，一直維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才告一段落。

着眼在外匯上的貨幣戰爭，現在已是事過境遷了。但這一戰爭的經驗教訓，是不可不深加記取的。維持匯市的好處，只是博得英美商人「匯市堅定」的喝彩而已。缺點呢？那是多得很的。它便利於敵人之套取我外匯基金；它便利於豪富巨賈之逃避資金與從事投機；它支持了孤島的繁

榮而加重了我國財政經濟上的負擔。

敵我的貨幣戰，不但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劇鬥，而且在淪陷區中進行着鬥爭。爲了配合外匯上的統制，政府會禁止法幣向淪陷區的流出。目的是在避免敵人之攫取法幣奪取外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局面改變了，政府已經修正這個辦法，鼓勵人民攜帶法幣至淪陷區搶購物資。這種辦法，是適當的。它給敵人的傾瀉法幣入大後方的毒計以打擊。

在物資戰爭上，從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秋，我方的戰略是禁運資敵，是查禁敵貨。「查禁敵貨條例」規定凡是敵國及其控制區域，有敵人資本，供敵人利用的工廠出品，一律查禁。這是一種絕對的，無差別的抵制敵貨的辦法。但事實上，走私的敵貨，仍源源竄入大後方的每一角落。二十九年八月，政府以後方物資漸感缺乏，乃規定鋼、鐵、化學、顏料、電工器材、教育文化必需品等十六類貨物，可以入口。此爲對敵經濟作戰轉變的初步。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爭取物資更成爲對敵經濟戰的主要策略了。關於進口貨物，乃重新調整。凡必需品及日用品，不問來自何國或國內何地，均一律准予進口。這是針對敵人盜取物資所應有的措置。

對敵經濟戰爭，在敵後抗日地區中，是更爲殘酷的。敵人利用漢奸，使偽鈔竄入敵後抗日地區。但在政府與人民努力之下，偽鈔被打退了。打退偽鈔的辦法，是破壞貶價的。從抗日地區的市中心，逐漸破壞貶價。一直推到敵區，拋出偽鈔搶回物資。敵後這種搶奪物資的戰爭，是早在一

九三九年初就開始了的。搶奪物資是一件艱苦的組織工作。淪陷區中飄揚着抗戰的國旗的地區的軍民針對敵人的行動，有計劃的將市集遠離敵人的據點；有計劃的組織運銷合作社，輸入於我有用的物品，輸出於敵無用的物品。在適當的時候，給與敵人的經濟據點以致命的打擊。敵人對各

根據地進行「三光政策」之後，這些地方的經濟更爲困難了。但是，抗日地區人民的建設，未嘗有一刻在休息。只要敵人的掃蕩被粉碎，各種建設便在破壞後的廢墟上恢復起來了。消滅熟荒，開辟荒地，修理溝渠的工作是不斷在進行着。晉冀察，晉西北和晉東南的人民，在這些方面，是提供了不少的成績的。談到對敵經濟作戰，我們是不能無視他們的努力呀！

敵人的經濟攻勢，是越來越刻毒的。我們應當針對着這種毒計，澈底的加以粉碎。過去幾年我方的策略，有許多地方是值得警惕的。在貨幣戰方面，最大的弱點是在於未能把握獨立自主的原則，竟爲了外商在華利益與少數豪官的逃遷資金與投機，把辛苦借得的外匯基金，消耗在上海金融市場上，送給敵人，送給奸商。在物資戰方面，則失之於不能握取主動。可以輸入的物品竟有一個時期不許其輸入；而應該禁絕其輸出的東西（如鴉片、棉花與蠶絲等），則直到今天，仍然未能根絕偽漢奸之走私。這些弱點，是萬萬不能看落的。我們贊同政府當前這種對淪陷區拋出法幣搶購物資的政策，但認爲必須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這一工作。這就是說必須依靠民衆；必須給與向淪陷區搶運物資的商人以種種便利；必須切實禁止大後方物資的倒流。在這裡，清除運輸機構的積弊，嚴正各戰區軍兵的軍風紀，是十分必要的。

（三）管制政策

我國的戰時經濟政策，是以管制爲核心的。這種政策並非一下子就形成。二十六年十月軍事委員會頒佈戰時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就是管制的開始。（二十七年）經濟部成立之後，這一工作才系統的進行起來。截至三十一年底，政府的管制，已經伸入銀行、物資、運輸、糧食、物價各

方面了。茲將各方面管制的特點，扼要述之於下：

第一、銀行管制——政府對於銀行的管制，到了二十九年八月才開始。管制的內容，規定政府所頒佈的「非常時期管理銀行暫行辦法」。它的要點有三：（一）集中各銀行普通存款準備金。該法第三條規定「銀行經收存款，除儲蓄銀行應依照儲蓄銀行辦理外，其普通存款，應以所收存款總額百分之二十為準備金，轉存當地中交農任何一行」。（二）業務方面，規定「銀行運用存款以投資生產事業暨產銷押匯，增加物資供應及遵行政府戰時金融政策為原則」（第四條）其承做抵押放款，應以經營本業之商人並加入各該同業公會者為限，押款已屆滿期請求展期者，並應考查其貨物性質，如係民生日用必需品，應即限令押款人贖取出售，不得展期，其非日用重要物品押款之展期，以一次為限」（第五條）。（三）禁止銀行兼營商業，該法第七條規定：「銀行不得直接經營商業或囤積貨物，並不得以代理部貿易部或信託部等名義，自行經營，或代客買賣貨物」。此法公佈之後，財經兩部會同四聯總處，先後派員至渝、蓉、筑、桂各大都市，檢查各銀行帳冊倉庫。至三十年十二月，政府又將原辦法加以補充修正——限制新銀行的設立；對於貨物押款商人，明定以加入各該同業公會者為限，並規定押款期數與每戶押款數目；禁止銀行服務人員之利用行款經營商業。對於國家銀行，三十一年下期實行四行專業化，取消中交農三行的發行權；對於川籍行莊，則自三十二年元旦起，實行廢除比期制度。

從銀行管制的規定看來，「收縮通貨」，禁止囤積與協助後方生產，應該是它的任務。但事實上，銀行的商業化並未停止；通貨的收縮尚未發生效果。前一病態之存在，是由於生產事業沒有保障，產業利潤遠在囤積利潤之下；後一病態之存在，是由於通貨政策尚未能走上收縮之路。

總額百分之二十的存款準備金之集中，能全部做到，但對於整個流通界，仍是沒有極大的影響的。至於執行上之急待改善，那更是不待言的了。

第二物資管制——根據二十七年十一月修正公佈的「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軍需民用的四十六種物資，都被管制了。這些物品中還可分為二大類：一為內地物資管制；二為出口物資管制，關於第一類，被管理的物品，計有鋼、鐵、水泥、焦煤、棉紗、布疋等。管理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分配管理，這就是依照生產成本，酌加利潤，使被管理的物資，其價格不致長得太快。在立意上，這是不錯的。但因種種關係，在生產品之產銷上，發生脫節的現象；而黑市的市價，則高高地壓倒了官價。這是不能不令人深加考慮的。屬於第二類者，計有錫、鎊、錫、汞諸種。這些礦產品，爲了易貨及償還友邦信用借款之用。管理的內容是收購運銷。這一工作的優點是提高品質統一出口，而其缺點，則在於收購之際，價格規定得低，生產者較少獲得利益，因而形成生產沉滯之象。

第三運輸統制——在二十九年以前，管理運輸的機關有交通部、後方勤務部、軍政部、運輸司令部、西南運輸處等五機關。這些機關雖組織有「公路運輸調整會議」，但還是分權管制的。到了二十九年，政府成立運輸統制局，負統籌支配之責。該局直隸軍事委員會，劃運輸司令部，西南運輸處及交通部所屬各運輸機關歸其指揮。至三十年夏季，爲調整公路運輸組織起見，所有交通部所屬公路運輸機關，復一併改隸運輸統制局。到了三十一年國民黨十中全會之後，政府又取消運輸統制局，除運輸檢查工作仍由軍委會執行外，原屬該局之工務總管理處，運輸總處，汽車牌照管理所及配件委員會等業務，皆由交通部接收了。

交通部接收運輸統制工作後的成績，現在尚不可得而知，但運輸統制局時期的經驗，是必須注意的。(一)偏重工具的統制，忽略了物資的統制。運輸局「對於物資，僅有軍用品與非軍用品之分，然而非軍用品的貨物種類，何止千萬；何者應禁止，何者為後方最感缺乏而亟須優先內運，皆未顧及。且商人可以直接僱車，致產生了運價的黑市」(金融知識第一卷第一期)。(二)「因為貨物的種類沒限制，故軍用品雖沒有延誤，然民生日用品和生產原料却運不進來，相反的，高價的奢侈品却源源內運」(同上)。(三)「各地統制的辦法，尙未一致，甲地通過的貨物或工具，也許乙地認為不合，而予以扣留或限制，且檢查的手續也不統一，使商人視運輸為畏途」(同上)。(四)運輸機關中存在着職權不清，人事掣肘，辦事延緩的現象，致令無數可寶貴的車輛、油料、材料、及工具，任其廢棄浪費或被盜竊，而不為抗戰運輸之用。這是使人萬分惋惜的！

第四糧食管制——從二十七年軍事委員會公佈「各戰區糧食管理辦法大綱」至三十年六月止，糧食管制的主管機關與職權雖幾經擴大，但中心工作是着重於征購，依靠征購來供應軍糧民食。三十年六月糧食部成立，全國實行征實征購。征購辦法，為發行糧食庫券。三十年所發行之糧食庫券，分五年平均償還，每年以五分之一抵繳田賦應征實物。征實數額，「在民國三十年度內，共征谷麥及什糧二千二百餘萬市石，折收法幣二十一億元」。在征實征購的辦法之下，政府有把握的解決了軍糧與公糧的供應。但民食方面，還以督導商人之運銷為主。

在糧食管制上，還有若干問題值得我們考慮的。在征購方面，起購點似乎低了一點；庫券與現金的比例，顯然不利於小糧戶；而納糧手續之麻煩與微妙，更是納糧者感到頭痛的。在供應方

而，目前只限於幾個大城市，民食問題還是未得到合理解決的。在這裡，我們以為征購方面，必須廢除這些缺點；在供應方面，必須注意到民食問題——不但解決了幾個大城市的糧食，而且時注意到中小城市的糧食。

第五物價管制——對於物價問題的處理，二十八年初至是年年底，政府所採用的政策是平價；從二十九年春至三十一年年底，政府所採用的政策是平價。平價與平價都不能減輕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蔣委員長乃手訂「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經過第三屆國民參政會與國民黨十中全會通過之後，於十二月十七日宣佈實施限價辦法，規定：糧、鹽、食油、棉花、棉紗、布疋、燃料、紙張等物及運費，工資，應以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各該市場之原有價格為標準，自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起，一律實行限價，務須做到同一地區，同一時期，同一物品，只有一個價格。

限價較諸平價，是進了一步的。平價是以經濟的力量去平定物價，而限價則是用政治的力量去平穩物價的。作為治標的方法看來，這不能不算進步。但要使限價能切切實實的發生效力，必須給與它以堅實的前提。前提是什麼呢？作者認為：第一是增加生產；第二是穩定幣值。沒有前一個條件，限價恐怕要落空；沒有後一個條件則限價將成爲「揚湯止沸」的笑話，除此之外，對於生產者的成本，是必須顧慮的；對於國戶的囤積居奇，是必需切實禁止的。如果，我們能從全面去把握這個問題，能把握這個問題的重要前提，那末，限價是可以獲得其應有的效果的。

這就是戰時經濟管制的各方面。在這裡，我們看見了某些成就，同時，亦面對着一些缺點。爲了抗戰的利益，爲了民族國家的前途，作者認爲進行管制，必須認清下列幾個條件：

(一) 談經濟管制者，多以德日或英美的措施爲根據，這是忽視今天中國的現實的。在戰爭

的性質上，我們絕不能與德日混為一談，因而在經濟政策的本質上，我們是不能模倣德日的。就以英美來說，它們是高度集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那種情形之下，進行經濟統制是比較容易的，只要把幾個操縱國民生計的托辣斯，管制一下就行。中國今天的情形則完全不同。手工業作坊固然薄弱到不堪言狀，分散到不堪言狀，就是一些新式的工礦企業，亦是薄弱得可憐，分散得可憐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急切的任務是在扶植他們，發展他們；是在擴大他們的生產規模，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在積極領導資助，而不在過份限制干涉。

(二)有人以為戰爭時期非進行嚴格管制不可，非使政府握有大量的物資不可。殊不知我們今天的抗戰，是爲了全民族的解放的。只要切切實實發動民衆，組織民衆；只要實實在在提高民衆的抗戰情緒，提高民衆的生產情緒，那末，工農各業的生產量一定會不斷提高的。生產量如果真能提高，那還不是抗戰之利，民族之利嗎？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這些物資都不握在政府手裡，積極的意義那是很顯然的。因此，今天緊要的事情，是在於如何提高民衆的生產情緒，而不在於物資是掌握在誰手裡。

(三)提高民衆生產情緒的主要工作是改善生產者的生產條件，盡可能減低他們的負擔，特別是改善佃租關係。前者應執行二五減租的規定與取締高利貸，但保證農民交租交息，後者是保持工人實質工資不至低落，但保證工人遵守勞動紀律，只有調和雙方利益生產才可大量發展。

(四)作者並非主張無條件自由放任的。在擴張生產上必須衡量緩急，比較輕重；在金融管理上必須切實使行莊的資金大量投於生產事業之中；在入口貿易上必須鼓勵民生必需品禁止奢侈品；在出口貿易上必須根絕敵僞漢奸盜取物資的走私，很誠實的與盟友進行易貨。這就是說，

些部門是應該施以更加嚴格的管理，有些部門則政府只能發揮領導資助的作用。而部門與部門之間，尤貴能互相照應。如果表面上倡導提高生產，而在稅制上，管理上，運輸交通上，却給與生產者以種種的困難；如果口頭上倡導提高生產，而銀行則在緊縮信用的口頭之下，給與廠家以閉門羹，那不是「提高生產」的諷刺嗎？

(五) 欲進行管制，必須有靈活而嚴謹的機構，必須有勇於負責認真辦事的人員。因為在管制制度之下，主管機關如果有一點宕擱拖延，則無數的生產單位必陷於無可補償的停頓；工作人員如果有一點不公正之處，則被統制的各方面必定遭受莫可言狀的損失了。此外，機關林立，職權不清，人事牽制與法令繁複，亦是進行管制的絕大障礙。這不是理論的推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實之教訓。

(四) 通貨稅制與專賣

一般說來，戰時財政的籌劃，不外是借債、增稅、發鈔、捐獻與徵發。這些方法，我們皆已行過，但他們並不是平均的。

借債可分為內債與外債，在抗戰五年中，我們前後所發行的內債，計有十七種。「民國二十六年度發行的，有救國公債，京贛鐵路公債，關濟廣東省港河工程美金公債，整理廣東金融公債四種；二十七年發行的計有二十七年國防公債，二十七年金公債，二十七年賑濟公債三種；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及三十年，則各年度均發行軍需公債與建設公債二種，此外，三十年度並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公債一億萬元等三種」。這十七種內債的總額約共一百萬萬元。外債方面，則有英美蘇

的借款二十四次，計中英借款十二次；中美借款八次；中蘇易貨借款四次。

稅制方面，可分為整理舊稅與推行新稅兩項。整理舊稅計有下列各端：（一）關稅方面的設施為調整進出口稅；擴大轉口稅，增加從價課稅範圍。（二）鹽稅方面，自三十年九月起，改定鹽稅稅制，規定產銷兩稅不得併征；（三）擴大統稅徵課範圍，改為從價征稅。新稅方面，則有：創辦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舉辦遺產稅，創辦戰時消費稅與擴充所得稅統稅等征收範圍等項。根據孔部長在其「抗戰以來的財政」一書中的估計，戰時稅收的總額約達二十萬萬元左右。

除了整頓稅收以外，政府又於三十年決定實行專賣。專賣制度的提案是在國民黨八中全會中通過的，財政部即根據決議，決定就食鹽，捲烟，火柴，茶葉，糖，酒等六類，改辦專賣。糖烟等項之專賣，已先後實行，其餘各項，亦將次第實施。當局估計如六種專賣品完全實施之後，收益可達十七億元。

從財政的意義來說，整理舊稅與舉辦新稅的收入，大約將達二十萬萬元；如果再將田賦改徵實物的三十餘萬萬元及專賣十七萬萬元總合起來，政府每年（指最近而言）的收入，可能達到五十餘萬萬元。在浩大的支出之下，這一筆收入顯然是不夠的。因此，借債的作用是很大的。不過，友邦借款，主要是易貨，或以信用借款的方式，輸出商品。故外債的大部份是物資輸入（在太平洋戰爭以前）這些物資都是有莫大的意義的，但國內的餉精等等，還不能在這裡設法，而且有一部份外債是用之於支持外匯的，因此，外債之借得，還不能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內債呢？五年所募得的總額，只有一百萬萬元，顯然亦是不能補足開支之不夠的。

在發鈔方面，抗戰初起時，財政當局聲明我國決不走通貨膨脹之路，但因支出的浩大與收

入之不能全部應付，故通貨之發行亦就不能不增加起來。這不但指直接發鈔而言，就是以內債之發行方式來說，亦是具有這種性質的。計戰時內債除了二十六年的救國公債與二十九年的建設公債軍需公債直接向民間購募外，大部份由銀行承購。銀行承購的公債如果無適當的消化，則其所吸收的公債愈巨，其所發出的法幣亦愈巨。這樣，社會便要吃飽通貨了。

增發通貨是戰時財政不能避免的途徑。問題是在於能否控制其用途，能否使其源源回籠。如果能引導增發的通貨入於生產；如果能舉辦財產稅或強迫公債，使一些發國難財而擁資億萬的豪富，能捐獻其一部份財產給國家，那末，通貨膨脹的弊端是可以避免的。可惜增發的通貨，未能回籠；而這些不回籠的通貨又不能走進生產的大門。這樣，便無法使物價不受刺激而上漲了。物價繼續上漲，又引起某些人——特別是那些具有特殊條件的人們之囤積居奇。囤積得越兇，物價就漲得越快，就增加了政府與人民之支出。於是，一方面不斷在增加發行，而另一方面，却又處處在感覺到籌碼之不够；一方面感覺生產不足，應當增加生產，而另一方面滾滾的游資巨流，却不斷在加強囤積居奇的力量，以窒息生產了。當前財政經濟中的矛盾，就是這樣展開出去的。

面對着這種情勢，我們認為戰時財政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的原則上。這就是說，整理稅收的工作，應該更努力的進行，特別是要用極大的力量在舉辦直接稅上，而直接稅的重心，應該是舉辦財產稅，其次是舉行強迫公債，攤派公債於那些發國難財的人。如果這樣辦，就可解決了國家極大部份的開支，就可為穩定幣值奠下堅實的條件。在通貨方面，當前（抗戰五年後的今天）的任務是穩定幣值。穩定幣值的方法，一面是盡量減少它的發行額；一面是盡量

使法幣回籠。要做到前一點，必須減少開支，而減少開支是以裁減法幣，必須以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爲中心。這是我們剛剛說過的。對於一般論，眼光必須放遠一點，只有把鷄養大，才有蛋吃；殺鷄吃蛋，是收時，必須注意到培養稅源；必須注意到租稅之轉嫁。這就是說，到另一方面，必須減輕工礦業的負擔，減輕中農小農的負擔。

至於政府的獨占事業，要以民力所不及者爲限。中國的國情與高度的。如果不把握事實而抄襲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在財政的收入並不的觀點看來，從其對於物價的影響看來，顯然是得不償失的。爲了財政的收入在商品上加一筆消費稅，（這當然是轉嫁到人民身上！）反可省設一批機關，是值得注意的。

總而言之，我們的財政政策，必須執行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原則；必須致公穩妥法幣幣值。爲了這一點，把工商同樣看待的稅則必須修正；不能把握重點的公債募法，必須改革；避重就輕的作風和逃稅的毛病，必須根絕；駢枝的機關與無用冗員，必須裁撤；一切貪污和浪費的現象，必須嚴格懲辦，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收入，緊縮開支，才能負起戰時財政所應負的任務，才能爲反攻奠定堅固的財政基礎。



是不相同
社會政策

士主張
○這

第五章 各種經濟力量的變動

變動的因素是什麼？

要了解戰時中國經濟，除了從時間，從區域，從敵我的經濟戰去進行研究以外，還要從國民經濟的各個構成部份去下手分析。因為，只有分析了國民經濟的各個構成部份，分析了各種社會經濟的力量長的消長以後，才能對戰時中國經濟的動態，獲得較為深切的了解。在這裡，作者把列強在華經濟力量，土地所有權，商業資本，銀行錢莊與民族產業五項，提出來作為研究的對象。爲什麼要提出這五項來呢？理由是：

(一) 近百年來，中國因外國資本之侵略而淪爲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列強在華的勢力的消長，對於中國的國民經濟，在貿易上，在財政金融上，在產業投資上，無一不會給與以深刻的烙印。抗戰六年了，日寇的蹂躪與搶劫，英美在淪陷區的遭受打擊與不平等條約之廢除——這些事件的影響，是不能不深加考察的。

(二) 土地所有權在戰時有着激烈的變動。而這種變動，包含了地租，租佃關係，農村金融與農村階層分化等問題。要明白戰時農村經濟有什麼反響，呈現什麼景色，我以為土地所有權的研究是一個關鍵。

(三) 商業資本在戰時是一個最活躍的部門，它除了原來經商的商人以外，還有一些以前未



營經商的人物。各方所側目，所注意的游資問題，就是採取商業資本的形態的。要知道游資是什麼東西，就必須抓着商業資本來解剖。

(四) 銀行與錢莊是中國的金融機構，這種機構在戰時，扮演着很注目的角色。游資是採取商業資本的形態，而銀行錢莊則為游資的吐納湖。物價之上漲，囤積居奇之可怕，我們歸咎游資，但不能不牽連到銀行與錢莊。至於抗戰初期之資金逃避與外匯投機，更不必說了。

(五) 民族產業是使人最關心的部門。因為落後的中國，民族產業自然被人視為珍寶。抗戰初期之被敵寇摧毀與我們的遷廠建廠的努力，最近幾年來廠家與職工在後方的奮鬥，都是使人關懷不已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後方物資的困難日增，於是各方人士對於民族產業的屬望亦愈切，但它的處境是很困難的。爲了準備反攻，我們應該注意它的發展，應該研究它所遭遇的困難。

這就是作者爲什麼要提出這五個課題的原因，換句話說，只有從這五方面去分析，才能看出戰時中國經濟的輪廓，亦可藉此看出中國經濟的性質發生了什麼變動？

那末，什麼因素使中國經濟在戰時起了巨大的變化呢？對於這個問題，後面各項將會觸到，但爲讀者明白起見，作者擬在此先把它們提出來。

使中國經濟在戰時發生巨大變化的，第一個因素是日本強盜的軍事侵略。日本強盜的軍事侵略與砲火的摧殘，沿海沿江的經濟據點陷落了，民族資本的廠礦被掠奪了，對外貿易被切斷了，英美在華的經濟力量被打擊了，淪陷區中的廣大農村被洗劫了。敵寇的侵略與掠奪，是引起中國經濟變化的基本因素，其次，是敵我經濟戰的策略。經濟戰是戰爭的一個方面，經濟戰策略會影響

了戰時經濟，如敵寇的封鎖，走私，套取外匯，咀吸物資等毒計，都會使戰時經濟起着變化；而我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如生產管制，物價管制，運輸管制與金融管制及租稅政策等，亦起了極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讀者可在本書第四章看見，再其次，物價問題是戰時經濟問題的焦點，無論生產，運輸，金融，財政與商業等等，皆在這裡發生反映。而物價的波動，但反過來影響生產，金融，財政，運輸與商業，而且引起財富的重分配。年來地主資力的雄厚，由於他們握有糧食；銀行與商家資力的擴大亦是由於他們握有日用品或農產品，而民族產業則因物價之上漲而感停滯，一般人民的生活，亦因為收入遠落在物價之後而困苦。『物價變動得愈利害，則財富重分配的嚴重性愈大，因為在物價變動中，有些物品價格上漲較快，有些物品價格上漲較緩，彼此間相差極大，同時，一部份人之貨幣所得在數額上缺乏彈性，另一部份人之貨幣所得的彈性甚大，故使人民之真正所得發生一種對比的變動，有的獲得意外橫財，有的則蒙受損失』，（三十二年四月廿五日國民公報「經濟動員」）。戰時經濟各部門間力量的消長，各社會階層間經濟生活的變化，與物價的上漲，是有極密切關係的。

引起戰時經濟變化的因素當然不只這三點，但，作者認為這三點是極其重要的。

二 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

（一）戰前的陣容

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法則支配之下，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時期，都是呈

現着起伏軒輊的狀況的。一般說來，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佔着絕對優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強盜乘列強無暇東顧，對於中國的掠奪與榨取，拚命地幹起來。它的在華的投資，飛快地增長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資本在華的發展，亦非常迅速。因爲日美兩國的追躡，英國也就沒法保持那種絕對優勢的地位了。據雷納氏的統計，列強在華投資的消長（截至一九三一年），其趨勢如下（單位百萬美元）：

國別	一九〇二	一九一四	一九三一
英國	二六〇・三	三三三・〇	六〇七・六
日本	一・〇	〇・一	二一九・六
美國	一九・七	一一・五	四九・三

根據雷納的統計，一九三一年日寇在華投資，將與英國分庭抗禮了。一九三一年以後，日寇在華投資更加躍進。截至「七七」事變之前一年，日寇在東北的投資，增加十一萬二千餘萬元；英美法等國原在東北七萬萬日元的投資，都在這個時候陸續撤回了。白山黑水間的經濟命脈就完全被敵寇獨占。其在關內，敵資的勢力，亦大大增強。據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天津益世報的估計，日寇在這個時期的新投資，在中國北部共達七萬三千三百萬元；在南部共達三萬九千三百萬元。總計起來，從一九三一年至「七七」事變以前一年間，日寇在關內新增投資爲二十二萬二千六百萬元。把這個數目與雷納氏的統計數字合在一起，那末，日寇在華投資的總數，是超過英國的。「七七」事變前夜，英國在華投資額，據英國海軍大將O. V. Ushorne的估計，只有二萬四千

四百萬鎊，而「財政與商業」雜誌則估計爲三萬萬鎊，如折中作二萬萬六千萬鎊計，約值美金十三萬萬元，比一九三一年只多一萬一千餘萬元而已。）但日寇對華投資，有一半左右是投放於東北的。故以中國本部而言，還是英國佔優勢。美國遠東經濟調查團的報告，亦證明了這一點。這個報告謂一九三五年列強在中國本部投資，英國十萬萬美元；日寇五萬萬美元；美國二萬萬美元，（實際上不止此數，在雷納統計之後，美對華投資，僅就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航空公司三千萬美元，公路建設借款一千五百萬美元，航空製造廠借款四百萬美元四項而言，差不多增加一萬萬美元。與雷納的數字合計美對華借款達二萬萬九千餘萬美元。）這些數字，雖不能說完全與事實吻合，但戰前列強投資的陣容，是可從此得到一個梗概的。

自「七七」事變以來，日寇的侵略不但摧毀了東南沿海中國的民族資本與經濟據點，而且亦推翻了英國資本在中國本部佔優勢的局面；使美國的投资沒法在淪陷區中存在。不過，敵寇對於英美資本的打擊，並不是一下子的。如果從過程來說，太平洋戰爭以前與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可以劃分成爲一個時期。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對於英美在淪陷區的利益，是採取迫脅的態度。有時在面子上亦盡敷衍的能事。如二十九年十二月中旬，敵寇爲爭取美日商約之重續，表示開放長江口至南京一段，准第三國商輪行駛，就是例證。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敵寇與英美就站在敵對的地位。它所採取的，再不是威脅，更不是敷衍，而是公開的佔取與沒收了。這與前一個時期，是截然不同的。

(二) 敵排英美在華權益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除了利用軍事優勢加強投資額以壓倒英美之外，還以最卑劣最無恥的手段排斥英美在華的權益。其方式如下：

第一是利用砲火摧毀英美的企業。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敵寇雖未與英美公開敵對，但在他的侵略進程中，中國的產業固然遭到摧殘，英美在華的產業亦何嘗能避免這種打擊。以上海為例，在戰爭的三個月中，英商的紗廠、煙草公司等，美商的建築公司，火柴公司與麻線廠等，都受到日寇砲火的損害，有些工廠的廠屋完全燬壞了；有些公司存放於倉庫（滬東一帶）的貨物完全被敵人搶去了。這是日寇尚未與英美敵對時所幹的勾當，這是日寇侵略砲火所送給英美的禮物。

第二是通過偽組織，增加外商貨物捐稅（中國廠家的出品自然不會省去這種勒索），禁止輪船運載外貨，向外廠借款不遂則以禁止其產品在佔領區販賣為要挾。上海英商顧中煙草公司的停工，就是一個例子。更進一步的做法，則為脅迫外商廠礦，交歸敵偽經營。河南焦作的煤礦就是敵偽從英商手中奪去的。開採煤礦呢？這個時期雖保持存在，但業務是受着敵人支配的。它的煤產成爲「日本製鐵會社」與「日本鋼管會社」的獨占物。

第三是利用種種藉口直接侵佔。如上海英商中國紡織染色公司在二十九年秋季購得蘇州河邊的振泰紗廠，戰事西移後，敵寇據爲己有，竟令豐田紗廠接辦。這種做法證明敵人是何等卑劣，何等無恥！

第四是亂肆轟炸。在敵機的慘炸之下，不但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屠殺與摧燬，就是英美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亦遭殃了。從許格森大使的被炸傷與英艦女鳥號美艦巴納號的被炸沉起，英美僑民挨炸了多少次，損失了多少東西，現在雖未有完整的統計，但我們可以相信，數量一定不少。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美在華的投資，不但因為敵資的增加而呈遜色，並且因為敵寇的掠奪而急形衰落。英國在華的投資是集中於鐵路航運、開礦與紡織業的。在「七七」事變以後，英國所投資的這些部門，無一不受敵人的摧殘。以鐵路來說，英國對華的鐵路借款，計有北寧、京滬、滬杭甬、廣九、淞滬、平漢、津浦、道清等路。這些鐵路幾乎完全給敵寇佔去了。以礦業來說，英國的幾個據點，如上面所說的焦作開灤等等，不是被日寇設法搶去，就是設法支配。以紡織來說吧，上海幾家英商紗廠，都挨過了日寇砲火的摧燬。英商紗錠在數量上其比重之更加降低，是無足怪的了。美國對華的事業投資，輸出入貿易與「公益文化事業」最佔主要，但是，貿易事業因日寇之封鎖沿海與內河而衰落了，文化公益事業亦因日寇之轟炸而大受打擊了。

綜合各方的估計，因為日寇之摧毀，英國在華二萬六千萬鎊的投資，這個時期恐怕損失一萬萬二千萬鎊以上，佔其投資額百分之四十四，美國二萬九千萬美元的投資，這個時期要損失一萬萬美元以上，佔其投資額百分之三十五。

在這一時期期中，敵寇除了在投資上給與英美以打擊之外，在貿易與金融各方面，亦無一不使英美蒙受損失。在淪陷區內，敵人以種種辦法限制並破壞英美列強對華的貿易。它除了大規模的武裝走私以外，又公開的擅改淪陷區海關的稅則，使其便利日貨的推銷；施行種種統制，阻礙

英美對華貿易的擴大。據海關年刊，二十六年敵對華進口祇有一萬五千餘萬元，佔入口總量百分之十五強，到二十九年竟增至四萬四千六百餘萬元，佔入口總量百分之廿三左右。英國在二十六年對華的進口爲一萬八千八百餘萬元，佔入口總量百分之二十左右，爲是年進口之首位。二十九年雖增至四萬三千五百餘萬元，百分比增至二十一強，但已居日寇之下風了。英國的情況，更是衰落。二十六年英對華入口，猶有一萬一千一百餘萬元，佔百分之十一強，至二十九年跌至八千餘萬元，百分比降至三·九了，在這一年，敵對華入口比美國多了一千一百餘萬元，比英國多了三萬六千餘萬元。金融方面，敵人除了大量發行軍用票之外，又設立多數偽銀行，大量發行偽鈔。在中國北部從二十八年三月起，敵僞便開始管理外匯；正金銀行就在這個時候，從匯豐銀行手裡奪去支配外匯的權力了；至於正金之搜得關稅存款保管權，則早已是廿七年五月間之事。在中國中部，敵寇對於金融的支配力量雖沒有在北部那麼大，但是它對英美的壓力是與日俱進的。它強迫當地商人把出口貨所得外匯，賣給敵寇的金融機關，藉此以削弱英美銀行的勢力。

這就是敵寇在淪陷區排斥英美的經濟力量的大概。在這個時期，儘管日寇的手段多麼毒辣，但在表面上，總不能不承認英美的經濟權益之存在。特別在上海，當它仍保持其孤島地位的時候，英美在那兒的金融與工商業的力量，仍爲日寇的障礙物。可是，這種局面是不能持久的。一九四一年的冬天，小六號風球掛起來了。侵略的日寇又在太平洋上捲起海嘯來！上海公共租界被佔領了；香港不久亦告淪陷。在這種情況之下，敵人對於英美在華權益，不復採取脅迫或敷衍的態度，而是直接了當採用佔領與沒收的辦法了。

(三)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敵寇即進入上海租界，捕同盟國僑民。平津等地亦復如此。從那一天（三十年二月八日）起，淪陷區各城市的英美僑民，都成爲日寇集中營中的俘虜了。對於英美在華的產業銀行與商行，則在「管理」的名義之下，進行實質上的沒收。日寇侵入初期，對於華北的一百餘家工廠，亦曾施行過什麼「軍管理」。它對於英美在華企業的「管理」，就是這種軍管理的延長。上海的英美荷比的銀行，就是處在敵寇的管理之下的。到了三十一年三月廿八日敵寇又宣佈將英美等國在滬七十五家重要企業，置於敵寇委任的日籍監督的管理之下營業。這個監督主管各該企業的財務，各該企業出品之銷售與分配，亦歸其分配。用這種辦法，敵寇使英美在滬的重要企業爲它生產了。

爲了攫取英美銀行的資金，爲了挖空這些銀行的基礎，敵寇在管理之後，又進行清理了。敵陸海軍司令部於三十一年一月七日宣佈在敵管理下的英美荷比十四家銀行，自八日起停業三天，進行清理。清理之後，於一月十二日復業，即辦理「首次提存」。所謂首次提存者，即指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以來，存戶未提足二千元者可以提足；其已提足二千元者則須待「二次提存」時再行續提。提存辦法，英美荷等國存戶每週仍只限五百元，其他各國存戶可以一次提取。計辦理首次提存者十家；辦理二次提存者有七家。在二次提存中，存戶可自首次提存後之存款餘額提去一半，其餘半數存款轉存日籍銀行開戶，惟以後一切往來，仍由原行辦理。在這種清理之下，英美在滬各行完全被挖空了。英美在滬的存戶，存款完全握在敵寇手裡了。到了是年五月廿八日，敵與

亞院又宣佈同盟國其餘的「百家商行」予以清理或管理其營業。敵人對於企業之清理，目的亦不外是更清楚地調查這些企業的財產與物質，以便於敵軍之徵用而已。經過敵寇這種清理，英美在滬及淪陷區各城市的企業，工廠，礦山與銀行，都完全變成敵寇的財產了。

在太平洋戰爭以前，如果因為日寇的摧毀，英國在華的投資，損失了百分之四十四，那末，其餘百分之五十六的投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被日寇用武力強佔去的。因為英國在滬的投資佔它在華投資總量一半以上。上海公共租界內的英國財產都被日寇搶去了。還不是證明這一點麼？如果因為日寇的摧毀，美國在華的投資，在太平洋戰爭以前，損失了百分之三十五，那末，其餘百分之五十六的投資，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被日寇用武力強佔去的。因為美國在滬的投資，佔它在華投資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上海公共租界內的美國財產都被日寇搶去了，還不是證明這一點麼？

日本強盜除了用暴力奪取英美的實際權益之外，並且發動漢奸汪精衛在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江寧條約百年紀念的那一天，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英美在中國的勢力。」像這樣，在敵寇指揮刀所能及的地區，英美的權益都被日寇搶去了，英美在淪陷區的經濟特權與經濟力量，被日寇一筆勾銷了。日本強盜的侵略，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毀壞了最近半個世紀英美日在中國資本戰的局面。

(四) 英美在大後方

在大後方，在敵後抗日地區，日本強盜的特權，它從馬關條約以來所加諸中國人民身上的經

桔，是被取消了的。六個半年頭的艱辛的苦鬥，把國家民族交給血淚交迸的戰爭，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把民族敵人——日本強盜驅出中國領土。不但現在在大後方，在敵後抗日地區，粉碎了敵寇加在我們身上的桎梏，而且在反攻的時候，一定要肅清敵寇在淪陷區的同胞身上的枷鎖。在過程中，雖要遇到種種困難，但我們一定能達到這個目的。如果以當前的情形而論，英美在淪陷區中的經濟力量與特權，是被摧毀了，而日本強盜在大後方與敵後抗日地區的經濟力量與特權，亦是被否定了的。這是一個對照的局面。

英美在大後方——西南西北各省的經濟力量，沒有它們在東南沿海那末雄厚。因此，從全國的範圍來說，從抗戰以前和以後來比較，英美在華的經濟力量是減弱了的。可是，我們並不是說：英美友邦與「自由中國」的經濟關係比以前減弱。事實是在可以證明這一點。從二十六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中英借款十二次，總數共一萬一千八百五十萬英鎊；從二十七年十二月至三十二年一月，中美借款八次，總數共七萬四千七百八十萬美金。這些借款主要是政治性質的。與戰前的投資，性質上並不相同。雖然，貸款的性質與以前不同，但事實上，處處證明中國與英美，特別是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是比以前更為密切了。美國在大後方的經濟力量，是比以前提高了。

民國三十一年國慶前夕，英美通知我國取銷領事裁判權。到了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分別簽訂新約。新約的內容，是廢除辛丑條約所規定的英美在華特權。從這一天起，英美就放棄其在華駐兵權，租界及使館區特權，軍艦自由駛入權，領事裁判權，通商口岸特權，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權，外籍引水權與海關雇用客卿權等。在這裡，關於協定關稅制，因為一九二八年中英關稅新約，已在法律上，承認中國關稅完全自主，所以略而不談。如果將九龍香港的問題置之

不論，那末，中英中美新約的確把中國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從政治上軍事上解除了。不過，經濟方面通商口岸設廠權與採礦權等，尙未提到；而關於財產部分的某些有利於單方的權利，還在法律上給了一些保障。這都是有待於我們的努力，有待於今後的磋商。

中英中美新約在法律上奠定了中國在國際間的平等地位，給我們解決經濟文化問題以合理的基礎。如果大家都能努力於自立與自強，在政治上，力求進步，加緊團結；在軍事上，加強動員，準備反攻；在經濟上扶助民族工業，提高戰時生產，那末，我們就能克服當前的困難，更快的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而且，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上享受新約中所規定的一些利益；才能在利用外資的時候，不致再陷「太阿倒持」的覆轍。

抗戰成功以後，在開發中國富源的時候，我們必須利用外資，必須歡迎外資，但是，過去那種損害中國元氣的徵法，那種喧賓奪主的情形，那種不合於中國國策的外資活動，是不能繼續下去的。這就是說，以後外人的投資，必須以不妨害中國的主權爲前提，外資所經營的範圍，必須受中國政府的監督指導。至於將來利用外資的方式，方向與技術等問題，那是需要我們更精細去考慮的，茲略而不論。

日本強盜的侵略，使列強在華的經濟力量，發生着顯著的變化。它這種明目張胆的行動，分明是欲把中國從半殖民地降爲它的獨占的殖民地的。跟着它的侵略戰爭的擴大，就連英美在華的經濟力量亦被否定了。但是，中國民族的抗戰到底與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發展與勝利，必定會打敗日寇，必定會否定日寇暫時在淪陷區所擴大的經濟力量。這一個否定的否定所產生的新局面，並不是恢復戰前那種列強角逐下的半殖民地的狀況，而是在國際上取得經濟合作與平等地位的斷

中國。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而且亦是必然的趨勢。

三 土地關係

(一) 土地所有權的變動

在前面，我們已經看見戰時的中國暫時可以劃分為淪陷區與「自由中國」。在這種對立的情形之下，土地關係顯示着不同的趨向。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擬從土地所有權、地價與租佃關係三方面去研究。

土地所有權在淪陷區與大後方都有集中的傾向。但集中的方式及其所有者是不相同的。在淪陷區，土地大量集中在日本強盜的手裡，在大後方，土地則集中在有錢人或暴發戶手裡。在淪陷區，日本強盜集中土地的方法是武力侵佔或強迫收買；在大後方，土地的集中是通過谷價與地價上漲的途徑的。

日寇在我淪陷區中，利用特務機關、保甲組織，或設立什麼土地調查委員會，進行土地調查，強迫人民實行「土地陳報」和按戶的土地登記。不論是地主的土地也好，農民的土地也好，日本強盜只要有所需要，就一律實行強佔。強佔的方式很多。有的是用直接武裝的霸佔；有的是利用偽組織的名義強行沒收，並有用租賃低值收買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武力霸佔的方式，主要用之於建築公路網、封鎖溝、飛機場、兵營及倉庫等。拿冀中來說，日寇計劃在冀中一千七百



餘里鐵路和六千七百餘里公路的兩側，挖掘寬一丈二尺至二丈四尺的深溝兩條至四條，沿公路網，每里建一兵房，三里建一小碉堡，十里建一據點；再拿晉冀察來說，從三十年春至三十一年夏，敵據點由八百多增至一千四百六十，在據點周圍與公路鐵路兩旁，建築封鎖溝與封鎖牆，有的多至七層，建築這些稠密的據點，公路網及封鎖溝所需要的大量土地，何嘗不是用武力沒收的？就是一些移民的區域，敵人亦常用這種辦法。在江南，敵人把真茹、大場、吳淞、楊思橋、閔行及龍華一帶農田，武力強佔，分配給日韓的移民種植，把殘存的房屋，拆除或燒燬，建立日本的新村。其次，敵人有計劃的在淪陷區中增植棉花、糧食、鴉片及其他農產品，設立了許多「農業會社」、「實業公司」、「農事試驗場」及「農場」等等，這些「會社」或「農場」所需要的農田，除了霸佔之外，還有通過敵偽政權沒收及賤價收買的辦法。如「中日實業公司」經過偽政權之手，沒收了過去由段祺瑞等出資經營的軍糧城茶提兩個大農場（共三千五百町步；即五萬六千華畝）該公司又設計侵佔以下地區：冀東三十萬町，津浦鐵路沿滄州一帶四萬町，山東省黃河下游八十萬町，其他山西、河南等省約一百萬町，合計二百萬町，即三千四百餘萬華畝。北平的偽「中央農事試驗場」會派員到各地調查，在德縣和唐山等地「收買」了不少民田。這裡所謂收買，不外以數元強買價值數百元的田地而已。這是變相的霸佔。偽新民會在南口設立的農場和各地分場，河北、山東、山西各地的「農事試驗場」，都是隨意霸佔的。

在淪陷區，日本強盜除了瘋狂的燒毀、姦淫、擄掠和苛勅之外，又進行着這種有計劃的土地掠奪，使淪陷區一部份農民與地主，喪失了土地；或不能不離開土地。因此淪陷區中一部份最好的土地，就被日寇所強佔，就集中在日寇手裡。淪陷區的土地問題，已經不光是一個土地所有權

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了。

其在後方各省，土地一天比一天集中在地主與富商的手裡。這種集中，可從兩方面去觀察：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富商握有大量的資金，既不經營正當生產，又不作輸國之舉，除了囤積物資，就只有購買土地；另一方面是因為物價高漲，一般小農生活困難，爲了維持生活，不得不賣土地，至於某些災情嚴重的省區如河南，災民之低價出賣土地而形成之土地集中現象，更不必說了。

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出版的「東南經濟」（三十年四月號），對於土地兼併情形，曾經披露了一部分事實：『擁有大量土地或特產的地主，烽火中的暴發戶，以及一部份不惜利用地痞流氓作走私和囤積居奇的非法買賣國難財的喪心病狂者，他們在國難中對法幣懷疑，他們很聰明的想到購置田地是最穩當的，大家不約而同的紛紛購買田地，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瀰漫了暴發戶爭購田地的氛圍。後方的農村固然不必舉例，凡關心報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縣華容，買田都很起勁，甚至有連經手交易採取佣金的人亦有成爲財主的，由此可以證明地權變動的激增』（該刊五三——五四頁）。在抗戰以前，兼併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及少數軍閥；現在競買土地者多爲一些新人物，這些人們，乃是「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投機份子。大地主的兼併與商業資本的活躍，其結果就是地權的轉移與土地集中。三十二年春，各地實施限價之後，游資之囤積和當受到限制，於是更趨於黃金與土地的投機。衡陽就是一個例子。這就是說，地權的轉移是與游資的活動，有着密切的關係的。

土地所有權的急激轉移是抗戰以來一個顯明的現象。有人以爲「抗戰以來土地所有權無大變

更，僅其使用權略有異動而已」，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不合事實的。土地使用權的轉移，誠然顯著，地權的轉移亦是不能忽視的。上面所說就是證明。至於地權轉動的內容，主要是自耕農，半自耕農之失去土地。據聞化先生的調查，川西溫縣十個自耕農及半自耕農中，一年內有三家土地被高價誘着出賣了；川東南江津縣十六家中，有七家的土地出賣了。（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重慶某報）。我們雖不能用這二個例子去概括其餘，但是地權轉移中包含着無數自耕農或半自耕農失去土地的辛酸的事實，那是可以斷言的。

（二）地價的二個趨向

從全國各地看來，地價是走着二個不同的傾向的。在淪陷區中，地價步步下跌；在「自由中國」的災情嚴重的區域，亦是如此；可是，後方各省的地價，却不斷在上漲着。

淪陷區中地價下跌的原因，甚為複雜。主要的是：淪陷區中社會極度不安，地權沒有保障，敵偽的田賦極為苛重，勞動力減少，荒田增多，在許多地區中竟成了有地無人耕的現象。在靠近城郊比較好的土地，敵偽又常常低價收買或直接強佔沒收。有土地的人多願將土地脫手。土地既成爲大家急求脫手的東西，地價自然下跌了。如河北省定縣敵佔領區的耕地，每畝竟跌至五元。淪陷區的地租是很高的（我們將在下面論及），這種地租高地價低的矛盾現象，是不能以正常的情形律之的。在普通情形之下，地價是地租的資本化，地價與地租的漲落是成爲正比例的。可是在鐵蹄下的敵區，敵人一面加深封建剝削，一面又霸佔土地，所以，地租與地價的關係被拗歪

其在大後方，由於通貨膨脹與游資泛濫的結果，握有資金的人都以土地投機為出路，是於地價便急激上漲了。地價之上漲，表現在都市中的地產，亦表現在農村的田地。以言都市，重慶是地價最貴的地方。『民國十五年那個時候，像都郵街一帶地皮普通每方僅值三十二元，到了今年開闢了廣場，附近地價有漲到一萬二千元一方的。假定以十五年為基年，當年的地價指數作為一百，那末，今年一月間的地價指數應當是三萬七千五百了』（見三十年八月六日益世報）。陝西街一帶的地皮，亦從二十六年每方五百元漲至三十年的一萬元。都市的地產固然是投機家的賭具；農村的田地，現在亦被人們當作投機的對象了。川西某縣地價戰前每畝僅值七十元至一百元，典當價是五十元至七十。三十二年每畝地價竟漲到五千元至九千元，典當每畝地價漲到四千元至六千元，比較戰前漲了八十多倍。

農村耕地地價之上漲，是以糧價之上漲為前提的。因為地價是地租之資本化，糧價貴，地價就必然跟着上騰了。但是，地價的上漲與地權的轉移，在一般的場合，是結合在一起的。投機家看見地價高漲，就拚命的爭買，買得越兇，地價亦就漲得越利害。在這兒，地價的上漲是不能不影響到地租的。因為地價是地租的資本化，在一些投機家的操縱之下，地租之高漲，農村農民之苦於地租之增加，就是因此而來的。

(三) 租佃關係的素描

在敵寇統治下的淪陷區，租佃關係是日趨惡化的。因為敵寇想籠絡那些失去民族天良的地主，充當牠們的工具，故常採用欺騙政策。例如晉西淪陷區中，敵寇曾規定：『地主與佃戶每年租

票仍照二十五年以前辦法清理，不得藉端減少或扣除或遷地不耕事情。苛賦被佔領時，敵人極力維持對半分、四六分和三條腿（主二佃一的分法）等剝削關係；在其他淪陷區中，亦復如此。但是，舊的剝削關係的被維持，並不意味着地主的利益不受侵害，因為敵僞在這個時候，不斷的提高了田賦。例如偏關的田賦，淪陷後比淪陷前，竟增加了百分之三五至五七，同時，地畝捐、契稅、牲畜稅、婚姻稅、區費、警費、房捐、鋪捐、旅行護照及身份證等等的征收，如狂風驟雨一般，向地主和農民襲擊來。地主固然設法把這些負擔轉嫁給農民，但是到了農民被剝削得一無所有的時候，地主就不得不「掏腰包」了。日本強盜的花言巧語，是掩蓋不了它的獍豸面目的。在它的殖民地化中國的政策之下，淪陷區的地主只能食其餒餘而已！

後方各省，在地主富商的投機搶購之下，地價的高漲與地權的轉移，正比例地在發展着。地權轉移之後，又換了新的主人。新主人底下的管事亦換了；管事底下的「地鑽子」亦換了。管事與地鑽子是不會不求自肥的。爲了取得甜頭，亦就乘機調換一批新佃農；還有價租不清，無力負擔重額地租而遭到退佃的。據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國民公報所載，四川在二十六年每百戶佃農中被地主退佃的有十二·一；二十八年有一四·五；三十年增至二一·七。前面已經說過：地權的轉移意味着自耕農與半自耕農之失去土地；在這裡，我們又可以看見：跟着地權轉移而來的土地使用權的變動，是包含着無數佃戶被迫離莊全家老少失去依棲的慘狀！

在換佃這一做法之下，還有更深刻的內容，這是租額和押租的提高。夏文華先生在其「如何保障佃農增進生產」一文中，就有這麼一段分析：

「租額以四川爲例，如水稻區域成都平原等縣，平常年份須納全年總收入十分之五點二」

旱地區域仁壽南充等縣須納十分之四點五以上。押金，成都平原每畝須納六十兩（一兩台一元四角）；旱地區域每畝須納十兩。目前水稻區域普遍增加：租額最高加四分之一，押金增加至一百兩；旱地區域租額最高加三分之一，押金增至二十兩。陝西與隴南，同四川相差

不遠，其餘的分租區域，除押金與負擔略增外，租額並沒加高。西南東南各省，除雲南外，如廣西、浙江、江西等，皆盛行分租制，多數提高一成，如原來主三個七者，今則改爲主四個六；主五個五者，今則改爲主六個四，押金亦隨之提高一成至五成。此外，尙有一苛刻的條件，即佃戶須負擔田賦的半數，廣西天河河池等縣即有此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公报）。

在這種情形之下，佃農的生活就比以前更困難了。困難的地方，不是在於一部較爲富裕的佃農，再不能以歷年辛勤所積的五七百元去典當十畝田來耕種，而是在於地租重，生產成本高，佃農辛苦生產之後，所得不償所失。據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在溫江分析農家記賬結果，每畝水稻的生產費共計二百十二元，副產物可得五十元（三十年的情形），若生產物完全贖予地主，佃農所費生產費用，除去副產物收入略可補償外，每畝淨虧一百六十二元。往年因押金可以扣除租米（七十元扣一畝），佃農食糧勉強維持，目前取消或加重押金和租，佃農便不得不以高價向地主購買口糧了。糧價越貴，佃農的吃虧就越大。

根據上面各點看來，地主在物價——特別是糧價上漲的巨浪中獲利最大。他們提高押金，提高租額，增加佃戶的各種負擔。他們的收入，是遠遠過物價而前進的。據沈宗瀚先生的研究，榮昌上等水田地價，二十八年每畝約一百五十元，全年利息十二元，而每畝純利爲一百六十五元，爲

其成本的六十一倍（見三十年五月二十日大公報）。這是以二十九年每石市價七十元計算的，如果以二十九年以後的市價計算，那就更可駭人了。田賦微實雖然迫使地主提供一部份地租給國家，但為數仍屬微小。地價高漲雖然使地主購入土地時多支出一點貨幣，但這對於他們亦是無害的。有人描寫地主可以在糧價地價高漲中起死回生。他說：「戰前有一百畝田的地主，以五千元或七千元典當給別人，無一點租收，到三十二年的今日，還用不着拿二畝田出賣，就可抵消債務，餘下的九十八畝多田，又可收租了」。這個比方是很確實的。糧價貴也好，地價貴亦好，大家都感到頭痛，地主却在這裡「無往而不通」，却在這裡長得更加肥胖了。他們的收入勝過銀行，勝過囤戶（指一段商品而言）。何況他們有的亦在放高利貸，亦在囤積商品呢？此無怪他們在過着「養尊處優」，「取精用宏」的生活。他們的享受一般是保持戰前的水準，有的甚且比戰前還來得更加舒服呀！

四 商業資本

(一) 中國商業資本的特點

在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商業是服役於工業的。因為工業家並不直接從事於販賣商品給消費者，而是把他的商品賣給中間人——商人再把那些商品賣給消費者。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商人替他們做銷售的工作，那末，工業家底資本就有一部分要採取商品的形態停滯着，於是，他要繼續進行生產，就需要一筆追加資本。由此可見：商人底資本，亦是社會資本循環總過程中的一部

份；但是，牠同產業資本分離開來，專門執行着產業資本原有的職能之一。所謂商業服役於工業，就是指此而言的。

從資本主義的歷史來說，商業資本亦會起着極大的作用，它破壞了從前的自然經濟，推廣了商品生產。縱然那時的商業與強盜搶劫有許多共同點，而且往往與劫掠聯系在一起，但是，它却因此就成爲資本原始積累的主要來源之一。

在中國，商業是充滿着前資本主義的氣氛的。在獨立生產者之間，它誠然發揮着破壞價值法則的作用，誠然年復一年的在摧毀自然經濟，但在原始積累上，作用沒有那末大，（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而自民族產業形成以來，商業資本沒有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在推銷成品上，提供大的幫助與推動。

一百年來，中國商業的特點，是在替外國商品盡着推銷員的義務。外國的商品，進入中國的口岸以後，便通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商店，而流入窮鄉僻壤去；國內各地的農產品與工業原料，亦就經過商人的採集，經過通商口岸而輸到外國去了。龐大的外國商品是價廉物美的，它的成本低，它的競爭能力大。外國商品進口越多，中國的商業資本推銷得越利害，那末，中國的民族產業便要吃更大的虧了。因爲，薄弱的中國工業是沒法比賽得過外國商品呀！由此可見，中國的商業，不但沒有爲民族工作服務，而且不斷地給與民族產業以打擊。當然，商界中不乏識大義愛國家的人士，我們斷不能說中國的商人完全有意識的在發揮其反作用，但客觀上，中國的商業資本是以極大的力量，在爲外國的商品，盡推銷的責任的。

(二) 戰時的商業資本

戰時的中國商業資本，在淪陷區的，多成爲仇貨的推銷人。這是以前那種特點的發展。後方的對外貿易，因爲通商口岸之淪落而逐漸縮小。太平洋戰爭爆發，滇緬路被切斷之後，對外貿易就達到空前未有的低點。邊界上某些地點，雖仍能若斷若續的在發揮着一種滲透的作用，但大規模的進出口，是不可復見了。中印之間縱然在進行航運，但數量是不大的。因此，後方的商業，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充分的發揮過去那些特點。可是，它却發揮了另一種特點。

戰時的商業資本，大部份是充滿了投機性的。商人之購進貨物，大多不是爲了供應市場，爲了賣給消費者，而是爲了囤積居奇。因爲他們看見物價步步上漲，把商品買入，再隔一些時候，轉賣出去，就可獲得巨額的淨利。開始是預測物價將會波動；後來就有意識的促使物價波動了。二十八年以後，這種情形便逐漸開展起來。中央日報曾載有「昆明市場變動律」一文，其中敘述昆明市商品性繁榮一段，寫得很生動。「商品性的繁榮，不以購買力爲消長，而以販賣力爲轉移，很明顯地把市場榮枯和物價漲落分開，就是說，物價漲，市面繁榮，物價落，市面有時繁榮，也有時不繁榮，這是因爲大家進貨，物價就漲，大家拋貨，物價就跌」（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貨物的進出，完全是商人在賭博，真正的消費者，或者真正用之於消費之商品，在市場上，作用是不大的。這不是投機是什麼呢？

商業資本一天比一天的猖獗，被吸引入這個圈子裡邊的人，亦愈來愈衆。原來在經商的人，自不必說。他們只要資金週轉得來，調動得來，必定或多或少囤積貨物。就是一些平素不是經

商的人，亦多「見獵心喜」了。在這個長流中，有銀行錢莊的老板；有因糧價高漲而更肥胖起來的地主；有四通八達神通廣大的特殊人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腰頭有力，資金雄厚的人，自然在這個「商戰」的舞台上唱着凱歌；一些因生活困難，企圖從商業獲得利潤而集合小股本的固定收入者，資金既短少，消息又不靈，自然在這個長流中沉沒下去。他們是配角，而且唱的是悲角戲，但他們的存在或消失，並無礙於整個市場的活動。

商業資本的週轉期遠比工礦為短，在港滬通運時期，一年至少可以週轉三四次，至於土貨之囤積，其週轉期更為短縮。至於工業，以機械業為例，一年中生產總額能達全部機器設備總值者，即不多見；欲達機器設備百分之一百五十，即為例外。所以，假定工商兩業的利潤率相同，但商業的週轉速，其餘額亦當高出工業數十倍，何況商業的利潤率是遠較工業為優呢？以商業與銀行比較，純粹銀行的放款等業務亦不能望商業的項背。銀行也好，錢莊也好，如果完全經營法定的業務，則每家均須虧本。銀行的放款利率若依一般行市，祇有四分，就是黑市比期亦只七八分而已，但經商的利潤動輒以若干倍計。銀行錢莊之所以能有欣欣向榮的狀態，完全依靠它之經營買賣。政府雖然在三十二年進行查帳，但還有不少行莊在做押貸，在「掙划子」，在以種種的方式從事買賣。換句話說，行莊仍是以商業為生命線的。因為經商是這麼優越，所以，有些廠家把通融得來的一部份資金，用之於囤積原料，或作其他不適當的運用；銀行的資金之投放於商業者，較其他部門為多。據主管機關的調查，廿九年重慶二十六家銀行錢業的放款分配，商業一項，在全部放款中，佔百分之九十六強，工礦兩業放款則尚不及百分之一。三十一年重慶所辦的六十家錢業，若將「個人放款」與「其他放款」兩項併入（這二項皆係商業放款性質），則

商業放款所佔百分比，應達百分之八十強，而工礦兩業放款僅佔百分之九·六而已。縱然不把「拖划子」的問題合併來看，單單觀察這些數字，就可顯示出銀錢業與商業的關係是何等密切了。

商業是戰時經濟中的「幸運兒」。它在社會資本的分配中所佔的比重自然很大。據有關機關的估計，三十一年重慶全體工商業廠號，約為五萬家，商業部份所佔之百分比，約為百分之七十三強，而工礦兩業所佔之百分比，尚不及百分之二十六。工商兩業的資金比較，真是冷硬的兩極。這還是以合法的商號為標準，其實，在合法的商號之外，還有一些游擊式的商人，這些人的資金，是無從登記，無從統計的。如果把這些人的資金計算進去，那就更可驚人了。

重慶的情形如此，昆明的情形亦如此。在昆明，一個烟攤資本竟達二三十萬元。讀者們，這是一個什麼情形呢？

(三) 商業資本的

商業資本與游資有着密切的關係。游資是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的結合，但銀行資本根本是在幹着商品性的活動的，所以，游資的本質，不外是投機性的商業資本而已，事實上正是這樣。游資的運動表現為囤積居奇。它有時採取着貨幣的形態，有時又採取商品的形態。開始是從貨幣形態轉化為商品，隔了若干時間之後，又從商品的形態轉化為貨幣，取得更多的貨幣。前一個階段是買；後一個階段是賣。在過程上，游資的活動與一般商業資本，並沒有二致。但在買與賣二個階段之間，還有一個站在流通過程以外的節目，這就是囤積居奇，這一點把游資——囤積居奇的商業資本，與往時一般的正常的商業資本，區別起來。可惜的是，戰時的商業資本極大部份係以囤

積居奇爲生命脈。所以，我們可以說：商業資本是游資的一個來源，一個構成部份；而游資則在商業的形骸之下，高度地發揮其投機的商業資本的特性。

因爲商業資本多半以囤積居奇爲內容，而囤積居奇的結果，乃爲促進物價之上漲。很明顯的，物價上漲並非單純由於游資之作祟。生產與通貨，更有深切之關係。物價提高，刺激了商業資本的；商業資本因物價之上漲而活躍起來。但反過來，商業資本的活動卻不斷在促進物價之上漲。由此可見，物價與囤積，是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的。在這裡，商業資本就會遇到一個矛盾。因爲商品愈被囤積，則物價的上漲亦就越加利害。物價愈加上漲，則囤戶在進行第二次囤積時，其所需要的貨幣必定更多，幾倍的貨幣不一定能買到過去同量的商品，而同時，商品是不能永久不賣的，永久不賣會毀壞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有些商品雖然可以囤積幾年仍無妨礙，但商品若不轉化爲貨幣，則囤積便會失去其意義，而且長期把資金凝結在商品上，會使游資硬化起來，會使它的活動受到限制呀。爲了措理這個困難，囤戶就在囤了一定的時期以後，拋了出來，拋出以後，又進行第二次的囤積。當然，這種拋出並不是沒有條件的。條件是把價錢提高；在其投入的時候，亦必然促進物價的上漲。就在這樣一來一往之下，物價大海中，就不斷地興着波，作着浪了。

商業資本之所以擁有龐大的資金，除了上面所說的因素之外，還應指出其與通貨發行的關係。由於物價之不斷上漲，政府的支出亦跟着擴大，爲了填補這筆支出，政府除舉債增稅之外，還須增加通貨的發行。而這些增發的通貨經過一度流轉之後，便流入商品囤積者的手裡。跟着這種過程之擴展，商業資本便如高山滾下來的雪球一般，越滾越大了。通貨膨脹乃是商業資本的養料，它吃盡了增發出來的通貨。因之，貨幣數量雖然發出不少，但市面仍感覺到籌碼之不夠。

Inflation 的本質，披了 deflation 的外衣，這個矛盾，是商品資本的活動所促成的。目下在商業資本中佔絕對優勢的囤積居奇。其所發生的腐化作用是很大的。這可分二方面來說：

第一是給與生產事業以無限的困迫。這種困迫是多方面的，以工業而言，資金厝集在商業上面，銀行錢莊的放款亦集中在商國方面，工業在資金的挹注上使感到困難，而囤戶居奇操縱的結果，使工業在購入原料時需要更多的資金。以農業言之，囤戶的收購農產品是在剛剛收成之時，那時的價格不高，實際上，零零碎碎無地位無團體的小農，在出賣農產時總得依照收購機關所定的價格。那種價格，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農產品高價的利益，乃落入商人行號的手裡，棉農之賣棉，就是一個例子，各地的糧食買賣亦何嘗不是如此？到了農民要購入棉布，糧食及日用品時，就要支出更多的貨幣了。這種情形，如何能使農民有與趣本能力去增加生產呢？商業資本的活動，是侵蝕了生產事業的。

第二是造成一種極端浪費與奢侈的腐爛生活。在物價不斷波動的情形下，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只有那些發國難財者在混水摸魚中過着更好的生活。以戰時的情況而言，國民的生活是應該簡樸的，但那些發國難財者都在這個時候，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江西某報載有「望江南」詞曰：

「生活好，最好是商人，物價竟同春水漲；居奇操縱賺了金，享受總隨心。」

此詞雖然樸素，但發國難財的商人囤戶的生活，曲曲在筆端被寫出來了。他們這種生活，是耗費國家的人力物力的。發國難財的囤戶不但吸住了社會大部份的貨幣，而且通過貨幣的獲得又

浪費了國家的無限物資啊！這難道不是另一種侵蝕作用麼？

作者這麼分析，並不否定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積極的作用，亦不否認戰時一些正當商人的正常營業的貢獻。我們應該把正當商業與囤積居奇分開，但是囤積居奇乃在商業資本中佔絕對優勢，而且這種風氣幾乎滲透到社會經濟的每個角落了。所以，要解決游資問題，當不能不分析商業資本的內容；對準它，措理它！

五 銀行與錢莊

(一) 戰前金融的特點

中國的金融組織是順着票號、錢莊、銀行的系列發展下來的。票號早已衰落了；錢莊是從五口通商以後，迅速地成長起來的；而銀行；則是在外國商品進口更加擴大與深入的局勢之下，應運而生的。新興的銀行計有兩種：一種是外商在華開設的，如麥加利、匯豐、花旗及正金等是；一種是華商為迎合時事而設的，如通商、中國、交通等是。山西的票號是早已成爲「塚中枯骨」了，要研究中國的金融，不可不從錢莊與銀行的演化說起。

錢莊分明是代表純正的商業資本的。因爲它們是高利貸商業資本底供給者。就是上海的錢莊，牠們的發源地是南市荳市街，那時荳市街一帶的雜糧行，就是發展到高形態的商業資本，錢莊便是供給雜糧行以資金的金融機關。這一點，說明當時的錢莊，是與商業資本相依爲命的。至於它們所製造的銀兩和劃洋（民國二十二年國民政府通令廢兩改元，銀兩便成爲歷史上的陳跡），

及其所承襲的行會制度，更充分表現其封建性了。但是，這一特點，只表現了錢莊的一方面。錢莊——特別是上海的錢莊，還有另一個特出的方面。這就是它們與對外貿易的關係。因為外商要將大量商品推銷到中國內地和從內地吸取其所需要的原料，就非有就地的金融機關替他們經營貨款的匯劃不可。錢莊之代替票號而興起，就是依靠着這種任務的。具體的情形是這樣：當外貨進口時，錢莊就代進口商開出「莊票」或「公單」，外商銀行就可憑這種單票向錢莊取款；土貨出口時，出口商所領得的「洋款」和「公單」，亦是必須經過錢莊而向外商銀行兌換或付清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錢莊與外商銀行的關係便越來越密切了。外商銀行在剩餘資金底貸放上，需要錢莊做他們的媒介，而錢莊在莊票的流通上，則需要外商銀行買辦的抬舉，在資金的通融上，亦需要外商銀行為後盾。「莊票」必須洋商銀行收受無阻，才能流通市面，否則進口洋行便不能接受。遠期「莊票」為清償進口貨款之用。這種情形，說明着錢莊為什麼能在鴉片戰爭以後長大起來。

中國的新式銀行，是以一八九七年盛宣懷氏所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為嚆矢的。這種新型的金融組織，並不是以滋潤產業之發展為前提，而是以便利於外商的銀行商行為前提的。初期華商銀行的業務，是在資金上協助錢莊，使其完成上述的任務而從中取得一部份利益的。但是，銀行畢竟是新型的金融組織，它的經營技術（如會計制度與業務組織等）比錢莊來得進步；它的經營方式比錢莊來得擴大；它的資金的比錢莊來得更雄厚，所以，長期競賽的結果，錢莊一天比一天落後了。原來錢莊所佔的外商銀行代理人的地位，被新式銀行奪去了，到後來，錢莊竟淪落到成為銀行的隸屬；錢莊只有透過銀行才能取得外商銀行資金上的通融。

以新式銀行的資金來說，從最早的中國通商銀行算起，那一家沒有特殊的背景？從其營業方

面來說，因為中國的民族產業還沒有長大起來，所以，這些新型的銀行除了爲外商銀行代理人外，只向着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兩方面發展。戰前商業銀行在地產上的投資——特別在上海，那是駭人聽聞的。這種畸形的業務分明是商業資本的典當。同時，銀行另一部份的資金，則用在投資公債的上面。中國一向發行新債，十九是向銀行借現款或變賣現款（概以六七折計算），而公債利息又是六釐至八釐，故銀行所得實際利益，往往爲年息三四分。以戰前的情形而言，這種利率實在是肥厚的。這種情形，使人自然而然的回憶到中世紀富商巨賈放高利給封建領主的故事。至於牠們在農村中所經營的農產抵押，不外是變相的典當而已，其具有高利貸性質，更不待言了。

由於上列這些機能，又引出銀行錢莊的投機性與侵蝕性來。地產與公債的買賣，完全是一種投機事業。從這裡去觀察中國金融業的投機性，那是分明得像中秋的月亮一般的。至於它的侵蝕性，則可從其對於民族產業的關係去窺見。銀行錢莊服務於外商的銀行商行，其作用只在便利外貨之入口。對於外貨的便利，乃是中國民族產業的極大不利。因為民族產業就是在外貨外資打擊之下抬不起頭的。在這裡，中國金融業的活動，不是「爲虎作倀」是什麼呢？在資金的投放上，中國的金融業是獨立在生產事業之門外的。商業銀行固不必說，就是投資於生產事業較多的××銀行，據其歷年營業報告，該行對工廠放款只及機關放款四分之一；而這種放款還是生利資本，沒有負擔工業的盈虧的，有時爲了自己本息，竟不惜給與民族產業以致命的打擊。杭州織成織綢廠就是受着該行的債務追索，而於一九三二年春停業的。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上海申新五廠因爲華商銀行不願在資金上通融，致在一九三四年秋被日寇所兼併，這又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像

這樣的故事，實在太多了。中國的金融業，真像「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冷酷地總想割去中國民族產業的一磅肉呀！

這就是戰前中國金融業的特點。抗戰六年半了，這些特點有什麼變化麼？

(二) 戰時的金融姿態

物

在形態上，抗戰以來的金融業是有些變動的。這些變動，表現在金融中心之內移；表現在行莊資金的增加，表現在國家銀行的力量之增強，表現在錢莊的更進一步的衰落。現在分別述之於下：

戰前中國金融中心是上海。當時全國華商銀行約一百五十餘家，內中在上海開設總分行的在二百家以上，連支行辦事處在內，數達一百七十餘。這種情形，說明中國的金融業，在地域的分佈上是偏在的。抗戰以來，這種情形漸漸在起着變動。淪為孤島時期的上海，那兒的金融界沉醉在投機的氣氛裡，雖則在外匯問題上仍用牠的迴光返照的光芒去吸引人們的注意，但對全國各地的關係而言，其重要性顯然是「一落千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孤島沉淪了。英美荷比等國的銀行已被日寇所劫持；華商的行莊亦縮小其活動的範圍。過去黃金的上海，現在更是黯然失色。內地呢？過去是比較沉寂的，現在的重慶與昆明，已顯然成爲後方的金融重要據點。以重慶而論，戰前銀錢業只有三十三家，到三十二年春，已增至一百四十七家。其中銀行佔九十四家。這種情形，是很可觀的。淪市商業銀行與錢莊增加的種類有四：其一是新成立的；其二是由本地原有商業銀行增設的；其三是並未淪陷省份的商業銀行來本地增設的；還有政府銀行亦在戰時成立

的一些分支行處。昆明方面，亦有類似的狀況。淪昆金融業的發展，改變戰前那種偏在的形勢。以資金來說，民國二十四年間，全國一百五十家左右的華商銀行，實收資本不過二萬六千七百萬元而已。這個數量如果與現在比較，那是少得多的。單以重慶一帶而論，截至三十年年底，各級政府銀行的總行在重慶的共計五家，資本共一萬八千萬元，商業銀行總行在重慶的十三家，資金共四千八百萬元；錢莊銀號五十三家，資金共二千六百零八萬八千元。三者總計起來共達二萬五千四百餘萬元。在這裡，總行未在重慶的銀行，資本額是置而不論的。如果把這些銀行的資本和三十二年夏中交農三行增資的數額都算進去，那就更可驚人了。這是說，重慶各行莊的資金總額，是超過了二十四年間全國一百五十家銀行的資金總額的。假若我們進而分析渝市各行莊本身的資本，亦可發見這種現象。據康永仁先生的計算，重慶「戰前九家商業銀行的資本計共七百五十五萬元，每家平均資本為八十三萬多元；戰時十三家商業銀行的平均資本約四倍半於戰前的平均資本；其資本總額約六倍於戰前的資本總額。又戰前最高資本為一百二十萬，低者為十五萬元，現在，高的已達到一千萬元；低的亦有一百萬元了」。以錢莊而論，「抗戰以前的最高資本為七十萬元，低者僅五萬元，抗戰以後的最高資本已到三百萬元，最低的亦有十萬元了。就平均數計算，現在的資本計約一倍半於戰前的資本。就資本總額計算，則抗戰後的資本，已經七倍於戰前的資本了」（見經濟建設季刊創刊號）。行莊資本之增加是游資擴大的表現，亦是通貨膨脹的反映。「水漲船高」，這是無怪其然的了。

以國家銀行而言，抗戰以來，力量是一天比一天在擴展着。中交農四行戰前在西甯西北各省市僅有分支行處六十四所，戰時（截至三十年底）增設一百八十所，增設數為戰前總數之三倍

弱。以省別言，四川增設最多，共六十七所（渝市在內），廣西次之增設二十九所；雲南又次之增設二十五所。以行別言，中國增設五十九所，中央五十六所，交通四十一所，農民二十四所，但農行在各省增設之濃貸機構極多。四行分支行處之增設顯示了國家銀行營業地域之擴大。三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爲實行四行專業化，中央銀行獨占了發行集中及準備集中的特權，但其他三行在調整了業務以後，又將資本各增爲六千萬。業務的調整與資金之擴大，都是在說明國家銀行是比以前強化了，至於政府對於商業銀行管制，亦在另一方面，說明了這一事實。

根據歷史發展的趨勢，錢莊的活動的前途是比較狹小的。因爲錢莊畢竟是一種舊式的金融組織。內部的組織管理並未完全採用分工制，常有事權不明責任不清的弊病；放款上是採用對人信用制，有時放出款項難於收回；會計制度仍用舊式賬簿，對內對外流弊甚多；對於存款人雖負無限責任，但錢莊經理及股東宣告破產，存款人即無法追還其存款，因此存款是不易大量吸收的；至於獨資經營或合夥經營的方式之不容易獲得大量資金的困難，更是不言而喻的了。這些原因，決定了錢莊將來的命運。另一方面，自三十年十二月起政府規定不准設立新行，而錢莊則是視同銀行的，所以有不少錢莊在改爲銀行。聚興誠與和成的例子是太老了；最近的大同、永利、復華及聚康銀號，是朝着這條路跑的。尚有幾家現在正在作這種準備。錢莊之所以改行，有一些是爲了避免淘汰，有一些是由於外來資本的爭購招牌。這是游資橫流的又一反映，同時亦包含着各幫資本在金融角逐場上的多少悲喜劇！

這就是戰時金融業的剪影。但，這種剪影還不能說明它的真相，更談不到它的特質。因此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去看它們的特質到底有沒有變？

(三) 還有那些特點？

從本質說來，戰時金融業是以一定的形式去發展戰前所具有的特點的。這些特點，表現在：第一、在上海的銀行錢莊自國軍西撤以後，更充分的發展其為外商服務的特性。有多少銀行與錢莊，在外匯投機的大賭場中，替日寇作配角。甚且為人搜購農產。二十七年三月實施請核制的目的，是在防止敵人套換我外匯基金，然而事實上，敵商銀行竟在這個時候公開分配到核准的外匯！外匯投機的熱潮退後，上海的銀行與錢莊就埋頭在大幹其美金票，紙金與華股的投機。紙金是以匯豐銀行美匯掛牌行市為結價，華股亦是以外商的股票為對象。這是一種買辦性的投機。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孤島完全入於敵人之手，上海銀錢業的業務，更是直接在繁榮了淪陷區的經濟，直接在為敵人服務了。

第二，後方銀行與錢莊亦在外匯投機上作過活動，但主要的特點仍在發揮其前資本主義的金融活動。這表現在比期放款的業務上。比期制度是西南各省所特別盛行的，這種制度具有促進高利率的作用。錢莊銀行競相以高利率吸收比期存款，又以更高的利率拆放漁利。這麼一來，市場利率就因之提高了。比期制度是高利貸的一種特殊形式。據估計，重慶各商業銀行的放款業務，三十年十二月底為一萬二千三百餘萬元，在這個數目中，美豐亞西等十二家商業銀行的比期放款竟達到六千四百萬元，佔放款總額之半數。這一樁業務的分拆，暴露了銀行錢莊的高利貸特性。引人讚美的農貸，在一些地方，其本質亦復如此；三十一年年底廢除了比期制度，但這種特性仍是無所減少的。

第三、自二十九年以後，物價暴漲，利率高騰。在這種狀況之下，行莊如果完全依法經營法
定業務，欲求其不虧本是不可能的。事實證明得很清楚，行莊巨大的收入，都是從兼營貿易獲得
的。牠們向商號投資，多係入股性質，且有化名加入商號公司爲股東者。政府的金融法令對於這
一點雖加限制，但實際上，行莊放款互調的結果，「划子」仍然拖下去。後方行莊年來之激增，
其核心就是在此，從其成立的方式來說，亦未嘗不是如此。年來渝市莊號成立的方式，有的是因
爲自己有了若干商號，爲了便於活動或擴大舊事業的營運資金，而成立一個錢莊銀號；有的是爲
了辦理他種事業，便於日後資金的週轉，先以所有的資本成立一個錢莊銀號。銀行之成立雖無莊
號那麼容易，但其作用亦無二致。因此，銀行莊號之經營商業，乃是自然而然之事，就以公開的
放款而言，不管商業銀行、錢莊銀號與省地方銀行，都以商業放款佔第一位。二十九年十二月底
商業銀行對商業的放款佔全部放款百分之八十八；錢莊銀號約爲百分之九十九，省地方銀行約爲
百分之五十二，如果省地方銀行中的個人放款亦用在商業上，則它們對商業的放款要佔到百分之
五十七強了。以後情形亦未嘗不如此。三十一年三月重慶六十家銀錢業的放款，商極放款亦佔了
百分之八十強。這些可驚的百分比，說明了銀行銀莊充分地牽着商品性的活動。秘密的國貨與
露面的搶購已經成爲銀行與錢莊的最主要的業務了。物價高漲的一部份原因，不得不歸功於行莊
的好手筆！

第四、從投機性來說，後方的行莊仍是保持過去的傳統的。外匯投機，它們在參加着；商品
投機，它們在拚命着；地產的投機，它們仍未忘懷！抗戰以來，後方各都市各農村的地價在暴漲
。促進地價上漲的原因，銀行錢莊的投機是不能忽視的。特別是都市的地價，他們更感到興趣。

以商業區而言，重慶每市敵運到二十一萬，西安十九萬，韶關十六萬，桂林十一萬元（見卅一年四月二日商務日報）無論那一方面看來，銀行錢莊的投機活動是變本加厲的。

第五、戰時後方的金融業對於生產事業，仍然保持着戰前那種淡薄的關係。個別的銀行固然投了一定的資金於工廠，但是，這些投資額仍是可憐得很。以二十九年十二月為例，工礦事業在全部放款中的百分比，商業銀行為百分之一強，錢莊銀號不及百分之小數點零一，省地方銀行為百分之小數點六，這個數量，如果與商業放款比較，那真是『不可同日語』了。金融業沒有在資金上給與工礦事業以通融，反而在囤貨的活動上，給與工礦事業以無限的打擊。因為囤積居奇的結果，促進物價之暴漲；物價暴漲的結果，使生產成本急速上昇；生產成本上昇的結果，廠家如果得不到資金的通融，則生產規模將不能保持原來的狀況。生產事業將不能順利的進行下去了。戰時的金融業是通過囤貨的活動以發揮其侵蝕性的。

戰時的金融業，並沒有改變過去一些特質；只是以新的形式發揮那些原有的特質而已。

（四）游資在作祟

中國的銀行與錢莊，沒有高度發展的產業資本作為背景，沒有與產業資本發生密切的關係，因此，它不能稱為金融資本，只能說是一種畸形的銀行資本而已。在游資泛濫的今日，這一種資本的影響是很大的。

戰時泛濫在各地的游資，乃是××資本，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之結合。在這裡，銀行資本是三者中間的關鍵。因為××資本是不能離開銀行而進行其活動的，反過來，各地行莊亦多以某些

人物的力量爲護符。如果我們能詳細去調查分析各行莊的股東以及存戶，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這一點。商業資本呢？他更是依靠銀行資本以爲挹注的。在前面我們曾經說過，有許多錢莊，其成立之目的，完全是爲了經營商業的；而同時，絕大部份的銀行與錢莊又以經營商業爲運用資金的出路。國內各地的商號，其資金活動雖不完全經過銀行，但大多數場合是做貨的商家多向行莊借款；有餘款而暫未動用的商家多向銀行存款。以昆明一地而論，三十年八月份的銀行存款就達二十萬萬元之鉅（見同年十二月九日中央日報）。因此，我們可以說，游資雖然游離在生產領域之外，但却菌集在行莊的四週；游資雖然不盡屬於銀行與錢莊，但大部份是與銀行錢莊發生密切關係的。

銀行與錢莊在游資的活動上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二十九年以前，行莊在抵押放款及押匯的方式之下，不斷地進行信用膨脹。『平時抵押放款一萬元之資本照八折抵押，再抵押再押，即可囤積貨物至五六萬元』。當然，能抵押到放款的必須與行莊有關係的商號。二十九年四月財政部禁止銀行經營以日用品爲抵押之抵押放款及押匯等業務之後，牠們又透過其有關商號，依然使用信用膨脹這一法寶。從這一點，行莊加強游資活動的事實，分明是不可掩的。但是，通貨是銀行授信的基礎，法幣增發，銀行信用必然跟着膨脹；反之，銀行信用越加擴大，物價的上漲越加利害，則通貨的發行必跟着增加。因此，銀行信用與法幣發行是互相推動的。

銀行資本是在擴展着。然而它的擴展，是含着極大的矛盾的。以正常的狀況而言，銀行必須與產業聯系，然而今天的銀行資本是與產業資本對立的。銀行在資金上，因扼了產業；在國貨上打擊了產業。在這種矛盾之下，產業固然奄奄一息，銀行亦何嘗獲得站穩腳跟的地盤？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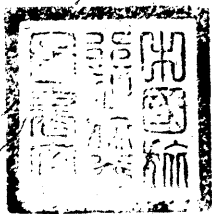
因爲銀行資本在商業上的活動，因爲銀行信用跟着物價之上漲而膨脹，於是財政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了。目前銀行錢莊尙陶醉在桃色的美夢之中，但是，這種美夢畢竟是空幻的。它們可以由做貨而長大，亦可由做貨而破產。因爲跟着物價之上漲，做貨的資金亦就越來越須增大。做貨的資金如果增大了去，則行莊被凍結的貨物上的資金所佔的比重亦就越來越多，可以應付市面的流動資金亦就會跟着相對的減少。這一個矛盾，是銀行資本所不能克服的。表面 Deflation 而實際 Inflation 的狀態，與三十一年夏間江慶錢莊攔淺的風潮，難道不是一種警告嗎？如果這種矛盾再發展下去，則這種情況，這種風潮，將會以更大的規模來橫掃整個金融市場了，這是不可不深加警惕的。

中國銀錢業的前途，是值得我們注視的。目下的情形雖然困難，但澈底的改變金融業的方向，對於戰時經濟，實屬必要。釜底可以抽薪，懸崖可以勒馬，難道金融界之改絃更張，不能够做到嗎？

六 民族產業

(一) 一些成就

抗戰已經六年半了。日本強盜雖然盡情的洗劫沿海沿江的工業據點，雖然急促地促進淪陷區



中一些中國產業的沒落，但是，中國的民族產業仍在砲火中新生起來。在廠家與職工的艱辛苦鬥之下，在這些人們的血汗的滋潤之下，中國的民族產業在一個被視為閉塞的西南各省，植着根，開着花了。

抗戰以來，中國民族產業的成績，是值得珍視的。它們的成績表現在下列各點：（一）戰前我國工廠的分佈是偏在的。絕大部份的新式工廠偏集在上海、青島、漢口、天津等地；談到西南，那真是岑寂得像黑夜一般。抗戰爆發以後，廠家與職工在做着史詩式的遷廠工作。到最近，連同原有的及新設的計算在內，後方的廠礦已達二千餘家了。據工礦調整處的統計（截至三十年年底止），後方的冶鐵廠由四家增至八十七家；機器廠由三十七家增至三百七十六家；電工器材廠由一家增至四十四家；煤礦由七百四十五區增至一千六百二十九區；鐵礦由三十二區增至一百一十二區。這種發展，是在回答敵寇對於沿海工業的摧毀；亦在克服歷史上產業分佈的偏在。（二）在戰前，中國民族產業是側重於輕工業的。沒有重工業的基礎，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點之一。抗戰以來，這種特點在後方起着相當的變化，國營與民營的工業，逐漸側重於重工業部門之投資。據吳承洛先生的估計，資源委員會直屬的重工業，截至三十一年，已達七八十個單位。這七八十個單位，包括大規模的機器廠、電工器材廠、動力油料廠、動力酒精廠、化工材料廠、低溫焦油廠、銅鐵廠、銅鋅鉛錫等提煉廠；礦業則包括煤、鐵、銅、鉛、鋅、鎳、錫、鎢、汞及石油等礦。其在民營事業中，重工業亦佔着大的比重。即以六百多個遷廠的單位而論，其中就有三百個單位屬於重工業部門的。這種成績顯然很薄弱，但與戰前比較起來，不能不說有極大的進步。（三）技術方面，亦比戰前大大提高了。據周茂伯先生的報告（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重慶星

五聚餐會)：後方機器工業年來有相當的成就。戰前國內不能自製的萬能磨床、冶鍊機械、軋鋼機械、煉油機械、鑛用機械、酒精煉製機械、紡織業所用之鋼絲機、及船用高壓水管鍋爐等等，皆能在後方自行設計製造。這些成就，打破了過去一般人認為非依靠外貨不可的看法。至於代用品之發明；更是『無待贅述』的了。

這三點，就是抗戰以來民族產業的可喜的成就。這些成就，對於抗戰的支持，是發生着積極的作用的。它們供給着很多軍需品；它們供給棉紗、棉布、軍氈、皮革、麵粉和紙張文具；它們生產了一些鋼軌、鋼條、石銹鋼、灰口鐵和白口鐵；它們製造了一些機械、燃料、水泥、化學和電工器材。這些產品，都是前線後方所需要的，都是兵士與人民所需要的。在這兒，國營企業也好，民營企業也好，都是手攜手地為國家民族而効勞。這些成就，這種勞作，證明中國的產業資本是在繼續發揮其革命性，同時，亦在證明中國民族工業的利益是與抗戰的利益打成一片的。抗戰的勝利，保證民族資本有着它的光明的前途！

(二) 幾個特點

戰時中國民族產業顯有着可喜的成績，可是，我們不能以此便告滿足。因為，這種成績是未能適應客觀的需要的，亦就是說，戰時的民族產業，仍然薄弱得很可憐！

中國的民族產業，本來就是很薄弱的。以言煤炭，全國每年的產量不過二千餘萬噸；以言生鐵，全國每年的產量亦只有四十餘萬噸而已。這個數量，如果與英美比較，就要像侏儒碰着巨無霸了。不但如此，這個可憐的數量，還有一大部份是屬於外資的。以年產二千餘萬噸的煤來說，

日資的撫順佔了七百九十萬噸，英資的開灤佔了五百四十萬噸。若把其他日英在煤礦投資計算進去，則英資佔了百分之二十五，日資佔了百分之四十。以每年四十餘萬噸生鐵來說，與日資有關鐵的廠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輸往日本的鐵產佔全產量百分之八十以上。就以民族資本比較發達的輕工業而言，外資亦呈現噴噴奪主的形勢。一九三五年全國四百九十五萬餘紗錠中，日資佔了一百九十四萬個，英資佔了二十萬個。英日的紗錠，共佔全數百分之四十四。同年，全國四萬八千餘架布機中，日資佔了二萬一千餘台，英資佔了四千台左右。英日的布機，共佔全數百分之五十三。這種情形，你看，可憐不可憐？然而，那個時候，中國的產業資本，還有一些大規模的經營。在輕工業方面，如榮宗敬氏的申新紗廠與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在重工業方面，如漢冶萍公司，龍烟公司，六河溝公司及××之中央鋼鐵廠，都是大規模經營的。單以申新在滬的第五第六第七三個廠（後被日寇佔去）而論，紗錠數就達二十萬。抗戰以來，除了一部份內遷的廠礦而外，一些大規模經營的企業，都在敵寇的洗劫之下，崩潰下去了。榮宗敬氏這個系統，就是例證。煤鐵方面，被敵寇搶去的龍煙鐵礦井陘煤礦等，亦是如此。大企業（當然是相對的，與英美比較起來仍小得可憐）之沒落，是抗戰以來，產業資本的一個特點。這一特點的背後，包含着後方產業，是小規模經營和生產量比以前更為低落的事實。

後方廠礦的規模，比較戰前，大為遜色。以紡織業來說，後方各省開工的紗錠，只有××餘×枚。這個數量佔戰前華商紗廠數量的百分之×××弱。以每個單位來說，戰前華商紗廠的紗錠，最多可達八九萬枚，五六萬枚則屬平平無奇的。抗戰以來，後方較大的紗廠如「裕華」「豫豐」紗錠還在×萬枚以內（以三十一年年底為標準）。其他的小紗廠紗錠多在××枚以內。如果與戰

前比較真有小巫見大巫之嘆！至於煤炭，三十年後方全年的產量是五百二十餘萬噸，佔戰前四分之一，鐵的產量只有六萬餘噸，佔戰前百分之十五。鍊鐵爐的容量幾以興業公司之三十噸的鎔爐爲巨擘，等而下之的以五噸爲普通。這種規模怎能談到大呢？戰前中國的民族產業是薄弱，現在的情形還未能達到戰前的水平，則其薄弱的程度，可以想見了。此無怪後方物資的供求量，相差是很遠的。據估計，鋼鐵缺乏百分之八十九；棉紗缺乏百分之七十，布疋缺乏百分之六十。其他重要機件及原料，多不能自給。這種情形顯示着後方的產業，還須要我們加倍努力的。

民族產業的薄弱，帶來了它的依賴性。這種特點，在戰前早就存在着。抗戰以來，特別是英美廢棄了不平等條約之後，我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在經濟上，像戰前那種華資廠礦因借外債而受到外人的支配和歸併的事情，雖然沒有，但，重要的機件原料之依賴，仍是灼然可見的。列如，機器工業所需器材，「目前雖能自製，但尙有一部份特殊原料工具等，仍須仰給國外」；電氣工業的器材，則極大部份依靠國外之供給。至於飛機、大砲、坦克及汽車等等，那就更不要談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後方有若干正在擴大或籌備的廠礦，即感到恐慌，因爲他們所需的巨型機器鍋爐等，有的尙在美國未起運，有的正在半途之中，有的雖達緬甸，但仍在國門之外。西南國防運輸線梗塞之後，後方的經濟建設，大受影響了。這不能不說是民族產業的依賴性的反證。

戰時民族產業的薄弱，不但使它帶着依賴性，而且使它帶着投機性。在戰前，產業資本之經營公債與地產，是數見不鮮的。抗戰以來，它們雖然改變花樣，但投機的性質仍然無所更易。我們不能說全部的民族產業都如此，但是，「拿民族工業作藉口，藉以掩飾自己罪惡」（「鞭」中，林帝好罵沙大千語）的人，實在是不不少的。產業資本不能控制商業資本，反而向着商業資本的

轉化（有的竟達到賣廠的程度），不是投機性的表現是什麼呢？不是脆弱的表現是什麼呢？

在生產關係上，中國的產業資本，帶着濃厚的中世紀的氣味。戰前盛行於紡織業中的養成工與盛行於開採業中的包身工，簡直是在過着奴隸的生活。國軍西退以後，日本強盜在瀋寧一帶厲行養成工制度，在今日而欲了解上海紡織業，如果不把握養成工，那是不可能的。後方某些新式工廠，間亦採用着較為開明的辦法（如申新紗廠之實行三八制），但一般說來，實際工資遠落在物價之後。工人之跳廠，這就是基本原因之一。至於某些特殊的工廠之以超經濟的辦法與力量去管理生產與工友，其不合理處，更不必說了。

在資本的性質上，國家資本在產業中佔着極大的比重。國營工業在中國發展甚早，然成效甚微。在官督商辦時期以後，國營事業便日漸衰落。抗戰以前，軍事委員會設置資源委員會（現改隸經濟部）與辦國防及基本工業。國府復成立建設委員會（現亦改隸經濟部），主辦電氣工業及煤礦，行政院之實業部亦擬舉辦一些企業（如南京之硫酸鋸廠），然規模終屬有限，且進展甚緩。經濟部成立之後，經建工作，進展頗速。單以資源委員會而論，其所屬之工礦，已達八九十單位。其他如軍政部兵工署與航空委員會隸屬之各廠，規模都很可觀。這都是國家資本增強的明證。此外，民營工業不但因為統制工貸，而且因為政府投資之關係，日益受着國家資本的支配。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所管理的民營工業，不少是屬於此類的。有名的「中國興業公司」、「中國電力製鋼廠」、「滇北銅廠」、「宣明煤礦公司」以至「明良煤礦公司」等；都參加着多量的官股。至於龍章造紙廠之改為中央造紙廠，更不必說了。關於這一點，大公報亦有如是的觀察：

「公營事業已代替私人事業，國家資本已佔工礦事業資本半數以上，似象徵國家資本主

業已在發展，但私人資本投入生產事業者則大感不足，而專賣企業及混合式企業之趨勢，是否兼併壟斷之嫌，已引起注意」（三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國家資本的增強，表示後方產業資本的性質，已在起着變化；而私人資本中，××資本的佔上風，亦是不可忽視的。

後方產業資本的這些特點，包含着重要的意義。它告訴我們：民族產業是很薄弱的，還是中小生產佔優勢。它的依賴性投機性與落後性，都是基於它的脆弱性而來的。要克服這些缺點，必須盡量使用民族產業作大步的發展。

（三）橫在目前的困難

民族產業是必須作大步發展的，但是，橫在它們的面前還有很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什麼呢？

第一是資金的問題。這個問題包含着銀行與產業的矛盾。一般銀行錢莊資金的投放約有十分之九集中在商業資本的活動上。它們附設公司、商號、倉庫和棧房，直接經營商團，雖經管制，實際未嘗放手，只是在花樣上更改得更精巧罷了。四行雖不經營商業，但商品抵押業務，仍然攬做；四聯總處三十一年度的貼放，工礦事業只有七萬萬元，佔百分之三十；如以二十八年四聯總處成立時算起，工礦貼放之累計只有十萬萬元，尚不及百分之三十，其間投放於民營工礦者，尚不到半數。第九區金屬業冶製工業同業公會謂工貸款額，三十年度尚未及工業生產值百分之二，其貧困概可想見。工礦需要資金，而行莊却對它們實行緊縮。行莊感到興趣的是可以獲得高度利潤的商團。物價漲得越利害，工礦越需要資金，而行莊却更拚命於商團。這個矛盾是越來越尖銳化

的。照這種形勢推延下去，產業界的資金就要越感困難，而生產規模亦就無法擴大了。

第二是物價問題。這個問題是與游資問題聯系的，它所包含的是生產與商業的矛盾。很明白，物價之暴漲並非單由於遊資之作祟，但遊資之活動，具有重大的影響。游資集中於國貨，使物價更加飛漲。在這兒，工業家在出賣成品時固可多得貨幣，但在購入原料進行第二次生產時，便感到獲得加倍的貨幣不能保持原有的規模，於是發生囤積原料與製成品的現象了。這種現象是有害於生產之進行的。不囤積嗎？廠家要吃漲價之虧；多囤貨嗎？生產過程將要受到限制。這個矛盾是跟着物價之飛漲而加劇的。

第三是地價與糧價的問題。無論工廠，都需要地皮的；而工人的伙食又與糧價有密切的關係。年來糧價逐步上漲，土地跟着糧價之上漲而成爲投機的對象。因此，地價亦不斷上漲了。糧價漲，工人的伙食費便要增加，勞動力的價格便要上漲；地租漲，則廠家與地主對於剩餘價值的分割，在對比上起了變化。地主獲得多一點，廠家的利潤便會降落。這種矛盾是跟着糧價之上漲而尖銳化的。因此，有人說：在上海時代，民族產業是爲外國人賺錢，今天在後方辦廠是爲地主賺錢。這句話，雖有偏激之嫌，但却能曲曲道出此中一部份真相。李嘉圖時代英國谷物條例之爭，竟在今天的中國，以特殊的姿態呈現出來了。

第四是各生產部門間協調的問題。後方的生產事業是不協調的。這種不協調，表現在：礦業和工業不能配合，若干工業所需的原料，不能從礦業獲得充分供給；動力與一般工業不能配合，許多工廠不能獲得充分的動力，因而不能擴充設備；原料的供給與需要亦不能配合，如一鍊鋼的工廠需要鐵，而目前鐵的生產量超過了鍊鋼工廠的需要，以致鍊鐵的工廠無法支持，鍊鐵工廠出

品已經可憐得很了，却還有資本雄厚的鍊鋼工廠要壟斷生鐵壓低鋼價去打擊同業」（見龍季子先生：目前生產事業不能配合的嚴重性）。此外，國營各廠既未能分工合作；國營與民營之間，更少聯系。致某些國營工廠，使用時間僅達十分之三。這是很可惋惜的。

第五是稅制上的問題。這個問題顯示着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之未能統一。與產業有密切關係的所得稅及過分利得稅之所以成爲後方產業界熱烈關切的問題，其原因就是在此。三十一年遷川工廠聯合會等三團體，發表「工業界之困難與期望」，對於稅捐問題，曾提出極深切的意見：

「然我工業界之所轉引爲危懼者，則爲所有資產，多數爲日損月耗之房屋及機器，依法定百分率提存折舊準備，則因原價與現價之懸殊，勢將無法除舊以布新，再欲以此計算盈餘，繳納稅款，則虛盈實稅之結果，流通資金日絀，將使生產逐步低落，欲圖補救，非不斷增資，即須相互合併，但言增資，則須求新舊股東權益之平衡，即須重估資產之價值。……資產重估之結果，復見虛盈，復課實稅，則增資之收入或不足以償捐稅之支出，是又不如不增資之爲愈；合併之進行，雙方亦須重估資產價值，仍須繳納法定之稅捐，則其得不償失之情況，且較增資爲更甚，此爲直接稅所引起之困難」。

除了所得稅與過份利得稅之外，統稅之不斷提高，亦爲實業界感覺困難的問題。第九區金屬冶煉業所發表的「鋼鐵冶煉工業之當前困難及解決建議」與潘仰山先生最近談話（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新蜀報），都懇切地提出這一點。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之不統一，顯不着稅收與增產之互相抵牾。

第六是管制政策之急待改革。因爲管制政策有許多地方是發生反作用的。這些反作用常常阻

礦生產之發展，常常阻止私人資本之擴大。在抗戰時期，就是在建國時期，私人資本之發展，仍屬必要，因為國家資本的力量究竟有限，藉助於私人資本，要支持抗戰，要開發資源，顯然是不可能的。故對於私人資本作過份的限制，實在有害於生產之提高！

第七在經營方法上亦有不正常的傾向。這些傾向，在公營產業中表現得最濃厚。有些廠礦，主管人是以做官或報銷的方法去經營的，他的任務只在蓋圖章，對於生產毫無所知，有些廠礦則以良好的技術人員去管理行政，結果又減少其對於技術上的貢獻，而人事關係上亦有措置不周之苦。對於發展生產，都是極為不利的。在私營產業中，某些特殊人物之投資是有益於廠礦之擴大的，但又帶來一些只會做官不會做事的人去管理廠礦，使浪費腐化的現象，侵蝕了工廠和礦山，這又是一個矛盾。

這些困難是古舊的中國社會的必然產物，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財政經濟的命脈都落在外人手裡，英美雖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但經濟上的問題還未完全圓滿解決，何況現在半壁河山仍在敵寇蹂躪之下呢？至於古生產方法的殘存所引起的時代錯誤，則是外人加強侵略的工具。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展開了中國資本主義先天不足的病態，銀行、地主、商業資本與X X資本，直接間接，都在妨害民族產業，而經濟政策與財政政策亦就不能適應它的發展了。而同時，民族資本本身的依賴性，投機性與落後性，又常常在削弱自身。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對民族產業抱悲觀。歷史的趨向，是顯示着民族產業有光明的前途的。保證這種前途的條件，是抗戰的勝利，是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是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之改善，是市場的擴大與社會購買力的提高。這些條件，有待於舉國上下之努力；有待於產業界人士之爭取。因此，廠家今日的任务，不在於縮小規模，而在

於同業間的團結與勞動間的團結，在於設法排除困難增加生產，在於爭取這一切條件之完全實現。
「大地回春」中的趕殺敵，只寫他到在後方開工生產為止，我們希望後方無敵趕殺敵，要在物價
高漲資金枯竭的困難局面之下，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努力，在艱難困苦中殺出一條血路來！



201



跟着時間的演進，愈接近勝利的時候，我國的戰時經濟，亦就愈加困難。黎明前的那一段，是最冰冷，最黑暗的。

戰時經濟的一切困難，反射在物價問題上，亦可以說，物價問題是戰時經濟的焦點。因為物價問題與生產、運輸、貿易、金融及財政各方面，具有密切的聯系。每一個因素如果起了異動，則物價就會或多或少的受到影響而跟着起了變化了。五六年來的事實。在在證明了這一真理。這就是說，戰時物價的變動，是以生產困難、運輸阻滯、囤積居奇及通貨膨脹為其原因的。這幾個原因，橫互了整個戰時經濟的領域。所以，我們說：物價問題是戰時經濟的焦點。

物價是戰時經濟各方面的反映，同時，它又促進了戰時經濟各方面的困難。比如說，物價漲得太急，就會使生產者的成本提高；亦就使生產者的資金感到困難。運輸方面，亦會因為物價之暴漲而感到燃料與工具等等的補充之不易；財政方面，則更會因為物價之暴漲而增加其開支，而各項開支之增加又為通貨膨脹之條件。像這樣，互相推動互相影響的結果，物價就會漲得更高，戰時經濟的各方面就會越來越感到拮据了。

物價上漲，是參加戰爭的國家所不能免的。差異的地方，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中國年來這種情況，完全是經濟落後與戰爭的摧毀所交織構成的。困難誠然困難，但爭取最後勝利的條件却依然存在。這些條件，在本書第一章中已曾提及，現在讓我們再說一下吧！

第一是人的因素。在戰時經濟這個大浪潮中，我們可以看出各色各樣的臉譜，有的依仗谷倉之豐滿而更加豐滿；有的因為握有多量的籌碼而更形活潑；有的因為善觀風色而立致巨富。這些人固然長得腦滿腸肥，可惜的是，他們肥得越可怕，則天下蒼生亦就瘦得越可憐了。他們之肥是以別人之瘦為代價的。這些人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是破壞的，是腐蝕的。他們並不能成為爭取抗戰勝利的因素。成為爭取抗戰勝利的人的因素，乃是那些受物價壓迫的大多數的人民。在這裡，有手足胼胝的工人；有搗風沐雨的農夫；有埋頭苦幹的科學家工程師；有孜孜不怠從事生產的廠家與職員。這些人的努力，是值得我們珍視的。他們散開在中國各地，在後方，在敵後，在西南，在西北，地區雖則不同，處境雖則有異，但是，他們之出着力，流着汗，為國家民族增加物資而奮鬥，則是一致的。就是靠了他們的努力，許多荒地長出豐滿的果實；許多瓦礫建起雄偉的廂房；許多戰前不能生產的東西，現在可以在後方自己製造出來了。

第二是現有的產業基礎與廣大的農村。我們現有的產業基礎，顯然還很薄弱，但是，這樣的規模實在是值得珍視的。我們雖然不能製造重兵器，但一般的軍火與日用品都能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供應前線後方的需要。以目前這種基礎而言，如果能適當而切實的給與以保護和發展，未始不是準備反攻與將來建國的物質條件。農村方面，我方還保有廣大的地區。廣大的農村，在戰時的中國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在實質上形式上都統制了農村，城市之頭一斷，農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然而半殖民地且擁有廣大地區的今天的中國，却不是這樣。在這兒，城市雖帶着領導性質，但不能完全統制農村，因為城市太小，農村太大，廣大的人力物力在鄉村不在城市。抗戰以後不久，蔣委員長指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勝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

而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鞏固之民心。這是對於中國農村力量的正確估計。抗戰已過了六年，我國以拙劣的兵器而能拖住日寇，使這個東亞強盜的雙腳深深陷在泥坑中而不能自拔，政治上的進步與軍事上的奮戰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經濟上的這個條件——農村的力量，實在是不能忽視的。糧食與原料的供應，就是農村力量的表現之一端。

第三是國際上的援助。抗戰以來，英美與蘇聯，在軍火上，在金融上，不斷給與我國以援助。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英美，特別是美國，對我的援助漸漸增大。美國租借法所給與中國的雖未能達到客觀應有的需求，但所佔比重却逐漸有增加之勢。中國抗戰建國的大業，自應以自力更生為重，但外援之資助是十分必要的。這裡所謂資助不僅指軍火與金融，而且指技術與生產所必須的物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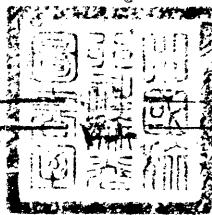
這就是經濟上爭取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些條件現在是存在着。這些條件證明我國目前經濟上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是能够克服的。但是，單單具備這些條件仍屬不夠，因為單有條件而不加以利用，則條件的作用沒法發揮出來。因此，在物價越加騰貴經濟越加困難的今天，善用這些基本條件乃為我們重要而急切的課題。

怎樣善用這些有利的條件，乃是戰時財政經濟政策之所有事。在前章，我們已經提到這一方面，已經分析了敵我的經濟戰時策略了。現在必須指出的是：我們不能空空把時間度過，應當握住當前經濟問題的癥結，在財政上抵塞通貨的繼續膨脹；在生產上挽救工農業的萎縮；在貿易上壓抑商業資本銀行資本之投機囤積。如果從正面來說，那就是要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的原則，因此，對於執行正確財政經濟政策的保證，是必須努力爭取的。

傅孟真先生說得好，「我們這次抗戰，好比唐僧取經，最後勝利是早經決定了的，一如唐僧取經之前觀音菩薩早在如來佛面前說好了的。但是，爲功行之圓滿，不得不經八十一難，因爲不如此不能證真果，在將來即不能佛法常光。所以，我們遇了一難又一難」（見三十二年五月二日大公報）。事實上，恰恰如此，經濟上的「火饅山」或「無底洞」，正橫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如果沒有抖起精神，如果不學學孫悟空一行人之絞腦汁流血汗，就不容易「過了一難又一難」了。同胞們，拿出辦法，切切實實的幹下去吧！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完稿

十二月十九日校稿



1944
二月初版（一）一三〇〇〇冊

戰時中國經濟輪廓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鐘 昇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定價

每冊國幣四十五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4254B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證安圖字一二六七號

戰時中國

經濟輪廓

鏡昇著

每冊國幣

\$ 45.00